

全球化

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话语下

862 Edited by Hou Kok Chung
何国忠 编

全球化

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103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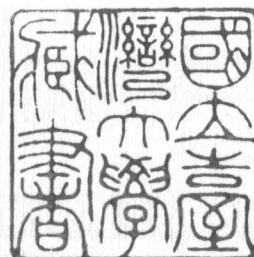
87745891

全球化 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话语下

Edited by Hou Kok Chung
何国忠 编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79565663 Fax: 603-79565114
E-mail: chinastudies@um.edu.my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s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Quan qiu hua hua yu xia de Zhongguo ji Malaixiya]
全球化话语下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 editor Hou Kok Chung
Includes index
ISBN 978-983-3748-83-9
1. Globalization--Social aspects--Malaysia. 2. Globalization--Social aspects--China. 3. Malaysia--Foreign relations--China. 4. China--Foreign relations--Malaysia. I. Hou, Kok Chung, 1963-. I. Title : 全球化话语下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II. Title :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303.482510595

目录

导论

- ① 马来西亚与中国：全球化、华人问题与两国互动
何国忠 3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

- ② 中国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文平强 13
- ③ 邓小平视角下的改革与开放政策
林德顺 29

马来西亚华人问题

- ④ 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华文学研究：学院建制与主体意识的滥觞
庄华兴 45
- ⑤ 儒家思想的“在地性”与“全球性”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自强的意义
黄文斌 71
- ⑥ 华人族群的本土化与马来西亚的国际化
张应龙 87
- ⑦ “海外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概念的再思
唐南发 105

Contents

⑧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大视野和小格局：本土、区域与中国 莫顺宗	117
中马关系及互动	
⑨ 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 张大勇、姚晓静	135
⑩ “亲中反美”到“中美并重”：“九一一”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剖析 林若零、曲大威	149
⑪ 全球化话语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 何国忠	169
⑫ 优势互补谈马中高等教育合作 陈友信、吴明珠	189
⑬ 摆脱技能训练的枷锁：全球化背景下马中文学教育的比较论述 谢川成	201
作者简介	217
索引	221

Introduction

- ① Malaysia and China: Globalization, Chinese Community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Hou Kok Chung 3

China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②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
Voon Phin Keong 13
- ③ Deng Xiaoping's Perspective on China's Reforms and Open-Door Policy
Ling Tek Soon 29

Malaysian Chines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 ④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Scholas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
Chong Fah Hing 45
- ⑤ The Local and Global Properties of Confucian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aliency
Wong Wun Bin 71
- ⑥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laysia Going Global
Zhang Yinglong 87
- ⑦ A Revisit of the Concept of “Overseas Chinese”
Joshua Hong 105

导论

- 8 Big Vision and Small Setup: Localism, Regionalism and China 117

Mok Soon Chong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and Linkages

- 9 Malaysian Studies in China 135

Zhang Dayong and Yao Xiaojing

- 10 Hedging Strategies: Sino-Malaysia Bilateral Relations after “911” 149

Joyce Juo-yu Lin and David Chiu

- 11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169

Hou Kok Chung

- 12 Enhancing Mutual Strength through Malaysia-China Collabo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89

Tan Yew Sing and Wu Ming Chu

- 13 Litera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Malay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1

Chiah Seng

- Contributors 217

- Index 221

马来西亚与中国： 全球化、华人问题与两国互动

何国忠

自柏林围墙被推倒,东欧剧变以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再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牢控国际事务几十年的冷战格局被一个全新的、更广泛的、相互联系的全球化话语所代替。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全球化”即不绝于耳于区域或国际论坛,每一个国家都积极思考其冲击,并各自调整外交政策。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在全球化话语下进行了变动。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交往,涉及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马来亚共产党在 1948 年被宣布为非法的政党后,走进森林,企图用武装斗争去推翻英殖民地政府,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他们背后的的支持者。中国在 1949 年成为共产国家后,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都不满中共对马共的援助。共产党武装叛变困扰马来西亚多年,马来西亚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它是全世界冷战的一环。50 年代初期,朝鲜内战爆发,中国抗美援朝,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终胜利,中国功不可没。越南共产党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印半岛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苏加诺政权的左倾及印尼共产党力量的膨胀,都加深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的戒心。

马来西亚在 1957 年独立以后的十多年,和中国大陆没有正常的往来。1974 年 5 月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但是两国始终不能完全信任对方,虽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在 1978 年访问马来西亚,但两国关系并无

多大的突破。1978年中国侵略越南时，马来西亚领导人更加密切注意中国的动向。马哈迪执政初期，两国人民仍然不能互访，只是保持之前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贸易、人民探亲及寻医的联系。

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在冷战结束及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更加意识到调整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以尊重现存的国际秩序，不采用争霸或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崛起的目的。另外，马共在1989年12月2日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约，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解决了马来西亚和中国友好交往最后一道防线，则可以视为全球化话语下的另一种正常发展。为了长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在1989年宣布其国民可以自由进入中国。

自1989年以后，马中关系有极为稳健的发展。两国秉承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两国签有包括《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海运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等经贸合作协议。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两国更在2002年4月成立马中双边商业理事会。中国是马来西亚继美国、新加坡、日本的第4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则是中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1倍，2003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达201.3亿美元；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262.61亿美元，2005年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两国领导人互访频密。马哈迪仅在1990年代就访问了中国4次，而接替马哈迪担任首相的巴达威也一样将中国当作马来西亚重要的合作伙伴，巴达威在最近的3年间已访问了中国3次，其中值得学术界提起的一件事是当他在2003年9月以马来西亚副首相的身份访问厦门大学时，建议在中国创办马来西亚研究所以及在马来西亚创办中国研究所。

本书是在全球化话语下讨论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发展，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的第一次合作计划。两所在2006年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本书是大会的论文，经过修订以后所出版的两本文集中的其中一本（另一本为英文文集）。参与撰写本书的作者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及台湾。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辑一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辑二为“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辑三则为“中马关系及互动”。

1978年12月23日，在中共第11届3中全会通过决议：“党的未来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毛泽东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正式告别历史，中国完全进入邓小平时代。辑一中有两篇论文，集中讨论中国如何走向全球化。文平强在《中国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中，探讨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并强调其正面影响。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会受益于全球化过程。无疑的，中国过去脱离世界经济的自我封闭政策，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替中国制造了新的景观。文平强在文中总结中国经验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策略、经济特征和社会心态决定了它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方法。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中受惠，是因为它本身的优势条件。它的改革开放，结合后冷战期形成的有利新世界秩序，使它成功地从经济落后地位提升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

中国在改革与开放的路程，也有其曲折迂回的一面。林德顺的《邓小平视角下的改革与开放政策》，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部署夺权至1992年他发表南巡讲话为止，分析处在中共中央主导地位时的邓小平的思维、策略和行动。邓小平上台以后即号召人民解放思想，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打破社会均贫的现象，他把国家从阶级斗争的泥沼里拉出来，然后大力推行鼓励解放生产力的政策，带动了改革与开放的热潮。为了达到目标，邓小平不容许国家及社会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所以他同时反左也反右，甚至不惜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手段。林德顺说在改革开放的方向中，邓小平犹如摸石头过河，边试边做，边错边改。如有任何重大的错失便让社会国家一起承当它的社会成本。但是，“纵观当时的全局情况，邓小平还是最适合出面结束中国当时所面对的混乱和失败。他的改革与开放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道路纵然曲折，中国还是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了。”

辑二则集中在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庄华兴的《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华文学研究：学院建制与主体意识的滥觞》，展示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现象。这篇论文分析了马华文学在学院建制中的成果，检视马华文学的跨国学术对话对本土知识建构的作用，以及马华文学研究如何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建立其主体意识。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本土化议题所显现的张力有增无减。马华作者在身份、

主体属性的探索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庄华兴强调，“如果华文文学共同体是一个事实，则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是这个共同体之中一个体制相对完备的文学系统。”但他同时也提醒马华作者必须面对国内的马来民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谈马华文学/文化主体与身份属性不置于宏观的马来西亚架构是不懂得状况，能走多远也颇令人怀疑。”

黄文斌的〈儒家思想的“在地性”与“全球性”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自强的意义〉，则讨论儒家思想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有什么作用的问题。黄文斌认为“马来西亚华族基本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自强运动，一个是多元文化融和。前者将有助于提升华族的素质及创造丰厚的文化……后者乃鉴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如何与其他族群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与促进了解及合作，为马来西亚开创更美好的明天几乎是每位有识之士应该努力的工作。”这篇论文强调儒家的“在地性”与“全球性”特色，并说明儒家思想不仅是本地华人族群所需，也非常适合于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

张应龙的〈华人族群的本土化与马来西亚的国际化〉，指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它除了具有中华文化背景，也具有马来西亚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背景，跨文化是华人族群走向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张应龙反复强调华人族群的全球化离不开本土化。马来西亚华人需要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包括对华人族群实行更加公平的经济政策，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以利于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获得平等的待遇，从而增强走向全球化的实力。”张应龙语重心长地表示，华人族群无论是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还是在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活动，都需要马来西亚本土资源和网络作为支撑。“对大多数华商来说，离开本土的资源、基础和网络，所谓的全球化就难以奏效和持续发展。”

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对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起着极大的冲击。唐南发撰笔写〈“海外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概念的再思〉，希望重新思考“海外华人”这个词汇，并审视“马来西亚华人”的概念。唐南发指出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海外华人”一词让人感到困扰和混淆，“年长的一代固然对本身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仍然存有眷恋，但对新成长的一代而言，他们有着极为不同

的身份认同。‘马来西亚’对这一代的人，尽管因为现有体制的弊病和政策的偏差而让华裔感到一定的模糊和若即若离，却因为在地成长的经验，仍然要比‘中国’来得更为清晰、实在和具体。”因此，这个概念有可能会随着世局的演变，和当年的‘华侨’一样，逐渐在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字叙述中被淘汰。

而一直将华人凝聚在一起的华人社团，和全球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华人社团曾经协助华人的移民和谋生，也曾经协助华人帮派、省籍观念的消融和重塑，更曾经协助各地学校、庙宇的兴建和发展。莫顺宗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大视野和小格局：本土、区域与中国〉强调，长期以来让华人唇齿相依的华人社团很早就有国际视野，只可惜在这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大部分的华人社团却让人在感情上觉得“弃之可惜”，实际功用却“食之无味”的尴尬处境。华人社团在这五十年间最大的错误，显然是没有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认清自己的问题。莫顺宗指出华人社团发展的盲点：为了团结大大小小的华团，许多华人社团都朝向整合或相互结盟的方向，但最后却成了大而不当，功能发挥的格局反击变小。“到目前为止，环顾数量近八千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具备实力铺建全球化格局者，没有几个。”

辑三则注意近年来马中关系及互动。随着中国与马来西亚互动的密切，马来西亚研究也呈现了新的景观。张大勇及姚晓静的〈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提到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最新状况：新研究机构设立、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宽、学术刊物增加。这篇论文虽然也提出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一些不足，但基调大体还是乐观的。张大勇及姚晓静指出：“研究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在社会的需要面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完善，相信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将会不断进步。”

中国“和平崛起”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让世界各国都想与其交往，林若雩及曲大威的〈“亲中反美”到“中美并重”：“九一一”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剖析〉指出，马哈迪时期马来西亚的“亲中反美”立场相当明显，“九一一”发生后，两国经贸虽仍保持良好关系，然而，美国积极拉拢马来西亚反恐，却也为马中关系的发展投下变数。林若雩及曲大威指出，“马来西亚仍与中国保持密切经

贸关系，在安全战略上，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合作却多过与中国的互动，持平而论，美国已经成功地拉拢马来西亚。然而，因中国经济力量仍能提供马来西亚一定的利益，在东亚整合进程中，马来西亚亦须中国配合，预料马来西亚不会全然反美，也不会与中国疏远，日后的外交政策将是“中美并重”。

何国忠的〈全球化话语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则是分析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的关系，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在全球化的话语下，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中国理念前所未有的处在一个极为稳定的状况。马来西亚领导人大体已能理解华人只是在文化认同方面坚持保留华人性，但在政治认同方面坚持效忠马来西亚；至于华人如何看待中国当然也值得注意，何国忠以为“新生代和政治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不一定会以中国的崛起为荣，但是，从目前民间和社会的一些活动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可以预见，新生代未必就能够远离惯见的文化中国论述，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无限商机和各种资源，以及语言互通的亲和力，对新一代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全球化的理念下，马来西亚和中国都理解合作与互惠的重要。两国政府都强调对新科技新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教育的角色因此更加重要。陈友信及吴明珠的〈优势互补谈马中高等教育合作〉探讨马来西亚和中国的高等教育，点出了两国在优势互补中所产生的创新教育合作模式。这篇文章先谈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再论马来西亚经济波动带来的教育新趋势，然后触及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外合作新走向，最后分析马来西亚与中国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这十年来愈来愈多马中两国的学生选择到对方国家留学，这样的发展让人鼓舞。但是陈友信及吴明珠却提醒两国必须再加努力，特别是要正视一些还未解决的陈年旧题：“当前两国政府必需尽速处理互相承认学历文凭之事，更应尽早更新两国的教育备忘录，具体化其内容及执行方案，使马中教育合作踏实地跨前一步。”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中悠游自在，教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谢川成的〈摆脱技能训练的枷锁：全球化背景下马中文学教育的比较论述〉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欠缺全球化的观点，创造力不足，势必影响其竞争力，国家也因此而失势于国际舞台。这篇论文将重点放在语文教育上，突出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比较马来西亚和

中国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从中了解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文学教育的发展如何，在语文教学重在技能训练的情况下，文学教育是否被边缘化。谢川成强调：“全球化不是向外看而已，也要回头看看自己，扎根本土，放眼全球，面向国际才是应有的态度。”

“全球化”的口号风靡世界，成为一种超然意识形态。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背景不同，却骤然间有了共同语言。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经济在这几十年来大步起飞，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之际，两国都意识到国家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策略以及适合的机制框架，两国都乐意与国际社会接轨，进入世界主流经济体制，并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尊重的重要性。我们当然知道全球化这个课题不可能谈尽，但我们愿意在马中发展的轨迹中，找出一些可以让彼此冲破传统的国界障碍，建立更稳定且互惠互利的基础。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文平强

一、前言

全球化包含了文化、政治与经济领域，它有效地解决了空间与时间限制的问题，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使政、经、文、社（会）提升至全球性的层面。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由“国际化”过程散播到世界各地，经过传播与资讯科技的进步，这现象转变为“全球化”的性质。全球化与国际化基本上是两种过程。两者在一些地区是并存的，有些地区则是连续性的。国际化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活动基础，即是受一国的政府和国界所约束（Dicken, 1998: 5）。

1990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把欧、美、日“三合会”（the Triad）及亚洲四小龙的密切经济关系称为“互联经济”（the Inter-linked Economy）。他把这个现象形容为“无国界的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全球化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或文化现象以强大的渗透能力自由的穿行世界各地。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达到更高与更广的层面，促进世界经济加强相互关系和迈向一体化。全球化是当今阻挡不住的趋势；无论是货物、服务、资金或商业交易的流动，信息、新闻、音乐、或电影等的传播，甚至电脑病毒的传染，都使世界各地区更密切地联系。¹ 这些关系的动力来自于高科技的运用，覆盖全球的卫星广播、国际互联网的联络功能、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移

动等 (Lechner and Boli, 2000: 1)。由于跨国企业及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很大，国家主权与国界的限制反而受到弱化。

全球化巩固了西方大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互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最普遍模式是：总部和研发单位（研究与发展）设在本国，生产单位设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然后把产品经销到本国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全球化是以谋求盈利为主。它以有效的企业管理为竞争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对象，以价格为分配机制。

百年来的国际化逼着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1949 年中国成为共产国家，使外来经济或文化影响失去自由流动的可能性。² 直至 70 年代，市场经济模式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是背道而驰的。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是以“顺应潮流、顺应经济规律与顺应本国的根本利益，来确定自己在国际上地位”的表征（薛君度、陆忠伟，1995: 99）。改革开放正好迎合了全球化的趋势。基本上，全球化与中国的社会国家制度像是有矛盾的，但是从经济利益角度看是没有利益的冲突。中国是当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发挥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将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与全球化的相互关系和特征，以及全球化与中国的区域角色三件事项进行探讨。

二、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

以中国这样特殊的情况，要探讨全球化之前，须先谈“国际化”。国际化是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以欧洲工业革命及殖民地主义的扩张为前提的。欧洲诸国为了当时能扩张势力到世界各地，并掠夺世界各地的资源，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帝国强权斗争，进行殖民地管制，并把工商业产品及文化传播到各地 (Waters, 1995: 3)，中国和东南亚是受牵连的地区之一。

当时，英帝国企图把鸦片国际化，强迫中国购买，以换取白银。这引致 1840 年和 1856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渗入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活动，遂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过程

是西方列强和日本以侵略、不平等条约和“霸权”手段下构成的。虽然中国经济表面上出现某些方面的发展，但大部分的中国市场却是被外国集团垄断（孙健，1992: 4-7）。中国经济基本上已变成外国的生产地和市场，并沦为一个剥削型的经济模式。³

国际化使国与国的经济交易数量增加，但却很少产生互补性的作用。在国际化的影晌下，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明清时代，朝廷政权轻视与外国经济来往的重要性，不重视交流和贸易。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使中国少与世界打交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便局限在“大陆”的内向心态。相反的，沿海居民却积极地利用外界的经济机会，大量地向外迁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它的特征是：国家控制并统一经营一切国民生计 (Ma, 1990: 5-9)。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路线，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与世隔离”的策略，不重视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强调“左倾”的群众运动并且以“自力更生”为经济发展的途径，排除私人营业的空间。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跃进”和 1966 年至 76 年“文化大革命”10 年间的非理性经济方针，致使中国经济倒退。1978 年，从农业生产改革的突破便扩大到更全面的经济改革。⁴ 正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革新，把计划经济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2001: 8）。

中国采用了两条道路，把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第一、是针对原有的经济生产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权力下放，以让企业、机构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第二、是把封闭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因为已认识到生产力走向国际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孙健 1992: 417 与 475）。中国不得不承认外国投资贸易对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同时，它巧妙地利用“经济特区”的概念充分吸引外资。

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有多方面的建设。它使中国认识到市场经济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竞争的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刺激新产品消费和不断地扩大需求来寻求及提高投资的利润。为了鼓励市场经济，中国逐步深化和扩大改革与开放，同时

也逐步地放弃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制度。

“对外开放”不只是一个突破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大胆的、革命性强的政治策略。开放是一种“解放”思想的社会过程，促使中国人民与外来文化有更多接触。中国是一个大陆文明的国家，长期以来都以农业为主、商贸为次的社会。它内向多于外向、封闭多于开放，常以自给自足的姿势出现，把“贸易”理念放在次要地位。庆幸的是，目前的中国已把“对外开放”视为国际贸易与外来投资的前提，这是经济发展有力的推动力。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要进入世贸组织必须先与世界接轨。中国经过 10 多年的谈判才成功进入世贸，显示它已通过西方制定的“经济游戏规则”。中国与东盟组织的自由贸易交往也表明它很乐意根据国际规矩与其他国家打交道。

在过去的 20 多年来，中国“走向世界”，利用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在 21 世纪前 50 年实行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就是达到小康水平。这将等于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即人均 GNP 大约是 10,593 美元（以 2000 年阶梯美元计算），或者以人民币的购买力计算，人均收入达到 27,756 美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3：107）。明显的，中国预料还需要几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才能真正达到小康和富裕的目标。

三、中国与全球化的相互关系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里，经济动力被视为大于政治和文化动力。世界经济体系被三种趋势联系起来。第一是交通、电讯网络、国际联网等（见 Kagami, 2001）；第二是国际贸易，尤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第三是资金直接投资到世界各地。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工具。在这同时，电讯科技也很重要。它开拓市场、扩大商机，也可能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Waters, 1995：66；Lewis, 2003：227）。

在生产方面，全球化的性质与国际化不同，它牵涉到跨国界“功能

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的经济活动。这过程主要是根据有关的生产机构（跨国企业）为主导（Dicken, 1998：5）。如果说“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y）代表国际化生产，那么“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mpany）就象征全球化生产了。传统的多国公司在外国设立子公司，实际上是成立母公司的翻版。在制造业方面，海外子公司是自给自足的，制造的所有产品几乎都在生产国采购原料、销售产品和雇用员工；而跨国公司是以世界为经济单位，并根据世界情况来考量有关零件、机器、规划、研究、融资、市场、定价和管理的事项。设立在外国的跨国子公司有其固定的单位，负责产品的专门生产、发展及品质管理。在这种商业组织下，国界并没特别的意义（杜拉克，2002：205–6）。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资源分配可以克服空间的障碍，达到像货物贸易一样的流动性（Petri, 1997：55）。经过外商直接投资，某企业能够把资金、科技及管理技能调到最适合的海外地区，以充分利用该地的资源如廉价劳工、技能、土地和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一个国家能够吸引到的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比拥有这些要素更加重要（Petri, 1997：55）。

1980 年代以来，“全球性寡头集团竞争”（global oligopoly competition）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些巨型企业（big business）革命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重组、缩减劳工，出售非核心业务及实行“全球性”操作（Nolan, 2001：151）。在工业生产，以“全球性工厂”为生产系统，把部分生产过程分割到世界各国去，以便从成本的优势吸取最大的利益。总公司集中在高价值生产部分，并设立一个“向外生产的商业网络”（network of outsourced businesses），把较简单和低科技生产部分设在海外。在服务业方面如顾客服务和资料输入，工作被分配到英文水平高而工资低的国家操作，再通过国际网络把完成的工作发送到总部（Ohki, 2001：89）。因此，高新科技产品的向外生产商业网络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链中的重要环节（崔大沪 2003：220）。

在全球化趋势下，物资与非物资“资源”流动得特别快。在金融业，由于许多国家已取消资金控制，加上新金融产品和先进通讯科技的影响，国际金融系统已融为一体。在 90 年代，外汇交易平均每天达到 15,000 亿美元（1.5 兆/1.5 trillion），比 80 年代高出 8 倍。同时，1997 年世

界贸易总额只有 66,000 亿美元，平均每天 250 亿美元 (Gilpin, 2000: 21–22)。

中国认识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会受益于全球化过程。无疑的，中国过去脱离世界经济的自我封闭政策，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才是“一条真正的强国之路”(张幼文、黄仁伟, 2003: 330)。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及时融入全球经济，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 (蔡昉、林毅夫 2003: 233)。经济发展需要正确的经济策略以及适合的机制框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初期成就是结合适当的经济政策改革与文化因素 (包括儒家文化价值观)，并以劳工密集生产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政策改革导致外商直接投资 (包括科技和管理技能) 的流入，直接提升了国内的生产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刺激贸易，而贸易再吸引更多外商投资。⁵ 这一系列的过程，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Chen, 1997: 46–47)。

1960 年代至今，东亚出现了四次海外投资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轮“投资热”出现在中国。开放后的中国是以“制造业导向”为发展经济，依靠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外商直接投资趋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 80 年代以中小型投资者为主，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1984 年至 1991 年，中国吸引了 102 亿美元 (US\$10.2 billion) 的外国投资。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快了开放和融入全球的经济体系，外国投资在同年间增至 112 亿美元 (11.2 billion)。自 1993 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以每年高幅度增长，1995 年达到 375 亿，2000 年 407 亿，2005 年高达 603 亿 (UNCTAD, 1996 in Petri, 1997: 56; Fan and Zhang, 2003: 8;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6b)。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投资。世界公司 500 强中，有近 400 家公司在中国投资 2,000 多个项目。另外，技术转移的外商投资公司也日渐增多。130 家跨国公司已经成了研究开发中心 (蔡昉、林毅夫, 2003: 229)。

中国的优势是拥有巨大市场、廉价与高技能的劳工及高速度经济增长率。在工业生产，由于同类工业的“集结” (clustering)，通过大规模经营，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果，并轻易聘得熟练工人和高质量供应商，这种“集结”现象极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转移到中国 (Petri,

1997: 56)。

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正面影响。因为规模大、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效率高，有助中国提升经济整体实力。跨国公司激发中国企业重组或合并为该集团提高竞争和创新实力。同时，它们的创新研发也会带动更多中国高技术中小型企业进行研发工作，以减少与跨国企业的市场差距 (张晖、倪桂萍, 2005: 129–130)。外国公司也造就了就业机会。2001 年，外国公司职员共达 671 万人，占中国总就业员工的 2.8%。这有助于减轻失业现象与社会问题 (Fan and Zhang, 2003: 9)。

中国制造业同时产生了“联结效应” (linkage effects)。新工业产生“向后联结” (backward linkage) 反应，如汽车制造增加对轮胎、钢铁、原料、零件等需求，并推动相关工业的出现。另一方面，一些工业，如半导体工业促使电脑业和相机制造业的建立，产生了“向前联结” (forward linkage) 效应。这些“前后”效应造就了无数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促进国内消费。蓬勃的制造业刺激服务业的发展。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购物中心、餐馆、酒店、娱乐场所、交通设备等，随之会蓬勃发展起来 (Konana 等, 2004)。这是一个正面循环的发展过程。服务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重要性往往在国内生产总值内被低估。最近全国经济调查显示，2004 年的中国总产值比原来的高出 16.8%，既是从原来的 16,400 亿美元 (人民币 136,500 元) 提升到 19,300 亿美元 (159,900 元)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5a)。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 200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82,300 亿元 (22,000 亿美元)，并极可能超越英法两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5b 和 2006a)。

中国在世界经济已达到高度的联系。截至 2002 年 9 月，414,796 个被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拥有外资额 8,137 亿美元 (崔大沪, 2003: 221)。中国之所以从全球化吸取利益，是因为它能根据发展水平适度地开放外来投资 (Fan and Zhang, 2003: 3)。1978 年，进出口总额仅 206.4 亿美元，出口额占 97.5 亿美元 (中国统计局, 1994: 506)。最新资料显示，贸易总额已高达 14,000 亿美元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6b)。1985 年的中国出口，外国投资企业提供总额从 1.1% 增加到 1995 年的 31.5% 及

2002 年的 52.2%。这足以看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明显趋势。实际上，“开放不会压制中国企业。恰恰相反，是给予中国企业奋起赶超的机会”（张晖、倪桂萍，2005：130）。

中国在 2001 年 11 月加入 WTO，意味着它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 WTO 框架下，中国接受某些约束，但也同时享受相应的权利。在金融业方面，中国取消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允许设立分支机构，从事人民币业务和提供零售服务，这是一种挑战也是机会。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失去垄断地位并面向竞争。因此，必须引进先进管理和经营技术以提高效率（蔡昉、林毅夫，2003：241）。

四、全球化与中国的区域角色

全球化是个自发性和多层面的过程，牵连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个国家若能把自己置身于世界经济之中，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全球化的表征（蔡昉、林毅夫 2003：233）。中国对全球化的渗入作出了一定的“管制”，以减轻其负面影响。中国在全球化过程吸取利益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全球化在中国还未全面扩展时，中国拥有一套制度来管制外资的投资，以抵御政治风险；第二、外商投资所兴起“倍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推动出口贸易和激发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两因素塑造了一个自我巩固（self-reinforcing）的良性循环。

全球化过程兼备了利与弊的风险，对东亚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受惠于全球化产生的机遇。然而，对东亚地区未来的经济繁荣及和平稳定，中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略窥一二：

一、1997 年金融风暴的前后期间，中国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而稳定了东亚经济局面的贡献是值得表扬的。在绝对自由操作的情况下，全球化是一头“猛兽”，有很大的“毁灭”潜能。1997 年的金融风暴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资金的过度自由流动所致。⁶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的“封锁”，它成功避开了这场灾难（Fan and Zhang，2003）。中国的经

验证明：如果对某些经济领域拥有一定的“自卫”权，是可以缓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⁷

二、继日本、四小龙及东盟各国，中国兴起了第四波的投资热。它从东亚国家吸取了大量的资金，并把一半出口运到对方的地区。1995 年至 2001 年间，中国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泰国最大出口增长的市场（Wong，2004：274 和 290）。这种“飞雁”型的区域发展，使中国和东亚关系愈见密切，遂而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并使东亚成为美国和欧洲之外世界第三个经济中心。⁸

中国对东亚政治与经济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是与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Wong，2004：280）。中国加入东盟 10 国后将出现巨大的区域市场，从而提高东盟整体的竞争性，并带来新的经济动力。这个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有经济的意义，也有助于推进区域政治稳定和安全。这项合作符合全球化的趋势和双边利益，创造互惠互利关系，也促进双赢合作及激发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参见王勤等，2003；朱坚真，20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超过 17 亿人口，无论在市场、投资或劳动力都对本地和外商发挥巨大的吸引力。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化将激起日本和韩国更积极与东盟签署同样的自由贸易区，使东盟进一步受惠（Wong，2004：283–5）。届时，以东盟主导的 10+3 东亚一体化将成事实。

三、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并发挥了东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角色。中国与世界经济繁荣依赖度越来越高，快速发展和庞大的市场将带来一个长期有利于区域经济活动的趋势。从中国的城镇化和西部发展便可见其经济发展的潜力。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中国应抓住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加工的优势，巩固 21 世纪制造业中心地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主要部分是提高城镇化。2000 年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为 75%，中国只有 36.2%。估计在 2025 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 60%，与发达国家的 83% 比率稍为接近（李明星，2003：254）。城镇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因为城镇是工商品和各种服务的生产、批发与交换中心，是国家经济系统的核心区域。同时，城镇是人口与经济生产力集中的地区，容易吸取大规模经营的经济效果（economies of scale）。城镇化带动社会的转型，成为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2000 年中

国城镇人口 4.6 亿人，至 2025 年将增加到 10 亿人口（李明星，2003：254）。这将递进对基本设施、房地产、交通等设备的需求，产生庞大的商机。

中国西部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后，全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明显的区域差距。沿海地区的蓬勃发展与西部地区停滞不前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极需要全面的提升。西部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及丰富资源，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西部发展是配合“引进来”的政策，也促使达到三个有利目标，即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内需和增加新发展点，以及解决就业问题（虞云耀，2003）。

四、中国“走出去”的政策。中国巨大的资源消耗需要获得大量的原料、能源、建筑材料、机械、投资、管理技术等资源。虽然中国资源相当可观，但是人均资源分配非常低，再加上中国利用资源的效率比发达国家低了 2 至 3 倍，资源的需求无形中增加了。中国为了确保原料来源，正积极往世界各地投资。身为邻国的东盟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如能源、矿产、木材、农业、海业等，是吸引中国投资的条件。2005 年，中国 1,067 企业对外投资额达 69.2 亿美元，其中 60% 进入了亚洲，以香港、韩国、泰国、柬埔寨及日本为主。该投资项目集中在制造业、矿业、资讯传送、电脑服务和软件设备（*People's Daily Online*, 2006c）。

中国处在东盟投资的起步阶段。其“走出去”政策很重视能源供应的海外市场。2002 年，中国海外石油公司（CNOOC）因在印尼接收了一家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的资产，便成为该国第二大岸外石油市场公司。这占了印尼总产的 12%（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53）。2003 年，中国福建发电厂与印尼签署了长期的天然气供应合约，为印尼天然气储量提供了一定的商业开发条件（Guerin, 2003; Ogutcu, 2003）。在马来西亚，一家山东与本地公司在砂拉越合资建立炼铝工厂，并将取用巴昆和另外一座水力发电厂的电源，将准备以 120 亿令吉的投资总额夺标（*New Straits Times*, 4 February, 2006）。由于炼铝耗费大量中国所缺乏的电源，中国是免不了会到海外投资这类的工业。

五、中国在 2002 年制定的国内与国际策略方针，确立了中国“长期

发展生产，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基本（国内）策略。另方面，“积极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国际策略（虞云耀，2003）。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成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的代表。这个角色符合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斯蒂格利兹，2005）。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积极地“有所作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虞云耀，2003）。它对东亚国家以及全球的经济稳定和繁荣越来越有影响力，甚至在与各国相互联系、依赖和制约关系下，起到了“一荣俱荣之利，或一损俱损之弊”的作用（朱坚真，2003: 31）。

五、结论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且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有重叠性的过程。它可发挥正面的效果，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提升到更高的台阶，促进世界先进工商业及科技的接轨。它也有负面的影响，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慢性的侵蚀，甚至能快速地产生经济风暴。

全球化的确对中国带来了许多有利的影响，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有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一种威胁，有些则认为是个机遇。本文集中探讨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强调其正面影响。“中国经验”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策略、经济特征和社会心态决定了它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方法。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中受惠，是因为它本身的优势条件。它的改革开放，结合后冷战期形成的有利新世界秩序，使它成功地从经济落后地位提升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

中国渐渐开始发挥其区域性作用，扮演多方面的角色。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促进区域发展和繁荣作出催化作用；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强调和平稳定及公正合理的原则，是符合东亚和全世界利益的；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促进国际关系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并维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注释

- 1 以音乐销售为例，至 2006 年 2 月，美国苹果电脑公司 (Apple Computers) 经其 iTunes 音乐店，卖出了 10 亿首下载歌曲 (*Sunday Star*, 26 Feb 2006)。
- 2 当联合国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和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GATT)，同奉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参加，理由是：这三个机构致力于发展市场国家的国际贸易，与计划经济不相容（见薛君度、陆忠伟，1995：90）。
- 3 英帝国霸占了香港以及日本强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强迫中国开放几十个条约港口并在上海设租界；西方企业直接投资设厂、开矿、创办银行、经营航运业等。1931 年外国在中国投资达 32 亿美元，1936 年增加到 43 亿美元，占工业资本的 71.6%。1936 年外国开设 8,000 多家“洋行”商店，控制了中国的生铁产量的 97%、煤产量的 66%、发电量的 77%、棉布产量的 64% 及卷烟产量 58%；在航运业，外国企业占中国航运吨位的 63% 及控制了 91% 的铁路里程；1931 年，4 家外国银行资本为 85 亿美元，大大超过中国 29 家银行资产总额的 25 亿美元。外国也控制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额的 80% 和几乎全部的进口额（孙健，1992：7–8）。
- 4 关于初期的农业改革，从公社到“包产到户”和“权力下放”的“思想解放”，马立诚、凌志军，1998 出版的《交锋》有详细的论述。在“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下，1978 年 12 月某天夜里，来自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生产队里的 20 位农民写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实行“分田到户”（即是“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绝不允许农民自主权，是违背当时的政治路线的。1979 年，这个生产队的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 3 万多斤增加到 12 万多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还了贷款。同时，四川的农业改革试验也获得同样的效果，产生了正面的示范效应（马立诚、凌志军，1998：129）。
- 5 在东亚，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在“飞雁”型发展模式反映出来（见 World Bank, 1994: 55）。
- 6 亚洲金融风暴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和研究。其中著作包括 Jomo Godement (1999), Montes and Popov (1999), 与 Arndt and Hill (1999)。
- 7 在货币交易时快速度地移动大量“资金”，是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1998 年 9 月马来西亚采取固定货币汇率来控制货币投机的活动。一些经济学家则建议，以抽税甚至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的方式，可以控制外来资金的投机流动（见 Mahathir 1999: 106; Todaro, 2000: 715）。
- 8 2001 年中国生产 1 亿 6 千吨钢铁、4,000 万台彩色电视机、1,300 万台冰箱、1,800 万架空调机、270 万辆车和 800 万台电脑。日本统计估计，中国生产世界一半的摩多车、33% 的空调机及 25% 的彩色电视机 (Wong, 2004: 268–9)。中国消耗世界的 36% 钢铁和一半的水泥，以供应制造业及其他需求 (Konana 等, 2004)。

参考书目

-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 崔大沪：《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加工贸易》，载《制度竞争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页 220–234。
- 杜拉克·彼得 (Drucker, Peter): 《下一个社会》(台北：商周出版，2002)。
- 李明星：《中国经济战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 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 斯蒂格利兹·约瑟夫 (Stiglitz, Joseph E.) 2005: 《21 世纪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 月 18 日演讲 (赵洪岩整理)。取自 <http://www.ist-group.com/BIEMBA/news/endpage/100800/20050329/35560.html>
-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 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王勤等：《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新格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薛君度、陆忠伟 (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 虞云耀：《战略机遇期的若干战略问题》，载李明星著作：《中国经济战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页 10–15。原载《经济日报》2003 年 2 月 17 日。
- 张晖、倪桂萍：《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的研发策略比较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 33 卷第 5 期，页 126–130。
- 张幼文、黄仁伟 (主编)：《制度竞争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朱坚真：《海南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研究——兼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北京：海军出版社，2003)。
- Arndt, H.W. and Hall, Hill (eds). *Southeast Asia's Economic Crisis: Origins, Lessons, and the Way Forwar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 Chen, Edward K.Y.. The Asia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Asia's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Century: New Ways for Japan to Cooperat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7), pp.45–53.
- Dicken, Peter.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1998).
- Embass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Petroleum Report Indonesia: 2002–20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embassyjakarta.org/petro2003/Petroleum%202003.pdf>
- Fan Gang and Zhang Xiaojing 2003. How ca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nefit from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6: pp.3–10.
- G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odement, François. *The Downsizing of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Guerin, Bill. Indonesia's natural gas dilemma.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2, 20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atimes.com/atims/Southeast_Asia/EG22Ae03.html.
- Jomo, K.S. (ed). *Tigers in Trouble: Financial Governance, Liberalis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sia* (London: Zed Books, 1998).
- Kagami Mitsuhiro. IT revolution and its meaning to society. In *The 'IT' R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e-Comer Advantage?*, edited by Kagami Mitsuhiro and Tsuji Masatsugu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pp.21–40.
- Konana, Prabhudev, John N. Doggett, and Sridhar Balasubramanian 2004. Comparing India and China growth strategies: chaotic or planned?. Derived from <http://www.mccombs.utexas.edu/faculty/prabhudev.konana/indiachina.pdf#search='Konana%China'>.
- Lechner, Frank J.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Malden,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0).
- Lewis Richard 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Global Trends in the 21st Century*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 2003).
- Ma Hong (ed), *Modern China's Economy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Mahathir Mohamad. *A New Deal for Asia* (Subang Jaya: Pelanduk, 1999).
- Montes, F. Manuel and V. Vladimir Popov. *Asian Crisis Turns Glob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 New Straits Times*, New twist to Sarawak smelter project, 4 February 2006.

- Nolan, Peter.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Ogutcu, Mehmet. China's energy security: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Asia and beyond, *Oil, Gas & Energy*, 2003 Vol. 1, Issue 2.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sandoil.com/ogel/samples/freearticles/article_15.htm.
- Ohki, Hiromi.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st Asia's IT industry. In *The 'IT' R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e-Comer Advantage?*, edited by Kagami Mitsuhiro and Tsuji Masatsugu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pp.63–91.
- Ohmae, Kenichi.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0).
-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5a. Revised GDP for 2004 up by 16.8%.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512/21/print20051221_229737.html.
- 2005b. Lehman Brothers: China, an economy larger than imagined.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12/26/print20051226_230913.html.
- 2006a. Facts and figures: China's major achievements in 2005.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603/05/print20060305_248028.html.
- 2006b. Facts and figures: China's major achievements in 2005. March 6.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603/05/print20060305_248028.html.
- 2006c. China makes more overseas investment in 2005, mainly in Asia, February 10.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602/10/text_20060210_241644.html.
- Petri, Peter A. Asia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a global economy. In *Asia's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Century: New Ways for Japan to Cooperat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7), pp.54–60.
- Sunday Star* 26 February 2006.
- Todaro, Michael P.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low: Addison-Wesley, 2000).
- 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Wong, John.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 catalyst for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earching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edited by Zhang Yunling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4), pp.265–292.
- World Bank, *East Asia'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onal and Global Gains from Liberaliz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邓小平视角下的改革与开放政策

林德顺

一、前言

放眼当今天下，中国肯定是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这个历来无论从地理或人口角度衡量都属于地球上的大国，在过去短短的三十多年时空维度中崛身而起，对整个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和范畴都形成莫大的冲击。¹ 而带引如此巨大变化的人，当非邓小平莫属。

1978年12月23日，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的一级党代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曰：“党的未来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意味着过去由最高领袖毛泽东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正式被取代了。虽然当时邓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宣称以早期毛思想里的“实事求是”精神取代拥护极左的晚年毛思想的“两个凡是”，但对比毛后的四人帮和华国锋，邓革除文革的勇气与气魄无疑是大大超越前两者。

1993年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里撰文〈邓小平与中国政治传统〉（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提到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革命性的转型时代，比中共其他的国家领导人更具中国传统的邓小平反而成为最重要的领导人。² 他认为，主要是当时的中国还保有浓厚的传统文

化氛围，让邓小平得以传统的人脉进行串联，终于在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中，历经人生的二起三落后，成功取代毛泽东钦点的华国锋再度上位。

邓小平上位以后即号召人民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打破社会均贫的现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了一番后来被人称为“改革与开放”的热潮，带领中国大陆变化成今天这幅景象。然而令人深感兴趣的是，在如此深具中国传统思维的邓小平脑海里，到底所谓的“改革与开放”又是怎么样的一幅图像呢？而他的奋起直追是否可以迎头赶上？而如果邓脑海里的改革图像与现实不同，那他又如何应对呢？他的应对成功吗？

本文尝试以邓在一场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为起点，分析在他刚奠定本身于中共中央的主导地位时，打算在哪几个方面推行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幅度多大以及改革师从何处等。接着再以政策推行以后的事态发展对照，印证到底邓小平作为一位带领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领袖，他到底有多大程度的适任。这篇小文里所讨论的人与事大约是在1978年邓开始部署夺权至1992年他发表南巡讲话为止。不过诚如上文白鲁恂的论文所提到的，其实他是一位思想仍保留着浓厚中国传统思维的领导人。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后，他就鲜少在公共场合出现。他委任了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来处理党务，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处理国家治理事务，让大部分的镜头都转向他们去了，他自己则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拥着枪杆子但却低调的退居幕后作仲裁操作。因此自80年代初期许多政策都是出自他人经他不同程度的接受后而推行。因此一旦这些政策引起争议时，他还能以自己高于他人的地位在党内进行仲裁。白氏认为邓这样的行为就像传统中国的领导人，拥有权力却自我抑制，乐于隐藏在政治舞台背后。³ 所以本文的重点比较着重在1978至1984年10月，那时正是他1978年工作会议讲话的精神发酵时期。在改革与开放政策逐渐深入推行后，越来越多新问题涌现，连邓也不禁引用陈云的其中一句名句：“摸着石头过河”⁴ 来形容他和中共一干领袖当时的心态。

二、第三次上位

相信在许多邓小平的传记里，他那三起三落的经历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在这段经历中，只有他的第三次上位稍微不同，那即是当时毛泽东已经身故。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邓的屡次起落，当可发现毛泽东都是个中的主要因素。所以这一次的上位，我们看到他长久以来在党、军、政系统里长久经营的人脉如何在没有顾忌下全面拥护他出来工作。当时在位的华国锋虽然得到毛泽东身前钦点为正式接班人，而且还身兼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及中央军委主席三职，几乎囊括了党、政、军三个系统的要职，可谓是权倾一时。1967年下旬，中共还为他展开了一场造神运动。但是除了那些在文革中出身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几乎都是支持邓小平的，尤其是那批老干部。因此华国锋最后成了一位过场或是过渡性的人物，让邓韬光养晦一阵子以后，还是要把统治国家的棒子交出，然后自己体面的退场。

根据记载，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一个仪式而已，真正的权力争夺战是在之前，即1978年11月11日至1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那场举行了36天的会议才是戏肉。⁵ 邓的同道与属下在那段时间里部署了不少好戏，不但有老干部在会议里提出与华国锋派相反的意见，同时在外也通过他们控制的报章制造邓开明形象的舆论，鼓励知识青年在北京西单街设立民主墙支援在会议里的邓派人士。⁶ 不过也有另一个看法认为，其实早在1978年11月，当舆论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笔战进行到尾声，华国锋及凡是派下台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⁷ 因为那时不但个个中央军政实力人物如邓本身、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公开与中共中央唱反调，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和大军区负责人都相继以发表文章或讲话的方式唱同，因此孰强孰弱就已经一目了然。过后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只是跑过场而已。

无论如何，为了显示鲜明的区隔，邓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祭出一面与华国锋不同的旗帜。早在1977年4月10日致中共中央要求出来工作的信件里，他虽然一时权宜地不得不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同

时也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⁸ 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放在当时中国的情境之下，显然是与当时官方所宣扬的“两个凡是”论有所对立。⁹

其后当邓顺利恢复原来的职位后，他开始说“实事求是”，¹⁰ 实行以打毛泽东的“红旗”试图反“两个凡是”这面“红旗”。然后就是由他提拔的胡耀邦发动上文所提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明显都是针对“两个凡是”而来，因此它的内容重点就是务实精神。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文革的阶级斗争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许多地方的正常生产秩序和铁路运输都还没有恢复，但是把四人帮赶下台的“凡是派”还扛着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包袱不放。诚如德怀特·珀金斯教授 (Dwight.H. Perkins) 在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写的论文所述，文革最危险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而是在那个时期实行的一种独特的发展战略和伴随这种独特战略的计划和管理特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¹¹ 德氏所谓的“独特的发展战略”指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虽然把四人帮赶下台了，但是那套“独得的发展战略”思维却阴魂不散地附在他身上。所以德怀特就认为如果这些战略没有被改变，中国长期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在军队压制红卫兵后就可以得到解决。¹² 反之邓就没有这方面的包袱，他在1975年的第二次下台就是因为不愿意遵循上述“独特的发展战略”来治理国家而被毛泽东撤职。因此邓第三次复出后迅速得到许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此外，根据白鲁恂的看法，这也是因为中国百姓目睹文革多年以来无政府状态的乱象，激发了中国文化长期对混乱失序现象排斥的潜意识心理，因而期望权威的统治。¹³ 而邓正是当时被人普遍认为能实行权威统治的不二人选，因此最后他终于在三中全会后正式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三、邓的改革图像

根据中共官方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里的诠释，邓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¹⁴

而三中全会决议又一致被公认是改革与开放政策开跑的公告，所以这篇讲话肯定是邓对改革与开放图像的素描，当中包含了许多邓的原初观点。因此若想理解邓的改革视角，应该是从这篇讲话谈起。

在这篇讲话里，首先他开宗明义表明欲以解放思想及实事求是的，团结一致向前看为讲话的主题。他认为，未来中共的干部们唯有解放了思想，才能正确地以马列及毛泽东思想解决新旧的问题、改革不协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关系、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等。他举了四个以往禁锢人民及干部独立思考的原因，并归咎于林彪及四人帮等。因此他呼吁干部们必须重新回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即让人民先自由思考及发表意见，然后才由政府把他们的权力集中起来有效地解决问题。他特别以“三不主义”来保证人民发言的自由，并以宪法及党章保障再重申一次。无疑的他这些开门见山的话把“两个凡是”排除在思想僵化罪名之外，但更糟的凡是有人联想时都会把华国锋派与四人帮连在一起。

谈到经济的部分时，邓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不要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而有关权力的下放单位甚至可以在工业部分下放到企业单位，农业则可到人民公社最下一层的生产队。这个部分相信主要是针对华国锋在当年秋季所提呈的1979和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及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建议。该计划里的经济管理体制曾强调要把管理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座谈会则建议把已经属于团队负责的农业生产小队的自主权力再过渡到大队去。邓在当时的这番建议并不一定是对症下药，反之更像是和华国锋针锋相对。其实当时国家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比例已经严重不协调，邓建议立即下放管理权力反而会造成经济发展方向失控。而农业生产队其实已经让许多农民的个人生产积极性大大削弱，某一些地方农民更已经冒着杀头危险进行包产到户，邓仍蒙在鼓里。

可能是留洋及时常出国的关系，邓的国际视野显然比他人广阔。他提议未来要加强法制，制定更多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人民民主的权利。他也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対症下药。因为文革及其后的过渡时期其中一个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法制不彰。显然邓看到法治精神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不过当他谈到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时，在连接的数段话中，竟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首先当谈到那些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冤案时，他的意见是“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但当谈到文革的历史定位时，只不过在同一个章节里，他却认为“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这种矛盾的态度，当然是有邓顾及自身利益的考量。¹⁵

最后他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首先是中共在管理方法方面必须克服官僚主义。这主要是他认为当时的官家机构太臃肿，办事效率不强又思想僵化。他认为应该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经济。邓非常大胆地说，管经济的干部如果不懂数学就要向懂的人学，甚至是向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学习。这句话表达了邓对务实价值观的推崇。为了振兴经济，连外国资本主义的方法都可以借用。再来，他认为中共的管理制度应该实行责任制。这是因为他认为“集体负责”口号已经被滥用，每当政策出错时没有人需要负责。配合他权力下放的建议，他认为个别层级的干部必须有自主决策的权力，当然成败也自负。

最后他提到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宣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可以先富起来。因为他认为这些比他人更辛勤努力的人，不但应该比他人享有应得的成果，同时也可以激励他人向他们学习，使国民经济可以呈波浪式地发展，带动全国达到均富。¹⁶

纵观上述邓小平所提的观点，相信都是他认为能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梦想的不二法门。不过这些邓小平掌权后所要实现的改革点子，其实是循旧。毕竟他是浸淫在党、军、政几十年的老干部了，当中共建国以后，他从早期的西南区政委和西南局第一书记一路晋升到政务院（那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到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他治理国务的经验可为丰富无比。因此一旦认定是思想僵化造成国力衰弱，他就非常自然地建议人们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以后的“用”还是需要在正确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体”上。他还没有新潮到认为思想解放可以为人们解放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批判。

至于所谓的当年权力下放，那只不过是从1956年4月毛泽东的文章《论十大关系》那里得到的灵感。当时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主要是针对早期中共奉行苏联的经济模式里太过僵硬的计划体制。毛泽东曾这么写道：“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

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¹⁷，通过这篇文章的思想精神而推行的政策导致了1958年中共的八大可以光荣地宣布社会主义成功完成改造。至于推行责任制及让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则是60年代中共在极左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实行的救亡政策，是邓和当时刚接任党主席的刘少奇的力作。由此可见邓主政以后，首要的急务就是把国家从当年自大跃进起走的歪路带回到八大时代，然后再走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的“正确”道路。这是一条艰辛的路，因为在60年代初期他和刘少奇尝试过，结果两人双双被打倒；70年代中期他第二次复出后又联同周恩来再试走一次，谁知周恩来病逝后他又被逼下台。如今他终于真正掌权了，他当然要再来走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不过如果放在务实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循旧还是创新，只要能重振中国的经济，那就是好政策了。只不过从邓这最初的改革图像看来，这是老路，证明他的思维是守旧的。如此守旧但务实的改革道路，执行后将面对怎样的冲击呢？

四、改革面对挫折

从邓的讲话看来，他当时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范畴相当广泛。人民往后似乎就可以畅所欲言了。谁知时隔不到4个月，即1979年3月30日，他就斩钉截铁地为思想解放的界限设框，即他所谓的“四项坚持”：

- (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¹⁸

原来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期间，由邓及部属所鼓励的民间知识分子乘着邓的成功掌权，又提倡思想解放，遂大胆发表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其中尤以魏京生等人的文章最引起海外人士的瞩目。¹⁹在文艺界方面，伤痕文学也开始流行。邓担心如此放任下去，全国各界人马将继续无限大地诠释及运用思想解放之便而行己之议程。因此在1979年3月29日，政府就开始抓人，许多民间异议分子因此被扣留多年。而到了第二天，便有邓的“四项坚持”之说。

“四项坚持”宣布之后，后续而来的还有邓点名作家白桦的作品〈苦恋〉进行批判。1980年大字报等的言论自由被明令取消。1981年许多推动民运的人士被判以重刑。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导致许多中共党内的开明党员被整。在邓的主导下，中国的舆论自由尺寸是由邓量身裁剪的。

在发展经济方面，1978年的工作会议里他有发言建议，但过后具体实行的政策方面他就交给行政系统的相关领袖了。例如在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包括同意通过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不过在邓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主导下计划里强调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亦被修改。当时，老干部陈云也被增补进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国家经济政策部分。讲究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陈云当时大力主张对基本建设的拨款及发展需要进行大调整，应把国家在大型基建的支出挪出来用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上面，使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协调起来。陈云的看法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之前华国锋推行所谓的“洋跃进”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力，借了不少外债引进许多大机器来搞大型的基建，使国家经济的负担难以负荷，国民经济低迷。²⁰ 不过陈云在中央进行调整的同时，邓小平所提倡改革的权力下放也同时实行。当时在四川试点扩大企业自主名震全国的赵紫阳被调到中央来替代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在1979年及1980年初，国务院更通过一系列有关企业扩权的文件，因此就算在1980年国家计划的大中型基建项目被停建缓建，但地方项目同时却增加，调整因此成了空话。到了1981年，基建基本已失控，国家被迫增发钞票来解决一连3年的财政赤字。²¹ 中央也暂时收回权力，紧紧地控制全部支出。²² 因此在1984年10月以前，企业权力下放自主的改革又被收回，有的只是局部试点，没有全面实行。邓的理念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草草叫停，可见他不怎么懂得经济。不过1978年时他主要还是想先打倒华国锋集团。后来经济调整政策实行了三年之久，到了1981年底，国家的财政赤字才降至一个合理的水平。²³ 然后1982年及1983年才慢慢好转。

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主要影响到城市地区的发展。而范围更广，占几乎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在邓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里只提到要给生产队更多的自主性。但是1978年的时候，其实许多农村的人民已经

在极左的共产主义下到了饥荒的地步。不管是农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因为农耕工作目标由领导决定，收获好的时候不分勤懒全部人分享，收获少也一样不分勤懒全部人承担，因此农民的个人积极性已被大大地挫低。就在中共中央大伙火热地开着中央工作会议时，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的生产队，却和干部立下生死契，冒着杀头危险进行分田，各自耕作自己的农地，结果在1979年时大丰收，但那个时候三中全会的决议犹在三申五令“不许行包产到户，不许包干到户。”²⁴ 幸好主管农业的中央大员万里支持农民的做法，其实当时的趋势是挡也挡不住。结果到了1979年底，党中央才稍微通融，称那些给予特殊需要、偏远地带或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才给予准许。²⁵ 至到了1980年，邓小平亲口承认农村改革在他的意料之外，但他不反对，而且还把功劳还归于那些勇敢的农民。²⁶ 其实邓的改口也难怪。当时他的改革图像几乎全都被搁在一旁，经济发展还不见起色，几乎就是农村的改革带来加倍的正数，因为不但农产品收获大好，同时它也带动起农村附近的乡镇企业，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不少的贡献。人民公社的角色也在包产到户后逐渐减退，终于在1983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下令解散，把权力归还给各阶级的地方政府，因此农村地区美其名也是农村改革了。

80年代初期几年，邓小平的改革图像在农村有意料之外的发展，在城市地区却因调整政策的进行而宣告牛步寸行。当时几乎只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而已。幸好1979年时广东的领导人向邓提一个不错的建议，那就是建特区。特区就是由地方政府划一块地区成为特别行政区，在那里区领导可以订立比其他地方更灵活的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资金，到当地设厂加工生产产品再出口，以赚取外汇。起初只有四个地区即深圳、蛇口、厦门及珠海，后来成效奇好，于1984年3月中央政府再度宣布开放另外14个地区为特区。

这里我们看到邓作为一个七十多岁老人但思想却还没有僵化的体现。他还是非常清楚地让改革与开放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任何措施或手段可以让国家的经济受益他都毫不犹豫地支持，即使是引起中共党内所谓左派的领袖微言，引马列毛证明走资他都在所不惜。但在政治的层面，虽然他也口口声声要进行政治改革，其行动方面有所见效的也只有精简

公务员机关、取消终身职位制及平反文革右派等。在提供人民的言论自由及多党制方面，在他的思维里则是天方夜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只打算进行不干扰社会稳定改革及开放而已，所以他也提选接班人而不通过竞选来决定。早在三中全会过后不久，邓就让胡耀邦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然后1980年他又让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李先念担任被虚位化的国家主席、彭真则成为人大议长。按照邓的说法这是让新一代的领袖接班。而且这也是贯彻责任制的其中一环。因为一旦领袖可以终身担任，他一定把任内的过失尽量推卸。但在1982年后大部分的老干部退下领导班子的第一线后，作为中共建政第一代的领袖的邓却还在政治局常委及军委主席位子上。他这种不退的特例，造就了他在党内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里对资深领袖的尊重，他不再需要对改革与开放提出具体的实行政策及进行执行工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没有当年毛泽东退居二线领导时所遭受的冷落。尽管胡耀邦对舆论的态度比邓更开明赢得人民的爱戴，但当1986年的学运被闹成国际注目的事件时，邓还是迫胡进行自我检讨及要求辞职。他因此成功显示权威犹存，任何人的升与迁还是要听决于他。后来赵紫阳、江泽民甚至是胡锦涛都是如此。

邓对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稳定相当重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80年代里不断出手镇压他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和“极左”的左派。但是当他提拔的赵紫阳在国务院推动的经济改革在1984年10月引起社会混乱后，他没有归咎于改革不对，反之认为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耀邦把关不严，因此让胡自己要求辞职，再换赵紫阳同时出掌国务院及中共两个系统。当时赵在意气风发之余，同时也认识到在邓小平强大影响力之下，他如何可以顺利接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他身边智囊团的关系，赵在执行邓的改革与开放的路向上借鉴了不少西方的理论。1984年10月的城市经济改革当中就让人看到经济“振荡治疗法”的影子。而其后他的智囊顾问包遵信及苏绍智等人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打算为上述种种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基因的理论在中国实施寻求解套或诠释。²⁷而“新权威主义”就是一种想方设法为赵树立本身权威的意见。无论如何，赵需要让人接受的还是他在经济治理上的成就。经过几年的调整及调养后，1988年，邓显然等得不耐烦了，他呼吁各方领袖把改革的步子

加快，尽快实行主要是城市地区的企业、金融、价格、工资等一揽子的改革。²⁸ 赵因此得到邓的大力支持，于当年又再进行一次大幅度的改革。谁知不但改革再度引发社会大幅度的混乱与失序，就如当时人们形容得如“一放就乱”，同时还引发民众一路来在改革里承受混乱、官员腐败及乘机中饱私囊的气，²⁹ 结果爆发了影响至钜的1989年六四民运。邓再一次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委书记不满，赵只好下台。³⁰

五、结论

邓决定以强硬的手段镇压六四民运以后，他在选定来自上海的江泽民后不久就宣布退休，从全部官方职位退下来，成为名义上一介普通的平民。后来因为接班的江像当年的华国锋那样过于拘谨行事，导致国家改革进程于90年代初几近停顿。邓被迫于1992年以南巡发表谈话的方式为他解套。值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进程才一日千里，带领中国的经济成长及现代化至当今一个令人瞩目的程度。

从这段改革与开放的路程中看来，当中的曲折迂回无数。邓小平作为这段路程的领航者当然必须为这样的过程承担不少责任。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他本身的性格、视野及能力的局限在这改革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开始他对改革的认识，显然他是注重于把国家从阶级斗争的泥沼里拉出来，然后大力推行鼓励解放生产力的政策，期待国家及人民在经济富足以后，现代化的进程也自然变迁了社会。在这当中，他不容许国家及社会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所以他同时反左也反右。不过其实社会动乱的一个主因还是改革方向的混乱。他提拔的几位接班人在他的庇荫下急于求成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是新时代的发展情况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邓和他的接班领袖就以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边试边做，边错边改，如有任何重大的错失便让社会国家一起承当它的社会成本。但无论如何，虽然历史不能重来，纵观当时的全局情况，邓小平还是最适合出面结束中国当时所面对的混乱和失败。他的改革与开放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道路纵然曲折，中国还是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了。

注释：

- 1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Triump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1–4.
- 2 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5, 1993, pp.414–415.
- 3 同上注, pp.414–415。
- 4 叶永烈:《陈云全传》(香港:明报出版社, 1995), 页 262。
- 5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社, 1998), 页 3。
- 6 许行:《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香港:香港观察者出版社, 1980), 页 29。
- 7 同注 5, 页 652。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的始末, 请参考 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1991, p.245.
- 8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页 615。
- 9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里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回应当时许多干部要求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及为文革后期群众在天安门反四人帮事件平反的呼声。因为当时撤销邓的职务及把天安门事件定调为反革命是毛泽东的决定,所以一旦全国遵循“两个凡是”则邓就无法翻身了。同注 4, 页 647。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版, 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页 45–47。
- 11 Dwight. H. Perkins 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实事〉, John K. Fairbank 费正清 Roderick MacFarquhar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66–1982) (海南:海南出版社, 1992), 页 502。
- 12 同上注。
- 13 同注 2, p.420。
- 14 同注 11, 页 140。
- 15 在整个夺权的过程中, 邓当然希望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冤案立刻解决, 因为那当中牵涉到他个人历史定位的问题。他必须尽快洗清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定性, 同时解放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支持者。但与此同时, 当时四人帮和凡是派的实力犹在, 所以他倾向于不立刻解决文革定位的问题。

-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版, 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页 142。
- 17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页 267。
- 18 同上注, 页 164–165。
- 19 魏京生在 1978 年 12 月 5 日以“金生”的笔名在北京西单街民主墙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而闻名。当时其他著名民间异议分子还有“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北京之春”的严家其、王军涛、“中国人权同盟会”的任畹町、赵兴等等。请参考高皋:《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潮流》(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3), 页 211–218。
- 20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Compilation Committee,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1980* (Beijing: Agricultural Publisher, 1981), p.374.
- 21 同注 5, 页 678。
- 22 有学者认为, 中共看来更像是拥抱改良版的传统苏联经济集中制, 而不是打算改革它。Robert F. Dernberger,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Four Modernization Program”, Atlantic Council (ed)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Boston: Oelgeschlanger, Gunn and Hain, 1984), p.178.
- 23 《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 1984), 页 445。
- 24 马力诚与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出版社, 1989), 页 90。
- 25 同注 5, 页 684。
- 26 同注 11, 页 315。
- 27 Su Shaozhi, “A Decade of Crises at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1979–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4, p.340.
- 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页 265。
- 29 Jean-Louis Rocca, “Corruption and its Shadow: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Corrup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pp.411–412.
- 30 其实中共精英的争斗及接班都有自己的一番模式及传统, 相关论述可以参考 Lowell Dittmer, “Patterns of Elite Strife and Succession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3, pp.427.

马来西亚华人问题

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华文学研究： 学院建制与主体意识的滥觞

庄华兴

一、前言

在马来西亚文学系统 (Malaysian literary system) 中，马华文学的在场标志着一脉特殊的文学与文化景观。它始自二战前离散的中国文学，战后逐步本土化，无论就精神、情感、语言与文化符码的操作都体现出高度的自觉。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它对身份、主体属性的探索愈形迫切，也隐隐然促进了它与国内主流/宰制文学的对话。这种现象在批评论述领域尤其明显。其特殊性在于它有能力激发各种可能性、生产意义。在政治意志力深刻主导大马文化语境的今天，无疑的，马华文学是最凸显的抗争话语形式，从而凸显了它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这与马华文学研究机制的逐步建制化不无关系。下文将就马华文学在学院建制中的成果做简单的报告，并尝试进一步检视它在全球化语境中，马华文学的跨国学术对话对本土知识建构的作用、成果，以及马华文学研究如何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建立其主体意识。

二、学院建制：性质与成果

马华文学作为一个新兴文学 (New Emergent Literature) 形态，最让学

界与文学批评界关心的是在它播迁本土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在自我身份与主体意识的塑造究竟臻达什么程度。在曲折的历史发展中，最显著的是它体现为朝着大马社会科学范畴内一个新学门发展的趋向，大有引领本地学术风潮之势，¹同时也紧紧牵引着国内外学界与批评界的关注。从大型文学会议的频密主办、民间团体的鼎力支持、公众的踊跃参与到议题的繁复性和批评理论的多元取角等都印证了上述说法。²此外，以马来文和英语写作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在累增之中（篇目/书目见附录二），说明它的研究群体在逐步扩大以及马华文学被提升到更广阔的研究范畴——从文学到文化层面。可以说，在国内学术界，马华文学业已朝向一个新兴学门的路径前进，同时被安顿在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课程结构之中。这一切，可以追溯到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开设马华文学课之初。1966年，该大学中文系主任林徐典延揽方修先生为兼职讲师，讲授《马华新文学》，从此立定了方氏钻研马华文学的志向与决心，终促成《马华新文学史稿》三册、《马华新文学大系》等重要文献。此后，南洋大学（80年代）、马来亚大学（1990年代初）、南方学院（1996）、新纪元学院（1998）、韩江学院（1999）、拉曼大学（2002）、新加坡开放大学（90年代）相继开办马华文学课程。早在1967年，马大已有研究生以马华文学撰写硕士论文。始作俑者是当时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俞王纶女士，³其指导老师正是享誉中外的新马及东南亚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教授。截至2006年，马大中文系已成功培养四名这个领域的博士和十二名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为陈应德（1990年毕业）、永乐多斯（1995）、孙彦庄（2005）和庄华兴（2006）（详参附录一）。在国外，以马华文学为研究课题，并考取硕、博士学位者亦不少。⁴下表为我们提供比较明晰的认识：

学位	区域						总计
	大马	新加坡	台湾	中国	香港	美国	
文凭	9	-	-	-	-	-	9
学士	27	20	-	-	-	-	47
硕士	12	27	4	6	1	-	50
博士	4	4	1	3	-	1	13
总计	52	51	5	9	1	1	119
百分比	43.7%	42.9%	4.2%	7.6%	0.8%	0.8%	-

表一：各区域各级马华文学学位论文统计

三、朝向一个新学门的开始

学术研究成果清楚地揭示，马华文学研究已初步具备成为一个新学门的基础。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它的学门建制基础在哪里？广州暨南大学饶芃子就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化问题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

一门学科的诞生需要它自己的哲学基础，换言之，一门学科之所以被称为“学科”不单单其外在的如被开课、被研讨之类，而是指它包含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人类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独特途径。除此之外，它还应包含许多规律性的、别的学科无法涵盖的东西。”（饶芃子、费勇 1998：18）

对于具体的学科建制，饶、费坦率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已成为一门学科，令人怀疑，因为许多著作还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之上，给人印象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国别的“华文文学”中抽出一些作家，加上生平资料，组合而成（同前）。她进一步指出，“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即使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而言，重要的是解释。如果不能透过现象作出深刻的“解释”，又谈何学术或学科。那么，换一种问法，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是否具备被“解释”的广阔空间，从而成为一门“学科”呢？我们的回答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在现在，它更多的恐怕只是一种课题性的研究，在当代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所居住国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还有历史学、文化学中寻找到用武之地。”（同前）

以上说法是中肯的。检视过去四十年来马华文学在各高校的学术研究概况，确实无可否认，过去的马华文学研究始终停留在材料的整理与罗列之上，深层理论建设到近几年方有改观。过去的研究总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大家的关怀重点，也几乎形成这个学门的基本知识，并成为其他研究议题的起点，因而难有新视野。林万菁（1978）、丘柳川（1978）、黄森同（1978）、郭惠芬（1997）与朱文斌（2004）都曾经集中探讨这个层面，似乎说明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内在关系是历史事实，也是当下的事实，有必要加以传承、发扬，因此对自身命运的往后流向始终不及思考。学界一般上把这中国——马华文学收

授关系视为继承文化传统的必然途径。然而，张锦忠却独排众议，认为这样的认知对马华文学造成的干扰多于正面意义(2003: 127–134)。张的论述在文学系统关系的研究上是一个崭新的视角。他把十九世纪海峡(土生)华人创造的文库以及马华旧文学纳入讨论范畴，开创出一脉比较能完整体现马新华族命运的文学史叙事，马华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也开始略见端倪。然而，检视张氏后来的学术规划——突出马华文学离散命题，推出新兴华文文学理念——我们发现张氏的意图其实并不在此，因此当初的开创性成果始终未能开花结果。笔者曾就此议题在今年(2006)三月号《中外文学》提出讨论，此不赘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张氏最初的工作对其他各个时期的学院研究成果的确起着串联/概括作用，对揭开长期以来学院马华文学研究的潜在精神结构颇见成效。换句话说，我们透过张锦忠的复系统理论散发的解释效力找到贯穿零散而不失珍贵的文学/文化意义。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以及时间的推移，这些散乱的意义逐渐被掩埋，进而有被遗忘之虞。其实，过去有关文学本土化及马来亚化的微观研究并非毫无收获，或毫无意义。周亚珠(1979)、李子玲(1981)和苏卫红(2002)的论文即探讨战前及战后马华文学作品中的南洋色彩。尤其是苏卫红，尝试深入小说文本，勾勒战后初期至新马分家马华知识分子的心理转折与嬗变。众所周知，这个阶段是马新大历史急剧变动的年代，是催生马华文化/本土知识最关键的时期。⁵ 研究者的立意与命题基本上契合、呼应了上述历史诉求。除此以外，各时期的宏观研究也不少，颇能涵盖各文体的发展，包括新旧诗，小说和戏剧。作家与作品研究也累积了一定资源。而事实也说明，以上两个范畴也是研究者的关注点。纵然在某些文体的研究中，焦点往往投在其历史进程，文体本身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因此，难免出现某些问题未获解答的困窘，诸如：相比之下，为何某些文体不能很好地发展、文体消长与客观社会环境的关系，等等。⁶

至于有关作家研究，几个重要的名字及其作品都获得研究者关照。其中包括邱菽园、方北方、韦晕、方修、温梓川、苗秀、张金燕、管振民、陈如旧、铁抗、商晚筠、梁放、小黑、朵拉、云里风、李忆君、翻腾、劲草、潘雨桐、李永平、陈大为、钟怡雯等。除了几个在选择研究

对象出了问题，⁷ 其他各家都有各自的代表意义，而我们也留意到，研究案例不断在积累、扩大之中。

跨语际马华文学比较研究要等到1990年代中期方才开始。研究者尝试进一步把马华文学置于马来西亚文学大系统的元架构中进行考察，对主体意识的深化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以永乐多斯(1995)和庄华兴(1999)为先导。更早之前(1965年)，陈真光在马大马来学系撰写学士论文〈马来文学中译：以新加坡的出版物为对象(1959–1963)〉，⁸ 可视为华马跨文化研究的前驱，取径乃从翻译文学入手。

马华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向来乏人问津，涉足者也少有做得好的。迄今，只有林文锦(1986)和林顺福(1994)涉及这个场域。两者锁定在战前和战后的五年时间，认知不免受方修史学方法左右而难有超越。

在各项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是报章与文学副刊的研究。历史告诉我们，副刊学对马华文学系统的形成有重大的作用。除了华文教育和华团，它就是维系马华文学生态于不枯竭的第三根支柱了。对应于战前的出版条件与识字率，此言诚然不虚。职是，徐艰奋(1998)对《益群报》的研究愈显得珍贵。徐氏为读者勾勒了若干有关战前新马左翼思潮、左翼文学的初始状况以及它和中国左联的关系的重要线索⁹，为(战前)马华文学起源论述提供一脉异于方修先生所谓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渊源，更为战前至战后高涨的马华左翼/革命文学赋予坚实的理论依据。¹⁰

基本上，从1965年至2006年四十一年间，学位论文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下列若干主题：

- 1、文体及其发展
- 2、作家与作品
- 3、文献与目录
- 4、文学影响
- 5、比较文学
- 6、本土化议题
- 7、翻译文学与文化生产
- 8、文学与社会/政治
- 9、批评与理论研究

- 10、人物与人物形象
- 11、文学奖
- 12、报章、文学副刊与文学史
- 13、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写作

学院马华文学研究虽然以新马两地为主力，但晋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已有显著的改变。中国大陆高校的研究生开始涉入这领域。目前至少有三位南京大学研究生已就马华文学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取得博士资格。他们是许文荣、李满枝与朱文斌。在新加坡，其中两位博士毕业生也是来自大陆。就目前所见，大陆研究生倾向从社会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范畴包括海外华人认同与主体意识问题、马华知识分子的心态转变、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置于中国学界的世界华文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脉络，其实上述取角并不难理解。晚近，马华文学也开始引起欧美某些大学东亚系的注意，美国哈佛大学、儒者大学(Rutgers University)都有研究生或后博士以马华文学撰写论文。这种发展势头必为未来马华文学研究提供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全球化趋势底下，相对于中国学研究，含马华文学的华人研究(广义的汉学研究)这一板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与话语意义将是未来学界竞相开发的目标。

四、余论

马华文学研究的学院建制从方修开始，迄今已跨越40个年头。它不仅成功累积一定的文化资源，也启动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建构机制。今天来回顾与检视这40年来的学门建制，自有其重要的意义。作为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马华文学研究是否具备学门建制之条件？

如果华文文学共同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则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是这个共同体之中一个体制相对完备的文学系统。虽然它的公共体制(含平面媒体到晚近的电子网路)、教育体制、出版体制和文化消费仍欠完备，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电子网路的通行却成功打破因(民族)国家主

义筑起的语言高墙与资讯封锁。近十几年，本地学术界在批评体制的参与也为马华文学学门建制做出了贡献。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术研究人员的递增、批评理论的挪用与建设，以及晚近的重写文学史诉求，在在显示各造对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追求，虽然个别的立足点不尽相同。譬如张锦忠的复系统理论便指向传统中国文学影响论，而离散话语与新兴华文文学理念则明显为“在台马华文学”寻求定位。¹¹ 这些在张氏的博士后研究都有进一层阐发，最近的例子是探讨在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关系，所追求的已是更进一层的“新兴华文文学”新天地了。

在全球化语境中，无论透过整体汉学圈的碰撞与交流，或透过其他形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对话(如东南亚研究学术会议、世界离散华人会议、东方学会议等等)，马华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将更鲜明。从取材立意、研究立脚点、理论挪用的自觉性到方法取径的多元性将充分体现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像它即将面对的挑战。首先，它必须面对国内的马来民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晚近马来文化界对中文报销售量增加而马来报份滑落所表达的忧虑，以及对国家电影的界义讨论与争议¹²(针对越来越多在国外得大奖的非马来语独立短片/划清界线)，或多或少传达了那种情绪反应。在根深蒂固、纯粹性马来政体(Malay Polity)的观念主导下，凡事以马来文化为核心(teras)，其他文化可有可无，或无关宏旨，更勿论什么身份名位。而谈马华文学/文化主体与身份属性不置于宏观的马来西亚架构是对状况认知不足，能走多远也颇令人怀疑。

注释

¹ 2005年7月初，大马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学术会议即印证了这个说法。不仅会场上的讨论热烈且尖锐，会后在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的延伸讨论/论争似更猛烈，大抵能说明此领域对一般知识群体的吸引力及其关切程度，这种现象在大马中文学界是少见的。相关讨论文字仍可见于有人部落网页 <http://www.gotmag.com/blogs/gotmag.php?cat=160>、留台联总网页 http://www.faatum.com.my/news_detail.php?id=100 及其他电子媒体。

- 2 马华传统批评受五四新文学以及三〇年代以降中国左联的影响很深，一般采用简陋的印象式与杂文式批评，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初期。七〇年代中期以后，新批评开始登陆，不过也仅限于现代主义文学小圈圈。九〇年代以后，批评风气明显改观。旅台学者如张锦忠、黄锦树、林建国等对马华文学理论批评多有建树。张介绍复系统理论、黄借助人类学视角，新加坡王润华也提出后殖民华文文学理论等，一时众声喧哗。进入新世纪，不少本地学子到大陆攻读高级学位，有者以马华文学为研究对象，充分借助大陆理论资源（虽然都是西方转手的理论批评），开创了崭新的论述空间。
- 3 俞王纶原籍北京，时任马大聘约讲师。教职终止之后，随夫移居美国。她的论文以中文撰写，题目是《马华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小说创作为重点之研究》，附英文题目“*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orks of Fiction*”，部分章节亦刊于《班苔学报》（马大华文学会出版）、《岛屿》（*Archipel*, 法国社科院学刊）（更多详情请参附录二）
- 4 博士阶段有黄森同（Wong Seng-Tong, 美国威斯康辛迈迪逊校区, 1978）、李庆年（新加坡国立大学, 1993）、张锦忠（Tee Kim Tong, 国立台湾大学, 1997）、许文荣（中国南京大学, 2002）、苏卫红（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2）、郭惠芬（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2）和朱文斌（中国南京大学, 2004）。获硕士学位者更多，此不赘，请参附录一。
- 5 至今仍未有一部完整研究马华人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两部比较接近的著作是崔贵强《新马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向》（1990）与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2002）。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所提“马华人思想”并不能等同于“马华文化思想”。作为一个贫瘠、受强大客观条件限制的文化场域，在现阶段要寻找马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许要大失所望，但华族在此落脚百年有余，为了传承文化、维持生活信念，前人所进行的各项人文活动——文学与非文学的、学术与非学术的……，当不在少数。探讨其中的思想脉络，是为认识马华人思想结构的途径之一。我们了解到，过去不少马华文化人皆非纯粹意义的作家，他们的生命历程或因岁月的递增、或因客观环境的形塑而改变了写作重心，如林晃升早期是文艺青年，后期参与华教斗争，但并未完全辍笔。更多的是文史双栖者，如许云樵、陈育崧、温梓川、庄之明、林英强……（这些人留下了一定量文本等待处理），在我们身边的人物则有张景云、张木钦、郑良树、张少宽、李业霖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马华文化人的民间/草根属性与中国传统读书人叠合的身影，即便如郑良树这样一位科班出身的正规学人也毫不减前述特色。
- 6 譬如在战前，戏剧的发展与抗战以及中国左联作家（如陈慧玲、马宁）在新马的大力推广有密切的关系。
- 7 症结出在甄选研究对象的标准与尺度问题。例如林素贞（2003），以云里风在八〇年代的散文作为研究主体不仅令人不解，同时研究范畴只集中在南洋商报刊登的作品，令人不敢苟同。

- 8 陈氏英文名为 Tan Chin Kwang，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学系讲师。他后来转入研究战后马来小说作者的思想背景与思想困境，写成硕士论文 *Latar Belakang Intelektual Penulis-Penulis Cherpen Melayu Sa-lepas Perang Dunia Kedua (1946–1970)*（《战后马来小说作者的思想背景 (1946–1970)》），新加坡大学，1971）及博士论文 *Post-War Malay Fiction and Its Critics and Scholars: A Study in the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战后马来小说及其批评与研究者：思想困境与文学进程研究》），新加坡大学，1978）。他于任内猝然逝世。
- 9 《益群报》也是 30 年代提倡无政府主义新兴思想的报纸。其中一位编辑主任刘克非是中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弟弟。刘克非也是战前新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当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轩辕难辨。许杰于 1928 年 7 月下旬自上海避难南来，应聘加入《益群报》。1928 年 8 月 23 日，许氏创办文艺副刊《枯岛》，大力提倡新兴文学，对战前新马文坛产生重要的影响。马大邱家金教授（Khoo Kay Kim）认为战前无政府主义运动是新马华人政治极端主义（political extremism）的源头。而他间接参引的文献也是《益群报》，由于不谙中文，论述无法有效开展。详参氏著博士论文 1973。
- 10 实际上，方修秉持五四新文学的“文学革命”精神只不过解释了部分战前马华文学的实际情况。简言之，方氏只成功突出战前作品的反封建特质，至于左联“革命文学”提倡的反帝反殖在方修理论操作中只见论述却不见文本，翻开大系端倪即显。
- 11 笔者曾经指出张氏离散马华本体论与中国学界强调的离散——原乡论应合，对西方学界的离散族裔理论也未经反省而加以挪用，能否达至张氏本人提倡的新兴华文文学理念远景仍不乐观。此外，在面对新兴华文文学内部其他资源强大的文学系统，马华文学是否将陷入另一种霸权关系之中。诸如此类问题，迄今仍未见张氏明确的解答。笔者相关讨论见庄华兴 2006: 51–59。
- 12 最显著的是以国家电影局（Perbadanan Filem Nasional，简称 FINAS）衮衮诸公和新浪潮马来电影 / 媒体工作者就“（马来语）对白”（bahasa verbal）和“电影语言”（bahasa filem）的公开论争。前者坚持只有以马来语为对白的电影才能维护马来文化在国家文化中的核心位置；后者认为电影有它自身的标准，电影语言不应和通行口语混为一谈，只要它反映大马现实即可，代表人物是著名马来独立电影工作者阿密尔·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马来媒体上时有作者就此课题发表意见，《前锋报周刊》Siti Jarum 在她的每周专栏“贴心狠话”（Cubit Manja）发表的相关辛辣短评便是一例。
- 13 笔者以为，有关目录已网罗绝大部分论文，少数由个别指导老师收藏而未见于大学/学院图书馆者（尤其是本科学位论文，一般都未进入馆藏），只好暂时从阙，有机会他日再作补充。

参考书目

- Boehmer, Elekke 著：《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出版社，1998）。
- Clifford Geertz 著：《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台北：麦田，2002）。
-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2005年7月30日）〈用心笔耕、丰饶文学：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http://www.fatum.com.my/news_detail.php?id=100。
- 饶芃子、费勇：《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王列耀：《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徐艰奋：《铁笔春秋：马来亚《益群报》风云录》（新加坡：新社，2003）。
- 有人部落（2005年9月）〈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专题〉，<http://www.gotmag.com/blogs/gotmag.php?cat=160>。
- 朱文斌：〈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综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页261–277。
- 庄华兴：〈描述、想像与翻译主体性：马华文学理论批评案例〉，《中外文学》（2006年3月），34（10），页43–60。
- 朱立立：〈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http://fass.net.cn/fassNews/fass_ReadNews.asp?NewsID=628。（2005年9月3日）
- Khoo Kay Kim.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Extremism in Malaya 1915-1935*. Ph.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Histor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3).

附录一：马华文学学位论文累增目录（1965—）¹³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1	1965	陈真光 Tan Chin Kwang	Kesusasteran Melayu dalam terjemahan Tionghua (1959–1963); khasnya yang diterbitkan di Singapura	学士	马大马来学系	马来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2	1966	洪天赐 Ang Tianse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学士	马来亚大学	英文
3	1967	俞王纶	马华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小说创作为重点之研究	硕士	马大中文系	中文
4	1969	黄森同 Wong Seng-Tong	Hwang Pai Hwang: Seorang Penulis Kesusasteraan Tionghua-Malaysia yang Terkenal	学士	马大马来学系	马来文
5	1972	林关浩	马华四部长篇小说研究：浓烟、热瘴、火浪、浅滩	学士	南洋大学中文系	中文
6	1973	郑玉芬	论马华十部长篇小说	学士	南洋大学中文系	中文
7	1977	叶淑雯	新马华文艺参考书叙录	学士	南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	1978	林万菁	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1927–1948	硕士	南洋大学中文系	中文
9	1978	丘柳川	中国抗战文艺与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	硕士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中文
10	1978	黄森同 Wong Seng-Tong	The Impact of China's Literary Movements on Malaya's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19 to 1941	博士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英文
11	1979	周亚珠	马华文学南洋色彩的提倡（1927–1930）	学士	南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2	1982	李子玲	南洋色彩的提倡——早期马华作品评论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3	1983	郭荣贵	战前五年的新马戏剧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4	1983	林顺福	战后五年的新马戏剧（1945–1949）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15	1984	陈世俊	苗秀及其小说评论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6	1984	盛秀华	马华抗战文学评论(1937—1942)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7	1984	唐美安	张金燕小说中的新加坡华人妇女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8	1986	林文锦	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1937—1941)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19	1986	姚梦桐	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20	1986	周维介	The Literary Career of Xu Jie	硕士	香港大学文学院	中文
21	1988	陈慧华	郁达夫“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22	1990	陈应德 Tang Eng Teik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Poetry 1945—1969	博士	马大中文系	英文
23	1990/91	陈韵宁 Chan Yein Ning	Kajian Cerpen dan Novel Wei Yun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24	1990/91	Lee Su Mei	Bibliografi Esei-Esei Pengajaran Cina dalam Akhbar-Akhbar Cina Tempatan (1970—1989)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25	1990/91	Tan Yeok Sim	Bibliografi Fiksyen Mahua Moden dalam Akhbar-Akhbar Cina Tempatan (1970—1989)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26	1992	程慧婷 Ching Wai Teng	Asal-Usul dan Perkembangan Puisi Mahua Moden (1959—1974)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27	1993	孙彦庄 Seng Yan Chuan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Malaysia (1919—1969): Its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ative Playwrights	硕士	马大中文系	英文
28	1993	李庆年	马华旧体诗演进史	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29	1993/94	Chan Foong Yee	Perkembangan Kesusasteraan Mahua Pada Tahun 1970-an.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30	1994	Chew Chui Kian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Tionghua dan Pengaruhnya terhadap Kesusasteraan Tionghoa Sarawak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31	1994	卓金香	三十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新马华文文学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2	1994	林清福	当代马华乡土小说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3	1994	林顺福	战后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4	1994	柯思仁	战前新马的戏剧副刊与戏剧评论(1924—1941)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5	1995	李荣吉	管震民诗歌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6	1995	永乐多斯 Yulduz Emiloglu	Suara Batin Wanita: Satu Kajian Perbandingan di Antara Karya Penulis Melayu Dengan Karya Penulis Wanita Mahua 1957—1982	博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37	1996	黄佟葆	《叻报附张研究(1887—1922)》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8	1996	黄良玉	张金燕作品评析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39	1996	詹道玉	反殖时期的马华戏剧(1945—1959)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40	1996	卢雁玲	废名小说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1	1996	黄嘉豪	郁达夫旧体诗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2	1996	苏卫红	战前五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3	1997	Ng Kok Keong	Cerpen Mahua yang Berwatakkan Bukan Tionghoa (1970–1996): Satu Usaha Mendorong Persefahaman Masyarakat Malaysia.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44	1997	郭惠芬	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 1919–1949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5	1997	王志伟	邱菽园咏史诗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6	1997	张锦忠 Tee Kim Tong	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 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	博士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研究所	英文
47	1997	欧清池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	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48	1998	陈富兴 Chan Foo Heng	Puisi Mahua 1945–1957: Satu Kajian Kritis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49	1998	游俊豪 Yow Chuen Hoe	Antara China dan Tanah Tempatan: Satu Kajian Pemikiran Dwipusat di Kalangan Penulis Cina di Tanah Melayu (1919–1957)	硕士	槟城理大	历史系 马来文
50	1998	徐艰奋	《益群报》研究 (1919–1936)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51	1999	赵翠玲	感觉罐子里的乡情：读者理论关照下的郁眉散文作品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52	1999	刘旭晖	郁达夫的小说理论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53	1999	黄银华	王润华《南洋乡土诗集》的语言风格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54	1999	钟慧君	从《烟雨砂隆》及《玛拉阿姐》小说集中探讨梁放短篇小说的乡土特色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55	1999	何美珠	马华儿童小说的创作特色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56	1999	吴碧燕	从修辞格探讨何乃健环保散文的语言特色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57	1999	庄华兴 Chong Fah Hing	Keselarian dan Kelainan Tema Antara 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1957–1993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58	1999	蔡美丽	马华文学本土化小说研究	硕士	南洋理工大学华语语言文化中心	中文
59	2000	李碧毓	潘雨桐小说创作技巧初探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60	2000	林国聪	婆罗洲的书写者：论张贵兴小说的写作轨迹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61	2000	骆雨慧	重描历史的轮廓：探讨陈大为的史诗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62	2000	陈玉娥	吴岸《榴连赋》中的自然景物描写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63	2000	蔡舜屏	温梓川与马华文学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64	2000	陈春燕	游艺场里的话剧 (1930–1950)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65	2000	陈秀琴	陈如旧抗战诗歌析评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66	2000	潘家福	1959 至 1965 年新马华文诗歌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67	2000	黄妃 Wong Hee	Perkembangan Sastera Cina di Sarawak (1950–1962)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68	2000	Choo Siew Hwa	Wei Yun dan Fang Beifang Sebagai Tokoh Kesusasteraan Mahua Moden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69	2000	王文真	现代马来西亚华文剧场的发展——以吉隆坡为导引	硕士	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研究所	中文
70	2000	魏先努	困境与突围：论马华新生代诗歌	硕士	中国汕头大学华文研究中心	中文
71	2001	戴恩敏	从阴暗和堕落中寻求自我救赎：以黎紫书小说人物的心理意识看现代人的病态性格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72	2001	韦佩芬	马华文学的屈原抒写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73	2001	杨月美	中华文化的传承、西方文化的熏陶、本土文化的培植：论梁放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意识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74	2001	蔡玉冰	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意象探讨	文凭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中文
75	2001	庄薏洁	黎紫书短篇小说的悲剧倾向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76	2001	祝有运	李忆君《春秋流转》中女性的情感际遇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77	2001	汪金芳	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以及《七色花水》中女性形象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78	2001	林慧心	女性的抉择及其命运：李天葆小说集《桃红秋千记》与《南洋遗事》女性角色探讨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79	2001	颜慧心	傅承得诗歌中的家国情怀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80	2001	陈汇昆	铁抗及其作品研究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1	2001	李永乐	鲁迅在新马的神话与现实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2	2001	刘海莲	红树林里的马华文学伉俪：小黑，朵拉创作世界评析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3	2001	毛丽妃	梁放文学作品中的人道关怀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4	2001	黄淑玲	《南洋时报》与二十年代后半期新马华文文学(1927–1930)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5	2001	李彩萍	《新国民日报》副刊《小说世界》研究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6	2002	林明珠	马华文学中的花踪	学士	新加坡开放大学	中文
87	2002	陈翠玲	留台联总《马华儿童小说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初探(1989–2000)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88	2002	严晓雯	《叻报》中的小说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89	2002	张萱萱	刘思诗作论析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90	2002	萧裕泉	商晚筠短篇小说集《痴女阿莲》和《七色花水》论析	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91	2002	陈𬀩春 Ting Hea Chuen	Penulisan Feminisme Fiksyen Mahua Siswazah-Siswazah Universiti Taiwan (1970–1995)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92	2002	Ng Kok Keong	Kajian Imej Etnik Lain dalam Cerpen-cerpen Mahua (1970-an–1990-an)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93	2002	梁春芳	战后二十年新加坡华文新诗研究 1945–1965	硕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94	2002	禤素薇	马华儿童文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本土意识	硕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中文
95	2002	李满枝	当代马华小说研究：“以文证史”的视角	博士	南京大学	中文
96	2002	许文荣	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研究	博士	中国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中文
97	2002	苏卫虹	嬗变中的知识分子心态：新马华文小说研究（1945—1965）	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98	2002	郭慧芬	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作者心态与作品形态的重点论析	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中文
99	2003	李彩茵	从平实到繁复：马华微型小说发展初探（1965—2002）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100	2003	林素贞 Lim Saw Tin	Prosa Mahua 80-an: Rujukan Khas Kepada Karya Yun Lifeng, Li Yijun, Fan Teng dan Jin Cao yang diciarkan dalam Nanyang Siang Pau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101	2003	王芳	把自己引向自己：从新马华文小说看新马华族的自我表述	硕士	中国汕头大学华文研究中心	中文
102	2003/ 2004	蒋惠雯	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说中的应用： 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	硕士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	中文
103	2004	潘德成	解读张贵兴〈巴都〉：读者理论的实践	文凭	南方学院中文系	中文
104	2004	Chong Ming Lee	Analisis Cerpen Terjemahan Iaitu Doa Restu, Kasino dan Seusah Perang Mengenai Cara dan Teknik Penterjemahan Serta Membandingkan Perbezaan Budaya Di Antara Penggunaan Bahasa Cina dan Bahasa Melayu	学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105	2004	Tan Ai Reen	马来西亚华语特色初探 Kajian Ciri-Ciri Bahasa Cina dalam Cerpen Cina 1965-1980	学士	马大中文系	中文
106	2004	陈立桐 Tan Lip Thong	Kesusasteraan Mahua yang Bertemakan Cintai Alam Sekitar	硕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107	2004	黄美仪	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	硕士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	中文
108	2004	谢诗坚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硕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韩江学院联办)	中文
109	2004	陈嵩杰	独立前马来亚报章副刊对文化和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	硕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韩江学院联办)	中文
110	2004	刘杏珉	马华文学与华英文学比较：独立后大马华人认同的演变	硕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韩江学院联办)	中文
111	2004	许开求	马华少儿文学论：如何从马华少儿文学推展多元智慧论	硕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韩江学院联办)	中文
112	2004/ 2005	洪王俞萍	场域之内、想像之外的认同形构：骆以军与黄锦树小说比较研究	硕士	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	中文
113	2005	陈美燕	初探钟怡雯散文的语言艺术：从《河宴》到《垂钓睡眠》	学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中文
114	2005	王修杰	多维视角下的女体铭刻：初探商晚筠小说的女性意识	学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中文
115	2005	伍淑芳	论商晚筠小说中的中国性、本土性及现代性的微妙结合	学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中文
116	2005	朱文斌	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	博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	中文

序	年份	姓名	论文题目	学位	院校名称	媒介语
117	2005	孙彦庄	Keprihatinan Sosial Penulis-Penulis Mahua: Kajian Pilihan Fiksyen Pan Yutong, Xiao Hei dan Liang Fang	博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118	2006	黄裕斌	砂华现代文学的滥觞与转型：星座诗社考察	学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中文
119	2006	庄华兴	Sastera Mahua dalam Gejala Kritikan dan Pensejarahan: Satu Proses Penerokaan Jati Diri	博士	马大中文系	马来文

附录二：马华文学研究中的英马文论著编目 (含单篇与专书)

Abdul Samad Said

1980 Prakata Tai Ching Siew, *Oh Sungai Perak, Sungai Ibu* (Terj. Goh Then Chye).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Ang Tian Se 洪天赐

1973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enggara* 6, Kuala Lumpur.
1979 "Pendokumentasian Sastera Tionghua Moden di Malaysia" Ruhani Rustam, Anwar Ridhwan (Penyelenggara), *Dokumentasi Kesusasteraa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07–119.

Amat Mat Top

1976 "Kesusasteraan Mahua Moden Penghubung Dua Budaya." *Berita Minggu*, 11 Januari.

Chong Fah Hing 庄华兴

2002 "Sastera Mahua dan Perkembangan Cerpen 1957–1990-an." *Akademika* 61, Julai, UKM: 35–54.
2003 "Citra Masyarakat Cina dalam Sastera Melayu" *Pemikir*, Januari–Mac, 221–232.
2006a "Pengucapan Puisi Penulis–Penulis Cina: Satu Tinjauan dari Segi Pengaliran dan Kontak Budaya" *Pemikir*. Bil. 43, Januari–Mac, 183–200.
2006b *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Suatu Perbanding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66 pages)
2006c "Pendahuluan" dlm. *Salam Malaysia: Antologi Puisi Mahu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lam Penyelenggaraan)

Fang Xiu, trans. Angus W. Mc. Donald 方修著，麦唐纳译

1977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920–1942*. Tokyo: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Goat Koei Lang-Tan 陈月桂

1989 "Waves of Experiences: The Individual Concep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 Tradition in the Poems of Wu An, a contemporary Malaysian Poet." in Wong Yoon Wah, Horst Pastoors e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 Goethe-Institut Singapore: 173–326.

Goh Then Chye 吴天才

1975a "Puisi Mahua Modern." dlm. *Esei Sastera dan Teori Puisi Penyair*. Kuala Lumpur: Jawatankuasa Yayasan Penerbitan Sastera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Hokkien Malaysia & Persatuan Hokkien Selangor.
1975b "Kesusasteraan Tionghua di Malaysia." *Mingguan Malaysia*, 21 & 28 Disember.
1989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per presented at University of La Salle, Manila.

Hamzah Hamdani

1988 "Kata Pengantar Cerpen Pilihan Sastera Mahua I" Yang Quee Yee (Penyunting). *Angkatan Ini*.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xi–xxiii.

Han Suyin 汉素音

1964 "An Outline of Malayan–Chinese Literature." *Eastern Horizon*, June: 6–16.
1980 *My House Has Two Doors*. Jonathan Cepe Ltd.
1967 "Foreword" Ly Singko, Leon Comber ed. & trans.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Hong Kong, Singapor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21.

Ho Khai Leong 何启良

1980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Malaysia." *Archipel* 19: 199–206.

Jamudin Idris

1994 "Kemiskinan Tema Utama Sastera Mahua" *Berita Harian*, 21 Julai.

Lim Chang Mee 林长眉

1974 "Perkembangan Sastra Sukuan Tionghoa di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ewan Sastera*, 4(7): 51–53.

Ly Singko 李星可

1966 "Introduction" Ly Singko, Leon Comber ed. & trans. (1967).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Hong Kong, Singapor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22–27.

Masutani, Satoshi 斋谷锐 (日本)

- 2001 "Ethnic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in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ird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8 August.
- 2002 "Why Does It Say 'Mahua Literature'?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lay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Exploring Socio-Cultural Exchange in Asia,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Bangi, 25–26 November.
- 2003 "The Style of Borneo Chinese Literature: Wu An and His Group." 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Brunei Darussalam–Jepun,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11–12 Ogos.
- 2004 "From Immigrants Literature to National Literature: Invention of Malayan Chinese (Mahua) Literary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5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The Lo-School, Elsinore, Denmark, 10–14 May.

Mo Yimei 莫倚梅

- 1989 "Thick Smoke: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Nanyang." in Wong Yoon Wah, Horst Pastoors e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 Goethe-Institut Singapore: 314–327.
- 1992 *Local Colour in Malayan Chinese Fiction: A New Approach, 1920–1937*. Bochum: Brockmeyer.

Mohamad Daud Mohamad

- 2004 "Kata Pengantar Cerpen Pilihan Sastera Mahua IV." dlm. Yuen Boon Chan, Choo Puay Hin (Penyelenggara). *Impian di Pelabuh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vii–xix.

Muhammad Haji Salleh

1975. "Kata Pengantar", dlm. Goh Then Chye (terj.), *Puisi Mahua Modern Jilid 1*,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ua, Universiti Malaya, 1–2.

Othman Puteh

- 1994 "Kata Pengantar Cerpen Pilihan Sastera Mahua II." dlm. Yang Quee Yee, Goh Hin San (Penyelenggara). *Gadis Dalam Gambar*.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vii–xxvi.
- 2000 "Kata Pengantar Cerpen Pilihan Sastera Mahua III." dlm. Lim Chuan Boon (Penyelenggara). *Dalam Hujan Renyai*.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vii–xxiii.

Salmon, Claudine 苏尔梦 (法国)

- 1983a "Taoke or Coolies?: Chinese Vi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rchipel* 26: 179–210.
- 1983b "Recent Studies on the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rchipel* 25: 231–233.

Tan Chin Kwang 陈真光

- 1966 "Perkembangan Kesusastraan Terjemahan Melayu Tionghua di Malaya?"
1967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lay Literary Works in Malaya." *Tenggara*.

Tan Ta Sen 陈达生

- 1965 "Perkembangan Kesusastraan Tionghoa di Malaya." *Berita Harian*, 30 Mei.

Tang Eng Teik 陈应德

- 1988 "Uniqueness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Polemic in the Forties" in *Asian Culture* 12, December: 102–15.
- 1997 "Perkembangan Puisi Tionghoa pada Tahun Enam Puluhan." dlm. Shamsuddin Jaafar (Penyelenggara). *Sastera dalam Masyarakat Majmuk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50–63.
- 2000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 Survey" in Lee Kam Hing, Tan Chee Beng (ed.),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2–69.

Tee Kim Tong 张锦忠

- 1998 "The Belated Mahua Modernist Literary Polysystem and the Case of Tan Swie Hian" *Tamkang Review* 29 (2): 159–197.
- 1999a "The Exile Writes Back: Reading Shirley Geok-lin Lim" Remapping Chinese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11–12 June.
- 1999b "Xiandai wenxue: A Project of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the Imaginary Realm." Reading the Fin de Siecle, Writing the Millenniu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The Eight Quadr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27–29 August.
- 2002 "Comparing Asian Literatures, or 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P.R. China.
- 2003 "Shirley Geok-lin Lim's Poetics of Diaspora." MICOLLAC 2001: Third Malay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Serdang: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23–25 April.
- 2004a "Looking for Zhu Ling: Self Identity in Li Yongping's *Yuxue Feifei*" *Tamkang Review*.
- 2004b "(Ex) changing Sense of Place: Reading Chin Woon Ping's Camillia S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s, Linguistics and Pedagogy of Languages. Dept of English, Norm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1 May.
- 2004c "Fragmented (Post-) Identities: Lin Xingqian's Poetics of Diaspora" Paper presented at Overcoming Passions Conference.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mar Junus

- 1975 "Kata Pengantar", dlm. Goh Then Chye (terj.). *Puisi Mahua Moden Jilid 1*.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pp. 3–6.

Wang Gungwu 王赓武

- 1964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 in Malaya." in T. Wignesan ed.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 London: Anthony Blond & Kuala Lumpur: 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pp. 249–256.

Wong Seng Tong 黄森同

- 1980a "Kesusasteraan Cina di Malaysia." *Widya*, 36(8):19–21.
- 1980b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Literary Movements on Malaysia's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Tamkang Review* 10, 3(4): 517–534.
- 1981 "Imej Orang Melayu dalam Kesusasteraan Tionghua di Malaysia" dlm. Ayob Yamin, Hamzah Hamdani (penyelenggara). *Imej dan Cita-Cita: Kertas Kerja Hari Sastera 1980*.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300–317.
-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s Colloquial Chinese Literature (1919–1941)." *Archipel* 28: 173–203.
- 1988 "The Ident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 in Wong Yoon Wah, Horst Pastors e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10–126.
- 1990 "Perhubungan Kaum dalam Sastera Mahua", A. Rahim Abdullah, *Tema Hubungan Kaum dalam Karya Sastera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33–39.

Wong Yoon Wah 王润华

- 1995 "Obsession With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World War II." in *Crossing Borders: Transmigration in Asia Pacific*. New York: Prentice Hall: 359–377.
- 1998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Post 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iver Edge, New Jersey: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Wong Yoon Wah & Wong Meng Voon 王润华、黄孟文

- 1989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as seen in Singapore-Chinese Literature," Theresa Chong Carino ed, *Social Change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Philippines: De La Salle University and 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65–78.

Yang Quee Yee 杨贵宜

- 2000 *Perkembangan Kesusasteraan Mahua Moden 1919–1965*.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Yeo Song Nian 杨松年

- 1993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12–1942)." Leo Suryadinata ed., *Chi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ity: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69–180.

Yeo Song Nian, Leung Yuen Sang 杨松年、梁元生

- 1985 "In Search of Identity: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919–1983" *Asian Culture* 5, April: 18–23.

Yeo Song Nian, Ng Siew Ai 杨松年、黄秀爱

- 2000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Lim Pui Huen, Diana Wong ed.,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06–119.

Yu Wang Luen 俞王纶

- 1982 "Women Writer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pel* 24: 205–234.

儒家思想的“在地性”与“全球性” 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自强的意义

黄文斌

一、前言

本论文主要想讨论儒家思想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可有什么作用的问题。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具备两个面向：一个是“在地性”(Localization)，另一个是“全球性”(Globalization)，它们可以被借鉴来塑造马来西亚华族与国家文化。儒家思想乃从中国本土衍生，它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故我们说它有“在地性”。换言之，所谓儒家的“在地性”主要说明这种思想对华族有特殊文化符号的意义，因为整个华族的思想观念或价值观绝大部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倘若我们问“华人所以成为华人的关键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除了从肤色或外形之差异寻找答案外，更准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华人的思想行为来判断，而这个思想行为必定具有儒家思想的元素。例如，一个人在清明节进行拜祖先仪式或在农历新年与家人吃团圆饭等。这些习俗乃从儒家重视“家”和“孝”的观念所衍生出来的。是故，儒家思想对华族而言，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也是民族创造文化的依据。

儒家思想虽属于古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其所体现的思想又有其超越的一面而不仅局限于华人族群；尤其是“德性修养”与“人伦关系”方面的价值可以超越时空，成为人类的共同伦理。故我们说儒家的思想也

具备了“全球性”。这点正好适合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

本论文针对这两个特性，放在马来西亚特殊的情境作为考察。希望通过这个个案研究能够说明儒家思想不仅是本地华人族群所需要，也非常适合于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

在讨论儒家思想的“在地性”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何关系时，首先我们必须先交待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认清儒家思想有两个特殊的功能：一、儒家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与自强不息的精神，致使这个民族的文化能在不同的时空里不断地创造文化。二、儒家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忧患意识，致使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入世精神及社会关怀。这两点是儒家思想其中较明显的特征。因此，本文基本上从这两点着手论述它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有自强的意义。

第二个前提是必须认识到文化丰厚是一个民族创造新文化的资源。换言之，若一个民族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民族在创造文化方面便会缓慢，进而影响一个社会国家的发展。丰厚的文化底蕴，能为民族文化创造提供资源与依据几乎是目前有识之士的共见。从全球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观察，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例如，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目前已经有能力送太空人到外太空进行探索，证明中国文化并非缺乏科学元素，只要中国政局稳定，科学与社会发展自然会上轨道。今天中国能有此成就，多少也说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国家的复兴起了促进作用。

以上的两个前提基本上扣紧马来西亚华社目前的困境而论。第一点，由于华社是一个劳动移民的社会，缺乏“士”人知识文化传统，故提升华族的文化素养或文化深耕是马来西亚华族现今急需努力的文化工程之一。第二点，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度，汇集了不同的族群文化，如有马来族群的伊斯兰文化、华族的儒家文化、印度族的兴都教文化、西方人留下来的基督教文化及东马少数民族文化等。因此，在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应该如何创造一个融和的多元文化也是华族子弟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作者基本上认为儒家思想在这两层问题上能提供一个指引的方向。

二、创造丰厚的民族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也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之一。是故，当我们讨论民族文化问题时，儒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民族所以能延续五千年，可大可久，正因为它有深厚的文化。文化是一种力量，但我们很难用科学或量化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存在。然而，通过人类历史的演进，我们可以感觉到有这一种力量的存在。这一股力量便是民族精神，也是民族文化。更具体的说，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力量。现在让我们先从儒家“在地性”的角度分析，看看儒家有哪些具体的思想内容能被借鉴来发展民族文化，尤其对马来西亚华族塑造丰厚文化方面能起实际的效用。

(一) 入世精神与自强不息

首先，儒家思想有入世的关怀。孔子周游列国，秉承的便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的力量基本上来自于孔子对文化承传的使命。他与弟子们周游列国曾在匡的地方遇难，匡人要杀孔子，弟子叫孔子快点逃命，孔子回答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谓“斯文”既是周朝丰采的文化，也是中国古传统的文化，孔子认为“天”不想断绝这一文化传统，也自认已秉承了这一文化传统，故他以承传“斯文”为使命。孔子这一入世精神对中国文化的性格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历代读书人也秉承了这种入世精神对民族文化的承传与社会国家的发展多了一份忧患与关怀。

以上孔子所体现积极入世或自强不息之精神，对马来西亚华族显得特别重要。它是华社深耕民族文化的推动力。从二十世纪二战以前在1938年马来西亚华社便自力更生地创办了1260间的华文小学；独立后70年代领养了60间独立华文中学；80年代支持了1间华社研究中心；90年代创办了3间民办学院；进入廿一世纪2002年又支持了私立拉曼大学，从这些事件都可以看出华人除了履行公民纳税的责任以外，还要额外出钱发展自身民族的教育与文化。若大部分的华族没有承传民族文化

与教育的意识，没有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而只是安分地当一位公民，相信这个族群不会在过去三十年来面对政府的诸种不公平政策或行政偏差而还有目前的成就。此外，目前在马来西亚合法注册的华人民间团体大约有 7 千 3 百多间，这些团体或是地缘或是血缘或是业缘或是学缘等，虽然冬眠与活跃并存，但它们的存在至少说明华社还有活力。以上教育、学术、文化或联谊的团体不断地保持活力，是促使民族教育与文化能持续地保温发展的关键。

从上述的举例似乎看出华族在日常中已经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从历史发展观之，华族自强之精神往往紧系着外在的冲击而非自觉地奋进。例如，马来西亚独立以前，虽各籍贯群体有自动为族人子弟设馆和办私塾的情况，然移民社会有此觉醒还托侨领如左秉隆与黄遵宪等清大臣积极提倡文教事业所赐。¹ 此外，康有为与孙中山在南洋鼓吹办现代教育以达“开启民智”的运动更直接影响了本地文教的蓬勃发展。² 换言之，二十世纪初现代学校与教育能在南洋发展乃紧扣着中国富强运动之故。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维护华文教育的诸种运动，虽体现华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然其动力更明显地是来自政府及政策的阻挠。若没有外在的忧患，我们十分怀疑华族是否有一股庞大自发奋进的力量。因为二十世纪 90 年代后，政府采取较开放的政策，缓和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过去华团与政府抗争的力量普遍上显得薄弱，接下来的大选也比较倾向政府。我们不是说与政府对抗才是正道，而是指出靠外在因素来引发动力，并不能持久。要言之，我们在此强调儒家思想有自强不息精神，主要唤醒华族能通过学习的管道认识这个日用而不知的力量。唯有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方能保证自强不息的力量源自于内心而非单靠外在的刺激反应。1899 年海峡华人林文庆在南洋发起推动“儒教复兴运动”，其动力乃由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一番学习与认识，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³

另一方面，百年来劳动阶层组成的华人社会，虽然还秉承了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并积极在民族教育事业上耕耘，然而，我们还看不到民族的教育与文化有一个较深厚的发展与成就。华文教育与儒家思想或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华族对母语母文的掌握程度，将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吸收。然目前绝大部分华裔的中文水平还是维持在中小学

程度；除了教科书、考试参考书及作业簿外，中文出版业还处于幼儿阶段。此外，中学与大专的华文教育发展也还在颠簸缓进。70 年代至今我们虽维持了 60 间民办华文独立中学，但其发展常面对经费匮乏、生源不稳定等问题；3 间华社民办的大专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与韩江学院）迟至 90 年代才获准成立，目前还面对课程重叠、争取共同的生源、师资素质及办学理念分歧等的内部紧张，又面对其他 532 所私立学院及 27 所私立大学及大学学院⁴ 激烈竞争的外部挑战等等。要言之，百年来的努力还无法致使民族教育与文化水平有个较深度的发展，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自英殖民时代至今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独立以前的英国殖民政府并不扶持华文教育，只是在 1920 年为了控制华校生常受中国影响参与抗议游行而颁布了“华校注册法令”及给过短暂与微不足道的补贴。然自 1957 年国家独立后至 80 年代，华文教育在本地发展一直受到以单一语文政策与马来主权意识等为建国指南之阻挠。1960 年的“达立报告书”或依据此报告书而制定的《1961 教育法令》便将华文中学排除在官方的教育体制内，而使到大部分华裔子弟没有机会继续获得华文教育的滋养；此外又加重华社的经济负担来办华文独立中学。华文独立中学学生的华文水平或许比政府国立中学的较高，但是政府不承认独中的文凭，使到这个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又被排除在官僚体制外而不能直接地参与或影响官方教育体制的运作。⁵ 此外，这群对华语华文掌握比较好的学生也只是占了总华裔学生人数的一成左右⁶，虽然目前修读中文系的学生及学中文的人士有增长之势，但这对提升整体民族的中文水平之影响还属薄弱。至于未来是否会更好则有待观察。

至于大专院校方面，华社在 1954 年筹建的南洋大学因 1965 年新马分家而逐渐影响马来西亚的华裔子弟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1969 年华社要求创办的独立大学因政治化被阻隔，也在 1982 年上诉最高联邦法院失败而宣告寿终。⁷ 缺乏了华文教育的大专院校，不仅不能培养比较有文化素养的华裔子弟，也因缺乏学术单位不能将对民族文化学有专精的学者汇聚一堂，为民族教育与文化作更深层地耕耘。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互利双赢代替自私独利、单一转向多元、孤立变成互动

及全球化观念等成为了世界的主流思维。在亚洲方面，中国近十多年的崛起，也使中文的学习变成不再是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官方偏向单一族群的国策也稍有点放缓，至少《1996年的教育法令》允许私立大专院校的设立及不再强制与局限于单元语言政策。⁸这个气候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可以形成一个契机。然而，因政治压迫而激起华社反弹的力量也开始缓和，“去政治化”后，华社基本上处于较安逸的局面。由此，再次证明华社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很多时候乃受外在政治环境压迫所致。无论如何，儒家奋进的入世精神必须在华族中加以传扬，这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所以能延续的力量；儒家思想也是保留民族意识与特征的基本要素。

(二) 奋进好学的精神

除了“入世精神”，孔子重视“学”与“好学”的精神也影响了历代的中国人。更重要的，这种奋进学习的精神，是致使中国文化能不断地融和与创新文化的力量，也是中国文化延绵不断的动力。例如，佛教从东汉输入中国，发展到唐代基本上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尤其“禅宗”，其将佛理修行化，而修行又生活化与艺术化，一片生机活泼，它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模范之一。倘若中国文化的基调没有儒家入世与现世的一面，较难转化以追求涅槃(Nirvana)境界的佛家思想成为倾向现世与生活化的中国佛教。当然，佛家思想的高妙与系统的庞杂是先秦儒家思想较缺乏的，尤其本体论与知识论。孔孟思想不十分关注人死后的问题，只是强调“敬鬼神”、“祭神如神在”的宗教态度及“未知生焉知死”的现世踏实的生死观。此外，儒家也没有佛家复杂的名相知识系统。无论如何，儒家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后，这个文化系统的不足也因借鉴佛道而形成“新儒家”的体系。例如，朱熹便用“天”、“理”、“性”、“气”等来诠释万物之本源与事物差异的现象等。简言之，儒佛两个不同文化系统能融和与互补，多少能说明儒家若无丰厚的基础，是无法消融佛家而创新“新儒家”的思想文化。儒家所以有这种能力，正因为绝大部分的儒者都能秉承孔子奋进与“好学”的精神。“学”的精神，使儒家学说能不断地自我充实、提升和丰厚。

这一文化历史经验正好是马来西亚华社应该学习的。如果我们只有

热诚与热情，或许可以出钱出力支持中小学华文教育与民间文化活动，让它们能持续地运作，但是对一个需要深耕文化与在各领域有待发展的华族，更需要有持续奋进学习的精神与反思的能力。换言之，一个富强的社会是需要一个学习与思考型的族群来建构的。唐代的儒者韩愈便曾写过〈师说〉提到一般人爱自己的子弟尚且会请老师来教导他们读书，但是自己本身却不愿学习，故造成惑上加惑，人生的困惑终不获得解决。韩愈其实有意将儒家的“师道”或“道统”重新地振兴起来。这个运动有入世的关怀与奋发学习的精神，韩愈大致理解到唯有如此民族才有持续发展的希望。宋儒大致延续这个思维奋进，最后将佛道的精义融入儒家，使儒家再次获得新生命，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孔子“好学”的精神，可以成为华族学习的典范。若众人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也愿意不断地提升个人的学养，华族文化的发展即可像滚雪球地形成一股力量。有了这种基础力量才能汲取丰富的中华文化成为马来西亚华族的精致文化，进而融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一个不学习的民族，根本无法发展出丰厚的文化。孔子的《论语》开宗明义便说：“学而时习之”，便点出“学习”的重要。孔子自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五十读《易》“韦编三绝”；这些都说明他是个“好学”的人。正因为他的好学，他才成为中国古代学问与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也因为他一人与弟子们的影响，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现阶段虽然很难期待出现一位像孔子一样的学者，但是弘扬与学习他的“好学”精神至少是一条正道。

既然“学”的精神对马来西亚华族塑造丰厚的文化至关重要，那么谁又应该担负这个责任呢？现今教育分科分系分专业，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专攻人文学科或以外的华裔子弟一起来耕耘民族文化？抑或耕耘民族文化的工作应该属于学人文学科，尤其修读中文系人的职责呢？“承传文化由中文系师生来承担”，这样的想法固然有道理，毕竟念中文系的学者是最直接接触中国文化的人，而且，华社似乎也有这种期待。例如，3间华社民办的学院都不约而同地开设了中文系并且都非常重视此科系。⁹这多少可以说明华社对中文系的期待。此外，2002年由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创立的拉曼大学原属英文源流为主导的教育机构，也开设了中文系，这是1969年马华公会成立的拉曼学院时，一直没有设立的科

系。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马华公会的中央领导层已转变成由大部分曾受过华文基础教育者所主导，更重要的，也许是时势所趋，包括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开始趋向开放、马华公会领导层俯顺基层的意愿与华社的要求，以及中国崛起的大趋势等因素。在 2006 年，不算民办的 3 间学院，只是在国立马来亚大学与私立拉曼大学中文系报读的学生便超过了 600 百人¹⁰，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从市场需求趋升，反映了学习中文热的大趋势。至于这个“中文热”是否与中国崛起相关，抑或华族对了解民族文化有进一步地需求，则需要另外考究。

另一方面，今天的华裔家长已经越来越多选择把孩子送到华文小学去就读，这个趋向已占了约 90%，而非华裔子弟在华文小学就读的数据也超过了 6 万人¹¹，以致教育部考虑在马来国民小学设立华文科目。这种现象即是华文教育发展的契机。然而，90 年代以前华文教育发展不顺利，目前突然蓬勃发展起来，造成了许多问题。例如，在马来单元教育意识的主导下，华文小学师资一向来都缺乏而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如今马来国民小学也需要华文师资，造成了师资短缺雪上加霜。¹² 又譬如，大专院校在 1964 年至 90 年代以前只有国立的马大有中文系的设立，教职位子只有十多个，获得教职不易，故鲜少青年继续念高等学位。此外，该系也没有培养学术人才的计划，是故华社基本上还是非常缺乏中文研究的学术人才。目前除了马大、拉曼大学、三间民办学院都有设立中文系，其他外语或语文学院设有中文组的还包括马大及博特拉大学。这些单位的设立，尤其是私立学府，吸纳了一些有高等学位而又不受官方承认的学者回流。另一方面，也由于过去本地没有太注重中文学术人才的培养，故无论质或量都显得缺乏。或许从各单位目前普遍上还缺乏有博士学位的师资可以说明这一现象。以上华教发展的问题多少会影响华族文化往深耕发展。

由于本论文谈的是民族文化自强的问题，此处提到孔子“学”的精神，主要说明我们必须将华社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个可以吸纳其他族群文化思想的高度，这样才能谈创造新的马来西亚文化。大量的中文系学生对维持华族的中文水平及对打造文化基础有一定帮助，当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地考究课程的设计与师资对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自强的问题是属于整个族群的事情，故我们不能只是锁定

在读中文系这个阶层而已。对于其他学科出生的有识之士，也必须思考应如何提高族群的文化水平及个人的人文素养。鼓励大家读《论语》或者是其中一个较好的管道，毕竟这是一本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书。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或对儒家的印象如何，总应该去了解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内容与道理。自西汉以来中国人都读《论语》故他们对民族文化及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目前整体华社在文化思想上正缺少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故在民族文化自强的问题上较难找到一个共识。若无一个共同的基础，是非义利之辨将模糊，纷冗杂乱的思想，无法获得澄清，这将不利民族文化之发展。

除了一个共同的学问及价值观的基础，或许我们也应该注意学术人才的问题。从中国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历史的动乱，中华民族与文化所以没有灭亡，正因社会有学术文化的力量在支撑。所谓“学术不熄，民族不亡”（钱穆语），大致可以说明一个族群有丰盛与活跃的学术力量，能使其民族与文化得于延传。这个道理何在？“学术”是研究与思考的结晶。大凡经过研究与思考的事情，其准确性或合理性较高，而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言之，蓬勃的学术传统，然非钻牛角尖或与人生及生活无关的狭隘学术，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深耕与提升。从这个角度审视马来西亚华族的情况，庞大的学术研究人才是华社继承丰厚的文化与融和多元的文化的条件之一。

三、开创与融和多元文化

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居住在这里的华族就必须思考民族未来的问题。尤其，目前国家的政治结构乃由各别种族政党组成，更严重的是，在处理或分配国家资源的时候，大家都从族群的利益作考量。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个格局有其历史成因。然有识之士应该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国家的发展，而不要囿于眼前的利益。若依据种族多寡来分配国家的资源，华族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因华族人口只占了总人口约 26%，而马来与土著族群已经占了 65.1% 而印度族群占 7.7%¹³。人口下降的趋势已使华族变成一个弱势族群。除此之外，从 1970 年新经

济政策实施以来，华族无论在政经文教方面都有逐渐边缘化的倾向，若华族无法改变政治格局，或者盲从既定的模式，我们只能成为被动的棋子。通过政治力量解决华族的困境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道路。另一个能改变民族命运的道路就是办素质教育与民族文化自强。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儒家思想与民族文化自强的问题，故暂且不谈政治与办素质教育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儒家思想的“全球性”如何对马来西亚华族创造国家文化产生作用。前一节我们提到儒家思想乃衍生中国本土故有“在地性”的一面，它对华族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华族可以通过学习儒家思想的精神而达到民族文化自强，以丰厚马来西亚华族的文化。当华族文化已达丰厚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本节想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 伦理道德

在本文前言部分，我们已经提过儒家思想不仅具备“在地性”亦有其“全球性”的一面。换言之，儒家思想可以属于人类共同的资产，尤其是德性伦理方面的学说。它的功能即如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可以成为全球性的信仰一样。儒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是人伦关系。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义”；子女事父母以“孝”，父母待子女以“慈”；弟事兄以“恭”，兄待弟以“友”（悌）；夫妻相“敬”，夫唱妇随；朋友交，言而有“信”。类似的价值观都环绕着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发，紧扣着人心与情感而立，使人际关系获得协调，使社会有秩序，进而达到“和”乐的社会。这些伦理价值观似乎都具备了“全球性”元素，可以成为塑造“人类共同伦理”的参考资源。换言之，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似乎可以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文化资源。无论是马来或印裔族群的文化根基大致建立在上述的伦理道德上，只有少许属于宗教信仰的观念，有点差异如对上天崇拜等。若可将宗教信仰问题变成一个属于个人的抉择与问题，纯粹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世间层面而言，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大致可与其他族群的文化融通。

(二) 包容性

“马来（西）亚”是一个经过英国人有计划地逐渐统一各州而形成的

现代国家¹⁴，而“国家”这个概念是西方近代的产物。现代“国家”的概念大致指有土地、有人民、有司法与行政及有自主权等。然而，在近代西方出现“国家”观念以前，中国自古只有“天下”而没有西方观念下有“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¹⁵或强调必须对主权国家“忠诚”与“奉献”(loyalty and devotion to one's nation or country)，而且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至于个人或其他群体利益之上等概念。¹⁶ 在春秋时代，我们看到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德政与仁道思想，而不局限在一个国家。这表示人心之“道义”比国家疆土重要。由此看来，古代儒者认为追求一种人性中的道德价值要比领土政治更崇高。正因为这个理想，中国在秦朝时，早已完成不同种族与文化的融合，而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在不同的朝代也持续保持开放性，完成多元种族与文化的融合。¹⁷ 由此胸襟即可看出儒家思想具备“全球性”的一面。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马来（西）亚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大量从中国与印度引进人力资源发展经济，故逐渐变为是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这种由不同人种与文化差异凑成的多元社会是人为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不像欧洲、印度与中国等国家是经过漫长历史的自然融合与塑造而成为一个国度。英国人殖民马来亚也超过百年之久，若不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即将各种族安插在不同的地方及工作领域，相信各族之间的交往可能会更加频密和融洽。

由于从 1945 年二战至 1957 年国家独立只是短短的 12 年，各族之间的了解与合作还是局限在“上层”的领袖，而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领袖却是不懂华文的峇峇（Baba）华人或受英文教育者，他们的思维与广大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或基层党员还是有一段距离，故在争取华人的权益或对“国家建构”观念比较倾向英政府的思维¹⁸。因此，从独立前 10 年看来，华人对突变的政治还没有即刻反应过来，尤其在国家与身份认同方面还没有共识¹⁹；等到决定成为公民后，在争取公民权益、华文教育与华语列入官方语言等方面各造又出现分歧。这个分歧不仅来自华族里受英文与华文教育者之间；华巫印族之间也没有较深刻的了解与信任，因为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族群之间的和谐及了解，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达至的。甚至在独立后近 50 年的今天，各族之间的谅解与文化交流还是不足的。

例如，代表马来族群的巫统青年团在过去两年（2004，2005）的代表大会还极力主张落实“马来人议程”及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等种族保护主义，无视他族的感受及正视世界已迈入全球化的自由竞争时代。“新经济政策”在马来西亚已经实施了20年（1970–1990），国家已经投入了无数的金钱与开方便之门来扶助马来族群。从正面的角度看，马来族群的确在各领域都进步了，也掌控了国家绝大部分的资源。然而，这个“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为宗旨的政策，却因行政偏差变成“扶持马来族群的政策”，造成了族群关系两极化、贫富悬殊、巫族过分依赖政府扶助、缺乏竞争力、贪污舞弊、裙带风等问题。²⁰由此看来，马来西亚要建构一个不以族群视角为处事的标准及一个各族和谐共处的国家，距离目标尚很远。

族群有人种与文化思想的差异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此为人类之自然性。然而，人类能从“自然人”进化到“文化人”正因为我们有思考的能力及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自我改变之故。换言之，各族群与文化差异之“自然性”，可以通过“人为性”拉近彼此的距离或化解彼此的差异性。简言之，我们要化解多元种族与文化之差异，必须通过“理性”与“人性”的努力，而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谅解与包容。儒家思想大致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一点合理性的资源。儒家思想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性，而这个“平等心”是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论语·颜渊》篇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一个人不患无兄弟，四海之内都可以找到兄弟，因为他能实践“敬而无失”及“与人恭而有礼”的德行。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便相信这样的道理，所以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能够在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中不断地融和。今天所谓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与单元的文化体。它是经过历史不断融和而成的。中国文化所以可大可久正因为主流文化思想的儒家有这种胸怀。

儒家包容性的胸襟可以使华族与其他族群和谐相处，也在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较容易实践。然而，当来到掌握政权者这一阶层时，问题就不太容易解决，因为里头牵涉到利益的问题。若从政者没有儒家“为政以德”或推行以人民为本的“仁政”的观念，政治就变成是一种西方

观念下所谓“资源分配的游戏”。这是一个“功利”的观念。最后国家资源只掌握在有权势与趋炎附势者手中。若要改变这种趋势，除了仰赖国家出现有德行及眼光的领袖外²¹，更实际的是将儒家思想普及在民间而不要局限在华族，也应该与其他宗教及族群交流，以达至一个包容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共同伦理。

四、结语

马来西亚华族基本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自强运动，一个是多元文化融和。前者将有助于提升华族的素质及创造丰厚的文化，尤其华社的历史乃由一个劳动移民社会组成，文化自强运动显得特别重要及急迫。后者乃鉴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与其他族群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并促进了解及合作，为马来西亚开创更美好的明天几乎是每位有识之士应该努力的工作。华族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内忧”与“外患”的问题？其中一个管道是提倡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在地性”，对华族文化自强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具备“全球性”的元素，其伦理道德与包容性可以成为融和其他族群文化的力量。今天全球有佛教徒的儒者、基督教徒的儒者及伊斯兰教徒的儒者等，即表示儒家可以包容其他的文明与文化。本文作者认为华族文化自强，应尤先重视儒家思想的推行，以期待它能够为华族打造丰厚的文化，也期待它能丰富马来西亚文化之内涵。

注释：

¹ 赖观福、黄文斌：〈独立前华人文化思想〉，收入林水樟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1998），页20–22；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页103–107。

- 2 林水樟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一书，同上，页 23—24。
- 3 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7, part 1, March 1976。李元瑾：〈林文庆的儒家思想〉，《亚洲文化》第 10 期，1987 年 10 月；李元瑾：《东西文化的冲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二章、第五章及第九章有关林文庆的部分。
- 4 高等教育部国内大专学府统计资料。见《东方日报》，2006 年 3 月 11 日。
- 5 只有少数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到台湾读书回来后能进入官方体制，据笔者目前所知只有参政者还有机会出任官职。至于公务员的体制，独中文凭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被承认。
- 6 例如，2002 年全国华小学生有 632,180 人，在华文独立中学就读的学生则是 54,048 人；其比例约近 12%。学生数据参考《董总 50 年》（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2004），页 1266, 1271。
- 7 有关独立大学的成立、办学方针及法律诉讼案，可参考《教总 33 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 492—493; 555—558 及 600—605。
- 8 依据《1996 年教育法令》第 41 条 (3) 指出私立高等教育学府的课程可以在部长的批准下使用英语或使用阿拉伯语于伊斯兰教的教学。
- 9 黄文斌：〈论马华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人才的培养〉，收入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75—76。
- 10 2006 年 7 月份拉曼大学中文系共有 384 位学生；据口头查明马大中文系学生也有 300 人。
- 11 根据官方的统计，马来西亚现有 1285 间华文小学，其中大部分是独立前由华社出钱出力创办的。近几年来，进入华文小学的华裔子弟维持在 88—90%，目前有 63 万名学生在华小就读，包括 6 万 5 千名马来学生和印度学生。
<http://www.ucstam.djz.edu.my/jyjt/hwjyxk.htm>
- 12 教育部资料显示，全国华小 2003 年缺乏 4741 位合格教师；2004 年减少至 3855 人；2005 年则减少至 2852 名。《星洲日报》2006 年 6 月 18 日。
- 13 依据 2000 年的人口普查。
- 14 1786 年英国人开发槟城；1826 年管辖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三州府；1895 年管制了马来联邦的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1909 年再管制马来属邦的吉兰丹、登嘉楼、吉打及玻璃市；1914 年再进一步管辖了柔佛而正式完成西马来亚的统一管治。马来亚各州本有自己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习俗，在英国人逐步管制下而形成一个政体。

- 15 李金梅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 10。原著为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6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93), Vol.8, 15th Edition, p.552.
- 17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文化导论》第 29 册，（台北：联经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页 23—42。
- 18 即以“英文”或“马来亚语”为单一官方语言或单元国家教育政策；此外，又认为除了马来族，其他的族群都是外来移民，不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或权益等。
- 19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89），页 328—362。
- 20 参阅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附录部分，页 61—150。Ng Boey Kui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Chinese in Malaysia: Impact and Responses”，收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2 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8），页 99—123。
- 21 例如，新任首相阿都拉在治国方面强调多元民族与文化共存、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及打击贪污等便是一个例子。此外，现任马华公会总会黄家定便提出“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等从政理念便是一个好的气象。有关首相阿都拉的一些公平对待多元种族的言论可参考“Dialogue the Key to Unity of Multireligious,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见 Malaysia’s Agenda for the Future: Special Issue Highlighting the Thought Leadership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收入 *Malaysian Management Review*, Kuala Lumpur: Malay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Vol.40 No.1, Jun 2005, pp.51—55.

华人族群的本土化与 马来西亚的国际化

张应龙

一、前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全球化基本上包括贸易、移民和资本三大方面的流动，在经济领域中则表现为生产、金融和科技的流动¹。经济全球化一般以跨国公司为先导，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国际分工调整为内容。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通常采取开放的政策以加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同时，依据区位特点组建了区域性贸易区作为参与全球化的平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是一个表现。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马来西亚与中国友好关系的表现比较突出。两国在国际事务与区域经济中紧密合作，富有成效。在马中关系之中，华人族群无疑是一支发挥重要作用的力量。华人族群的作用，其基础在于华人族群实现了本土化。在马来西亚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华人族群也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全球化下的区域合作：中国与马来西亚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世界、马来西亚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

的变化。在国际政治方面是战后持续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在国际经济方面是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浪潮，在马来西亚方面是实施开放政策，在中国方面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的更大范围开放和改革的提速，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方面是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²。

马来西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实行新经济发展战略之后，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扩大对外贸易，使马来西亚的经济多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到了 90 年代，马哈迪提出 2020 年宏愿，并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其核心是要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建设先进工业国，实行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正在处于上升阶段的马来西亚经济遭到重创，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一方面加强对本国经济秩序的调整，一方面更加强烈意识到必须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推动马来西亚经济不断发展，因而在区域合作和全球化中，马来西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扩大改革开放起到深远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早期的沿海沿边到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以及现在的振兴东北，建设的重点从城市到现在的新农村，改革开放的局面在有序的进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东盟作为中国的邻居，一向是中国加强合作、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重点对象，在过去 5 年里，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了近 3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优惠信贷，未来 3 年中国还将向东盟国家提供大约 3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 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³。中国对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抱有很大的期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极大的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

中国与马来西亚自 1974 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民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90 年代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对立在全球范围内淡化，经济合作成为时代的潮流，从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交流日益加深和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马来西亚前驻中国大使马吉德 (Dato Abdul Majid Ahmad) 总

结马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特点是：(1) 从一个低的、受限制的基础逐步向开放的、高水平演变，相互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2) 开放、互信和理解取代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初期的恐惧、怀疑和谨慎。(3) 近些年来，两国的合作在不断地加强和深化。(4) 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顺利，没有遭受严重的挫折⁴。马吉德对中马关系的总结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发展中马友好关系是马来西亚领导人的愿望。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引起许多评论，有的认为是威胁，是“黑洞”，有的认为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机遇，不一而足。马来西亚领导人从马哈迪到巴达维都认同中国的发展会带来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因此，在他们的主导下，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不断朝着友好、合作、互相支持的方向迈进，尤其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

近年来，中马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总量不断增长。中马贸易在 1975 年只有 7 亿 6 千万马币，到 2000 年便突破 380 亿马币，2003 年两国的贸易额比 1975 年增加了 130 倍⁵。据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政务次长陈仪乔所说，从 2000 年至 2004 年两国贸易总额平均增长率是 34.3%，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取得近 4 倍的增长率，中国的进口额平均增长率每年达到 38.2%。目前中国是马来西亚第 4 大贸易、出口和进口国⁶。2005 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 6.6%，达到 352 亿马币⁷，中马两国领导人都决心要使两国的贸易总额在 2010 年达到 500 亿美元⁸。

2，互相投资不断增加。至 2004 年底，马来西亚在中国的总投资额达到 91 亿马币，是中国第 15 大投资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 1999 年至 2004 年期间，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总额达 34 亿 5760 万马币，而大马在同时期到中国投资的数额则是 16 亿 2300 万马币⁹。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拿督赛诺鲁查曼 (H.E. Dato' Syed Norulzaman Syed Kamarulzaman) 说，“中国视我们为东盟区的好友，并会与我们继续友好，我们对这段友谊深具信心，并会协助行销中国产品。”“全球贸易环境自由化、中国走向海外投资后，我们深信双向投资势头加强，而大马也将吸纳更多投资”¹⁰。

3，合作领域越来越宽广。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开始的一般贸易扩大到投资、劳务和旅游等方面。能源、通讯、传媒和生物医药等

高科技领域以及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将是未来马中经贸合作的重点。

4，人民往来日益密切。2004年中国人到大马旅游观光、商务或文化交流的入境人次高达70万，而大马到中国的签证也达40万人次，两国来往的人次合计大约是120万人次。2005年，由于某些原因，中国人到马来西亚旅游的人数下降到30多万人次。目前，马来西亚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重振声势，马来西亚新任旅游部副部长林祥才表示该部决心在两三年内实现“百万中国游客”目标。此外，中国在马的留学生有1万多人，马在华的留学生也超过千人。

随着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CAFTA)进程的发展，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1304亿美元，比上年猛增23.1%。2006年是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机遇期。在此之中，服务业的合作将带来更多的机会。服务业在中国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2004年为29%，而马来西亚是57%，《服务贸易协议》一旦签署，双方在商业服务、金融保险、旅游、建筑工程、运输通讯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将出现崭新的局面¹¹。

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本土新崛起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涌现出许多历经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成功企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对外投资活动也逐步增多，虽然目前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不如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多，但在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区不断发展的前景下，加上中国政府的积极鼓励，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投资。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竞争也带来了进步，压力可以化成动力。例如，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支撑是本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更加注重技术的创新，谋求从中国制造转变到中国创造，技术创新、自主产权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同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中国不断改革其经济管理制度，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引进资金和技术方面更加注重质量。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竞争力，

提升技术水平的重点进行的。对于马来西亚来讲，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较高技术水平是富有吸引力的。尽管中国与马来西亚在一些经济领域存在着竞争，但这些竞争也催化了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国际贸易部长拿督斯里拉菲达说，“在面对生产成本较低国家，譬如中国的强大竞争之际，大马加速努力吸引海外投资，其中包括放宽一些投资条例、扩大税务奖掖，以及简化申请准证或执照的手续”¹²。所以，竞争不都是坏事，关键是如何应对，如何适应。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突出趋势。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地缘战略的实际需要，首先启动并组建了区域合作组织作为区域合作的框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建设反映了中国与东盟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应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关系的发展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双方的合作既是本身的需要，也是区域的需要，总的来说，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互相合作是主流，双方都积极在全球化之下加强互相之间的合作。

三、华人族群跨文化网络与马来西亚国际化

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它一方面具有中华文化的背景，一方面具有马来西亚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背景，这就使到华人族群游走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游刃有余。跨文化是华人族群走向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而华商网络则是华人族群走向全球化的平台。

在有关研究当中，尽管有关华商网络的作用颇有争议，但华商网络还是被当作华人族群走向全球化的重要平台¹³。华商网络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华族”网络之外，传统上华人族群内部按地域方言的不同又可以分成广东族群、潮汕族群、闽南族群、客家族群等等，只是经过长期的融合，华人族群中的地域性特征已经比较淡化，但地域性方言性网络依然是华人族群多重网络的组成部分，这表现在不同地域社团组织的活动中。近些年来，各种地区性、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大会经常在海外和中国举行，这些大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起到营造气氛和

推动华商走向国际化的作用。但是，此类活动通常以联系乡谊、共谋发展为主题，实际经贸内容相当贫乏，可操作性差，具体贸易投资活动还得企业自身去进行。对于这种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说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开放度不高等原因，海外华商通常需要通过侨办与侨联之类的侨务组织与中国内地建立联系和开展业务，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海外华商便直接与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合作，不愿意再通过侨办侨联之类的中间组织来拓展业务了¹⁴。

文化认同是华人族群跨文化的优势之一。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具有定位灵活多变的特征。例如，某个华人到了广东，他可以称自己是广东人，到了福建他可能称是福建女婿，到了中国内地则说是中国人，等等，总之是左右逢源。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还具有泛中国化的意味。原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许多人属于若干代的华人，他们对祖籍地的印象来自祖辈口述传说，在祖籍地也没有过从甚密的亲朋好友，所以对“中国”的认同要强过对“家乡”的认同，他们宁愿到中国旅游也不愿意到家乡探亲¹⁵。不少华人到了中国之后更加愿意走“距离感的路线”，例如，某个华人他虽然是广东梅县人，但他可能在广东的东莞等地甚至在广东以外地方开展投资活动。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本地人不能唱本地戏”，到“本地”（祖籍地）投资，其亲缘文化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成为负担，会遇到一些亲戚提出安排工作、予以照顾等等问题。正是如此，许多华人更加愿意开拓在自己家乡以外的市场。有些评论常常强调广东福建是重点侨乡，东南亚华人多数来自这两个侨乡，所以东南亚华人到广东福建投资的占多数。其实，这里面的广东与福建已经被虚化了，因为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其内部又分为几个不同人文区域，如广东就分为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当广东范围内的甲地域的人到乙地域投资时，广东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如果说东南亚华人有许多人在广东福建投资，那主要是因为看中这两个省份的市场经济环境、营商环境和区位优势。不少马来西亚华商在谈到去中国投资时，时常流露出广东福建已经被港澳台商人所占领的想法，表示更愿意到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去投资。这也说明，华人在中国选择投资地点时看重的是“效益”。

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参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组织的，一种是个人（或者企业）的。参与的途径主要有4种：1，参加马来西亚政府组织的访问团。2，参加各种华人社团组织的考察团。3，参加中国政府举办的各种贸易洽谈会、招商会。4，自己开拓中国市场。组织方式的意义在于为参与者营造一个场所，而实际的决定还有赖于个人去寻找。当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所谓的华商网络作用似乎被屏障起来，因为商机不可泄漏。至于大的华商集团，一般都是以自己的“个体”网络去开拓，而不是借助“组织”的网络。

华人族群的跨文化优势在马来西亚华人初进中国大陆时作用是明显的，相同的语言和相近的习俗使到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宾至如归般的欢迎，双方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联络感情再谈正事往往是中国商业文化中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是日后顺利发展的基础。所以，华人族群这种跨文化的优势是马来西亚其他族群所不能比拟的。

在马来西亚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华人族群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方面。马来西亚在中国的投资始于1984年，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原来多分布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现在向中国内地发展。最初投资的行业主要有橡胶、食品、化妆品、家具、饲料及机械制造等，项目规模较小，多为加工工业。近年来，除较大型生产企业外，在华投资领域扩展至能源、交通、金融、保险、商业零售等。

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在华投资的大项目不多，较大的有金狮集团，其他单个项目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以上的有中华映管（福州）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5.67亿多美元，其中马方出资1.84亿美元）、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2.64亿美元）、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1.81亿美元）、芜湖兆达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1.18亿美元）和明基电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1.16亿美元）等¹⁶。马来西亚对华投资最多的企业为金狮集团，该集团从90年代进入中国后，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近60个投资项目，总投入资金近10亿美元。主要包括摩托制造、百货和制酒业。到2003年时，金狮集团已在中国开设了21家购物

中心3家大型超市，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华中和东北，年营业额超过50亿元。在浙江、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开设了11家啤酒厂，占中国啤酒市场5%份额，中国业务已经占金狮集团营业收入的40%以上¹⁷。自从在中国投资以来，金狮集团向多元化发展，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摩托车配件等，涉及的中国企业有长铃摩托、金城摩托、钱江摩托、江淮汽车、天津大发汽车、未来软件等，员工达6万人。

从马来西亚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来看，华人族群不但是马来西亚到中国投资的先驱，而且占有主体的地位，据报道，马来西亚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近90%属于华商的投资项目。拥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族群确实在马来西亚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马来西亚华商到了中国之后，由于具有语言和文化的相通性，被认为具有天然的优势。显然，与马来族群和印度人族群相比，他们在适应当代中国文化方面比较快一些、容易一些。可是，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到了中国之后，并非一切如鱼得水，毫无障碍。华人族群的跨文化优势和商业网络工具仅仅是一个平台，华商网络作用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与中国社会与商业网络的对接。换句话说，海外华商网络以及华人族群的跨文化优势只是一个基础和先行优势，如果不能与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网络对接的话，那么这个跨文化的优势就会减弱甚至丧失。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跨文化有时成为华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

首先，华人族群在中国面临着反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的问题¹⁸。马来西亚华人尽管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相通性，但到了中国之后还是面临着文化再适应的挑战。不要说出生或者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即使是那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当他们在海外居留一段时间后回到中国，照样面临着重新适应中国社会的问题。

其次，华人族群在中国面临着重新适应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营商习惯毕竟与马来西亚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华人到了中国之后，由于没有正确界定这种差别，以为自己是华人，会说华语，熟悉中国习惯，在经商方面便没有障碍，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结果在实践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苦恼。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拿督林福山坦然承

认，“在我和中国伙伴的合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许多困难。”¹⁹ 连马来西亚前驻中国大使阿都拉·马吉德(Dato Abdul Majid Ahmad)也指出，有些大马商家自恃懂中文，跟中国人谈生意便容易多了，其实懂中文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了解中国的经商文化。“一些大马商家认为在我国成功的经营模式就必当能在中国依样画葫芦，这个观念不对，因为这里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²⁰ 因此，马来西亚华商要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获得成功，就一定要努力适应当前中国的经商环境和营商习惯，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要和心态，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华商必须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早已跨越卖方市场的阶段，商品的销售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难度，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要求越来越高；一般行业的投资似乎已经饱和，投资活动的风险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对引进外资的要求越来越高，都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作为目标，属于中小企业类型的华资企业，也面临着较高的进入门槛。

因此，借助跨文化优势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商，一方面要在自身产品品质方面下功夫，做专做精，突出优势和差异化，才能站稳脚跟。一方面要提高自身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的水平，发挥国际商业网络的优势。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除了大型跨国公司是利用其自身的优勢在全球范围重新配置资源和市场之外，大多数外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要在中国市场销售或者出口到国际市场，外资企业拥有掌握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和市场营销网络的优势，通过接受生产订单到中国加工生产的模式，获得较大的成功。马来西亚华商到中国投资从事贸易活动，仅仅突出同文同种的优势是不够的，只是凭借自己的跨文化优势是不够的，在目前的情势下，更是需要拥有国际市场订单的优势，需要有更广的国际网络。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马来社会与中东等伊斯兰国家有跨文化的优势，印度人社会与印度有跨文化的优势。华人族群的跨文化优势应该还要体现在连接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方面，一旦与这些文化达成有效的结合，华人族群的跨文化作用就会更加大，华人族群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程度就更加高。

四、华人族群：国际化、本土化、全球化

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历史演变来看，他们前后经历了国际化、本土化、全球化的过程。

国际化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特征。早期中国商民在开展中国与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区域贸易活动中，有部分人在马来西亚定居下来，随着贸易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在海外的定居，有利于移民编织了一个稳定的国际化商业网络。国际贸易活动通常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心，例如，在满刺加时期，马来西亚的国际贸易中心在马六甲。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来到东南亚，东南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从那个时代起，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就进入一个初步全球化的时代。19世纪后，马来半岛的国际贸易中心转移到新加坡和槟榔屿，新加坡和槟榔屿成为马来半岛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华人占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拥有比较强势的商业贸易力量。尽管大出口商主要是欧洲人，但华人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商角色，负责在当地收购各种输往海外的土产，然后将进口的货物转到马来西亚各地市场。华人所进行的国家间贸易活动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一部分是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与中国的贸易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大部分是利用华商自身的网络来进行，而与欧美等远距离贸易主要是依靠与西方商业网络的对接。另一方面，19世纪后随着马来半岛开发步伐进一步加快，采矿与种植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居住地逐步由港口扩张到其他地区，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的空间分布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²¹。在20世纪前半期，华人族群广泛参与到马来西亚各个经济行业之中。华人的经济活动除了一些面向本地生活的行业之外，他们所从事的商贸、采矿、种植等行业多数是面向外国的经济活动，即外向型经济活动。华人族群运用其国际商业网络，将马来西亚的产品输到世界市场中去。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前，除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限制华人的移民活动以及日本占领时期华人被切断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之外，华人族群的国际间移动一直享有很大自由度，不但移民活动是如此，经济活动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在马来西

亚独立前，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移民活动以及所从事的国际贸易等活动都体现了国际化特征。

本土化是伴随着移民社会的同步内容。从中国移民生活在马来西亚之日起，华人族群的本土化进程也就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在形式上包括了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与异族通婚，二是长期定居。对于第一种方式的本土化一般容易得到认同，例如土生华人群体，对于第二种方式的本土化，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辨认有一定困难，例如有的长期定居者的本土化程度依然不高，他们还是抱着客居的心态。不过，在马来西亚独立前，虽然有不少华人抱着寄居的心态，但已有部分华人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扎根马来西亚了，尤其那些以马来西亚为基础的华商更是如此²²。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华人族群的本土化是以自然的形式进行的。但是，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族群的本土化变成一个强制性和主观性问题。所谓强制性包括华人族群政治身份的确定，如国籍与公民权等等，即华人到底是外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华人族群的相关政策如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之中，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关政策都首先将华人族群当作“外来者”，因而以歧视性的方式对华人族群采取强制本土化的措施。所谓主观性就是华人族群的本土化本质时常受到主流社会的质疑，从而导致华人族群经常陷于两者夹击的苦恼之中。在马来社会看来，华人族群是“非土著”，因此，即使华人族群同样是马来西亚的国民，但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不能享受与马来人社会一样的权利和待遇。结果，华人族群在不断被要求本土化的同时又被设置了种种障碍来阻止其本土化的进程，并且华人族群本土化的努力时常遭到种种怀疑。从独立以来的历史可见，影响华人族群本土化的障碍不是来自华人族群本身，而是来自对华人族群的偏见、怀疑和歧视。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紧张不是来自华人族群，而族群关系的紧张导致马来西亚社会出现动荡。尽管如此，华人族群在独立后很快实行了整体性本土化的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是以自觉的形式出现的，这从华人族群对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参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代。首先，东西方冷战的结束，

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对各个国家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马来西亚提出了一个面向全球化的目标——2020年宏愿。2020年宏愿是要使马来西亚达致先进国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的开放，必须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因此从9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对于华人族群来说，90年代后马来西亚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华人族群的政策，如放开华人到中国探亲经商旅游等活动的限制，鼓励华商到中国投资和贸易等，淡化族群之间的界线，强调要打造马来西亚的“国族”等，这些变化为华人族群走向全球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在开放初期马来西亚出现一些对华人族群的效忠怀疑论调，但并没有被马来西亚政府所认同，相反，马来西亚政治领袖关于华人族群是马来西亚走向世界重要力量的言论不时见诸报端。90年代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族群态度的转变，其主要原因是基于马来西亚面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马来西亚政府态度的转变，得到华人族群的支持，所以在政治上，在90年代以后的历次大选中，执政的国阵均得到华人族群的大力支持；在经济上，华人族群积极配合马来西亚政府的全球化战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全球化，华人族群对马来西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使本身得到更大的发展。

五、结语

回顾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1，国际化是华人族群的重要特色。2，本土化是华人族群本身的自然选择。3，跨文化和适应性是华人族群的优势。

在全球化时代，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是华人，一方面又是马来西亚人，这个双重属性赋予马来西亚华人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有优势。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华人，可以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建立联系，马来西亚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人，可以依托马来西亚的影响力在海外拓展新天地。基于传统和现状，进行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华人族群的强项。与历史上华人的

国际化、全球化相比，目前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与过去那种国际化、全球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前华人族群的国际化、全球化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国际化和全球化活动的最终归属是本土的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在进行国际化和全球化活动中是以马来西亚为基点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华人族群利用自身的优势所进行的全球化便是马来西亚全球化的一部分，它有利于马来西亚推进全球化的进程。

华人族群的全球化离不开本土化。马来西亚华人到外国贸易投资时，之所以能享受一些政策优惠，就是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是“外国的”，外国企业和商人与马来西亚华商进行各种合作也是因为看中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对外经济活动的收益都属于马来西亚的经济收益。正是华人族群的全球化必然要立足于马来西亚，所以他们需要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尤其需要政府在“本土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这里的“本土化”包括对华人族群实行更加公平的经济政策，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以利于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获得平等的待遇，从而增强走向全球化的实力。华人族群无论是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还是在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活动，都需要马来西亚本土资源和网络作为支撑。对大多数华商来说，离开本土的资源、基础和网络，所谓的全球化就难以奏效和持续发展。

回顾马来西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1，凡是华人族群的利益得到善待，华人族群的创造力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2，凡是华人族群的作用得到重视，马来西亚就得到更大的推动力。3，凡是华人族群的地位得到尊重，马来西亚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移民社会与自己的祖籍国有着文化等方面天然联系，具有国际化的本质，与所在国的其他族群相比，他们在开展与祖籍国的关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国家鼓励本国的移民族群发挥跨文化的作用，发挥其国际化的优势，发展与移民祖籍国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正是着眼于华人族群跨文化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从而鼓励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走向全球化当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另一方面，许多移民族群的祖籍国也是非常看重居住在外国的移民

族群的作用，采取措施加强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吸引他们到祖籍国进行投资等活动，如日本、菲律宾、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希腊等等都是这样，并非仅仅中国是如此。例如日本，日本在海外的移民族群主要集中在美洲，其中在美国约有 100 万人。日本政府将这些海外移民当作日本走向全球化的桥梁，采取支援与协作的方法加强与海外移民族群的关系²³。又如印度，印度是世界三大移民国家之一，在海外的人数约有 2200 万，90 年代以后，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与海外移民族群的联系，包括制定奖励政策吸引海外族群回印度投资创业，发展科技事业等²⁴。希腊政府也是十分注重分布在海外 140 多个国家中的 700 万海外希腊人的作用，尤其在举办奥运会时，希腊政府发动海外希腊人社会通过各种网络为希腊提供支持²⁵。至于以色列，更是从建国到经济发展以及扩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都离不开海外以色列族群的大力贡献²⁶。因此，对于祖籍国与移民族群的关系，如果不是以某种特别的眼光来对待这种现象的话，这些措施和举动其实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它对加强与移民族群所在国各种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族群的全球化基本上源于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所在国推动他们走向全球化，二是其祖籍国拉动他们走向全球化，三是其自身要走向全球化。全球化成为当今许多移民族群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在内的主要特征和优势。

注释：

- 1 张彤玉、丁国杰：〈经济全球化的各种理论争论及其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05 年第 1 期，页 33—38。
- 2 如马哈迪在位期间 6 次访问中国，其中有 4 次访问是在 90 年代（1993、1994、1996、1999 年）。
- 3 吴绮敏：〈10+X：东亚合作热潮的再起——首届东亚峰会侧记〉，《人民论坛》2006 年第三期。
- 4 阿都拉·马吉德：〈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当代亚太》，北京，2003 年第 9 期。
- 5 〈王春贵：年增长率达 40%，马中贸易总额放眼千亿〉，《南洋商报》2005 年 5 月 2 日。

- 6 〈陈仪乔：4 年来平均增长 34%，马中贸易大幅提升〉，《星洲互动》2005 年 4 月 2 日。
- 7 马来西亚统计局，<http://www.mida.gov.my/press2005/table-RM/Table3.htm>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公报》，新华社，2005 年 12 月 15 日。
- 9 〈陈仪乔：30 多年诚恳合作，马中经贸不受影响〉，《星洲日报》2005 年 11 月 28 日。
- 10 〈驻华大使：助行销中国产品，马中应联攻区域市场〉，《星洲日报》2005 年 6 月 3 日。
- 11 〈全新机遇期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前景分析〉，http://www.cainfo.com.cn/2006-02/28/content_6346491.htm
- 12 〈去年 310 亿外来投资增 7.6%，大马续成投资天堂〉，《星洲日报》2006 年 2 月 16 日。
- 13 对华商网络的作用和模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参见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第六章（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14 中国大陆将这种现象称为侨务工作社会化，即非侨务组织也在做侨务工作。
- 15 当然，我们时常见到华人参加各种恳亲大会和祭祖寻根活动的报道，可是，这些人占华人族群总数的比例不多，而且相当部分人还是属于多次参与。
- 16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2 年 11 月。
- 17 〈金狮集团中国之旅〉，《新财经》2003 年第 10 期，页 43。
- 18 反向文化冲击理论最初是研究在海外多年的士兵回国后遇到的困难，如对母文化产生不适应和误读等。详见庄怡川：〈国外有关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研究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页 51—55。
- 19 〈陈凯希：联手发展达双赢，马中商家可结合〉，《南洋商报》2005 年 2 月 27 日。
- 20 〈专访大马驻中国前任大使：不了解中国经商文化，商家难觅生意伙伴〉，《南洋商报》2005 年 2 月 15 日。
- 21 参见 Voon Phin Keong, "Spatial Divis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A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5 期，2002 年。
- 22 本土化作为一种思想的文字表达，主要见诸于文化人的讨论。参见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第二章（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 23 参见拙作〈日本的日侨政策研究〉，载《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2000—2001）》（北京，2001）。

- [24] 参见拙作〈印度侨民政策研究〉，载周南京主编《境外华人国际问题讨论集》(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5] 参见拙作〈从世界海外希腊人联合会的经验看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整合和发展〉(未刊稿，2005)。
- [26] 潘光等：〈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犹太人：法律、政策和联络工作研究〉，载《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2000—2001)》(北京，2001)。

参考文献

- [1]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 [2]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3]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4] 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 [5] 唐礼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 [6] 许家康、古小松主编：《中国——东盟年鉴2004》(北京：线装书局，2004)。
- [7] 许家康、古小松主编：《中国——东盟年鉴2005》(北京：线装书局，2005)。
- [8] Joseph Chin Yong Liow,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 The Maturing of a Partnership*, in Asian Survey, Vol.40, No. 4. (Jul.—Aug., 2000).
- [9] Yu Chunghsun ed., *Ethnic Chinese: Their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Tokyo: The Japan Times, 2000).
- [10] Fujio HARA,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7).
- [11] 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Vol.27, No. 10. (Oct., 1987).
- [12] Bunn Nagars & Cheah Siew Ean ed., *Managing Security and Peace in the Asia-Pacific* (Kuala Lumpur: ISIS Malaysia, 1996).

- [13] Mohamed Jawhar Hassan & Sheikh Ahmad Raffie ed., *Bringing Peace to the Pacific* (Kuala Lumpur: ISIS Malaysia, 1997).
- [14] Mohamed Jawhar Hassan ed., *A Pacific Peace: Issues & Responses* (Kuala Lumpur: ISIS Malaysia, 1998).

“海外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概念的再思

唐南发

一、前言

“海外华人”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词汇。正如一些人所言，全球各地所谓的“海外华人社群”，从华人高度集中的东南亚，到欧洲和北美相对较小却富裕的唐人街，在见证了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震荡。对于“海外华人”的概念，普遍的看法是指源自于中国，而目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族群 (diasporic communities)。根据《汉书·地理志》，汉朝时候就有中国人来到今天的东南亚，所以华人到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年。¹

但中国人大量往海外移民的历史要迟至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特别是 1860 年同英国和法国签订的《北京条约》，使华工可以自由出境，开启了中国人“苦力贸易”的时代。专家和学者对这方面的数据有争议，但保守估计，从 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人向外迁移的人数不下一千万。

二、华人，汉人，海外华人和华侨

这样的历史背景产生了今天中外学术界普遍论及的“海外华人”。但在上个世纪初期，无论华人往世界的哪个角落去，他们当中大部分的

人都知道，无论贫富，本身最终还是要“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回到中国这片土地终老。对那个年代的海外移民而言，作为一个“华侨”的身份是很清楚的。

但这不表示“华人”是一个单一和统一的身份认同。其实，如何为“华人”两个字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还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海外华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Overseas)，到目前为止属于有关世界华人移民史最全面的刊物，把全球华人分成四个类别：

- A 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 B 是香港、澳门、台湾和其他大陆以外的中国人；
- C 是海外华人；
- D 则是已经遭到同化的华人。²

这个分类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华人”二字越下定义就越令人感到混淆。

严格来说，“华人”是一个流行于中国以外的词汇；它有时候和“中国人”三个字交替着用，但更多时候，两者之间有着很清楚的区别。在中国大陆，“华人”通常指非中国国籍、但却是具有华裔血统的人。中国国务院也对“华人”和“华侨”作了严格的区分。在2002年8月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中国合作论坛”上，有马来西亚记者针对“华人”和“华侨”的定义提问，一位中国国务院的代表在回答时候指出，前者是华裔外国人，即可以是美国公民，英国公民，日本公民，马来西亚公民或新加坡公民，但他/她必须是华裔；后者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居国外的公民，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具有他国永久居留权，但尚未入籍该国的中国籍人士。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把永久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士也列为“华人”，但这个定义是否获得中国国内的学者的认同，尚有待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像笔者这样的“海外华人”³，在中国境内和当地人交往的时候，对方会视我为“华人”，但他/她本身很少会自称“华人”，而是“中国人”。

《海外》定义的另一个争议点是D项，即“遭到同化”的华人。这使人马上联想到近乎彻底汉化的满洲人，他们本身的身份认同究竟是“满

洲人”，“中国人”，抑或是“华人”？所谓的“同化”，是以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出于对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等地域的战略需要，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即汉、满、蒙、回、藏皆属于“中华民族”的成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沿用这个概念至今。但“华人”两个字，可否也用在汉族以外的其他四个民族身上？假若可以，那么“遭到同化的华人”，也可以指遭到汉、满、蒙、回、藏任何一个文化同化的人士。我很想知道中国的学者，特别是汉族学者，对这样一个提议的看法。

再者，《海外》不足之处，是没有办法给“海外华人”四个字下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关于这点，我有两个意见：首先，“海外华人”中的“华人”，包不包括身在中国以外的非汉族中国公民？也就是说，像吾尔开希这样的海外维吾尔人，在不在研究海外华人的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范围(ambit)之内？如果吾尔开希“海外华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原因是纯粹因为其属于中国的维吾尔人的缘故，抑或是由于他说得一口漂亮的汉语和近乎汉化的背景？⁴

在马来西亚，似乎还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注意到是否中国以外的(“非汉人”应该被接纳为“海外华人”)，显示这个课题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虽然出生台湾、原籍维吾尔族、已经入籍马来西亚多年的(永乐多斯)(Yulduz Emiloglu)在本地被公认为知名的“马华作家”，但她广受马来西亚华裔群众的拥护，笔者个人怀疑主要还是因为她汉人的特征大于维吾尔族人的特征(永乐的母亲是汉人)，而且她一口字正腔圆、漂亮的华语(台湾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令许多因为本身“华语不好”而感到自卑的华裔马来西亚人折服。

进一步讲，如果在中国以外的非汉族不被看作是“海外华人”，那么所谓的“五族共和”，恐怕就有值得争议之处。如果一个具有汉族血统的马来西亚人可以被当作是“海外华人”，那么具藏族背景的美国公民，应该也可以是“海外华人”，因为大家如果去到中国，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子孙。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要给“海外华人”下定义，就不得不找出谁才是“海内华人”。根据以上的讨论，毫无疑问地，“海内华人”，指的

就是中国境内的“华人”。没有“海内”，何来“海外”？这正是我这篇文章尝试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作为一个大陆性帝国，中国自古就热衷于从文明的角度给自己下定义。⁵明朝的永乐皇帝虽然派遣了郑和以及其他航海员“下西洋”，但这些航程的目的一直众说纷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到“化外之地”去“宣扬国威”。遗憾的是，后来的皇帝宣布闭关锁国，使中国同外界的接触断绝了400多年。1727年，清廷还正式颁布一项政令，把“海外华人”归类为不良份子，“海外”因此披上了极度负面的含义。即使后来清廷允许中国人移居海外，这些过去离乡的子民却不被看作是良民。晚清和民国（1895—1945）期间在列强手下多次的战败和羞辱下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天朝”子民离开文明的中心，到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地区（特别是南洋）从头开始。

可是，“海外华人”毕竟是一个以中国为本位的说法，有其文化霸权性。然而，要如何给“海外华人”下定义，一直是相关学术界头痛的课题。即使是研究“海外华人”的权威，目前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赓武教授，也坦然承认在这方面存在着的困难很大。他个人反对在文化的层面上，把全球的华人社群统称为“大中华”，因为这隐含着一种文化霸权；至于“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他感到不满意，“因为它和犹太历史有联系而不被东南亚所接受”；但对于“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他也不置可否，因为这一词不见得比“大中华”来得准确。⁶2003年7月杪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中，笔者有幸同王教授探讨“海外华人”的定义，他同意在尚未出现一个替代字眼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折衷性的说法，有其弊病，特别是对已经近乎全面认同所在国的华人而言，更是如此。

此外，除了比较严谨从事华裔族群研究的人士以外，一般人对Overseas Chinese 和 Chinese Overseas 之间的区分并不了解。Overseas Chinese 其实指的是“海外中国人”，即“华侨”；而 Chinese Overseas 才是“海外华人”，或简称“华人”。关于“华侨”的论述很多，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早在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呼吁海外侨胞放弃中国国籍、入籍所在国以后，“华人”的身

份就正式得到确立。将近50年之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二字已近乎绝迹，反而是香港、台湾和欧美的华人社会，还习惯性地把东南亚华人称作“华侨”。无论如何，或许出于历史感情，又抑或英文教育社群对华族历史的研究不足的缘故，马新两地的英文媒体依然普遍采用 Overseas Chinese 来表示定居中国以外的华裔社群，而中文社群当中，对“海外华人”的身份也同样存在着依恋。至于国际学术界，则有以 sojourning Chinese 来论述华文移民美国的历史⁷。这个字眼当然更能够表达华人飘离海外的历史经验，可惜尚未大量进入马来西亚的论述中。

三、从海外华人到“马来西亚华人”

在马来西亚，“华侨”这个字眼对华文社群⁸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华社普遍上倾向于认同本身是“马来西亚华人”⁹。尽管如此，对于“海外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同样没有进行过严肃的再思。无论是类似“世界华商大会”这样的国际性华裔场合，抑或中国的“神舟五/六号”升空，马来西亚的华文社会都将其视为是所有“海外华人”的大事，是值得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在内的所有“海外华人”骄傲的。但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自己确确实实是马来西亚公民，于是在把自己形容为“海外华人”的时候，他们是否清楚这个“海外”究竟指的是“中国之外”，还是“马来西亚之外”，就显得甚为有趣。这个问题的产生，意味着华裔马来西亚人对公民权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和本身作为“华人”的身份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

但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在身份认同上明显产生了变化，在年轻世代中尤其强烈。这点反映在一份由一位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学者王碧君于2000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上。该份调查报告的对象是四所大专院校其中501位的学生，而王的院校选择也有其原因：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是英国殖民政府设立的，各族群的学生比例同国家族群比例大致一样；马来西亚国民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是独立后马来西亚政府所创办，马来裔学生占多

数；(拉曼学院)(Tunku Abdul Rahman College)是为了缓和华人因为大学配额制(quota system)所衍生的不满而设的民办学院，90%的学生来自劳动和中阶华人家庭；而HELP Institute则是马来西亚典型的私立精英学院，学生来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的上流家庭，因此是阶级性大于族群性的一所学院。

该份报告的结果显示，有70%的受访者表示一个基于国语(马来语)和国教(伊斯兰教)，但透过宪法保障教育和信仰自由的马来西亚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大于，或等同于本身的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只有20%的华裔学生和24%的马来裔学生表示他们本身的族群身份认同比一个共同的马来西亚人身份认同来得重要。这份报告的结果的意义特别是在华裔学生方面，没有任何一位受访的华裔学生(无论通晓中文与否)表示华文有成为官方语文的必要，这点和独立时期至1990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诉求很不一样。

尽管如此，马来裔学生和非马来裔学生对于“一个共同的马来西亚身份认同”的准绳却有着显著的落差。在同一份报告中，有62%的马来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标志；相反的，有70%的华裔学生认为马来西亚国族(the Malaysian nationhood)应该建基于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原则。¹⁰

无论如何，王的报告并不能被看作具有高度的代表性。¹¹但它所标示出来的，是一个可能的典范转折(paradigm shift)。在马哈迪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已经逐渐建立起必须打造“一个马来西亚国族”的共识，虽然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世纪与文明研究所所长Shamsul Amri Baharuddin认为这个由政治精英所引导的“意愿国”(nation-of-intent)，“其概念还有待构筑，或再构筑”¹²。毫无争议的是，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裔已经接受了国语和国教的地位；而私立教育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因为大学配额而引发的族群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其负面影响是华文教育工作者原先“华社先锋”的地位遭到削弱，新一代华裔对华教的奋斗史认同感不足。另一个负面结果是，非穆斯林接受了伊斯兰教作为主导宗教的地位，从要求“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与平等”，退而求其次，希望“宪法保障信仰自由”。这样一种转变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着执政的巫人统

一机构(UMNO)和伊斯兰教党(Parti Islam SeMalaysia)围绕着何者最具有建立伊斯兰教国的条件，非穆斯林，尤其是华人，表现得异常超然，甚至淡漠。

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家独立的46年当中，从“华侨”演变成为“华人”，而现在的挑战则是他们能否成功地和以马来人及穆斯林为主力的非华人整合，共同打造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可以肯定的，是认同本身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群体，会大于“海外华人”。如果解释得清楚，对于“海外”，新一代的认知很可能是“马来西亚以外”，而非“中国以外”。

四、在马来西亚的情境下看公民权以及 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海外华人”对“公民权”有着很务实的态度，而且拥有多重国籍的华人比比皆是。王爱华就曾经指出，华人“把公民权看作是一个管道，使人能够在最少控制、税务或政治责任的情况下求生”。¹³可是这样一个论述，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并不适用。新加坡华人虽然是一个移民社会，但新加坡共和国基本上是一个华人建设的国家，所以华人对国家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很强，不仅仅是国籍的问题而已。而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参与了独立和建国的过程，他们的角色和贡献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肯定，因此一本马来西亚护照，对华裔马来西亚人而言就不只是“糊口”的工具，而是一种身份认同，一个定位。事实上，如果要的只是“求生”，华裔马来西亚人或许宁可和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选择英语系国家。事实上，从独立到现在，马来西亚至少有50万的华人移民海外。和移民美国、加拿大、澳洲或纽西兰以寻找新天地的华人不同，华裔马来西亚人在建国的过程中，把本身视为和马来西亚其他种族一样，都是拓荒人与先锋。

要更深入探讨公民权和政治身份认同的课题，就必须重新思考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和“华裔马来西亚人”之间的争论。在马来西亚的

英文社群当中，以 Chinese Malaysians 取代 Malaysian Chinese 的建议逐渐获得响应，例如受欢迎、另类和独立的电子媒体“当下马来西亚”(malaysiakini.com)，以及本身是马来西亚人、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的陈志明教授。¹⁴ 这个用法的原因主要在于强调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身份是 Chinese，但国籍绝对是 Malaysian。和 Chinese Americans 一样，Chinese Malaysians（华裔马来西亚人）用法的普及显示了他们要求和土著或“主流社群”(host society)一起当家作主的心愿。

但这个认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英文社群。在华文社群方面，所讨论的范围到目前为止还只停留在“中国人”抑或“华人”的层次。关于这一点，马来亚大学东亚系主任何国忠亲自见证了两代之间的鸿沟。在“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一书的第七章中，何写道：

2000 年 6 月 24 日，在吉隆坡一个学术研讨会中……笔者提到“华人”或“中国人”的名称只是文化或族群的符号，引来了南方学院中文系系主任赖瑞和在观众席上的一席话：“如果重新称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的‘中国人’，我的感觉会更好。”

赖瑞和的话刚一说完，一位马来亚大学的学生激动地通过另一个麦克风表达不满：“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华人’。”一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一场讨论会大约有五百名听众。¹⁵

当然，如前所述，一般人对本身的“身份认同”虽然已经演变成为“马来西亚华人”，但对于“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华文社群的感觉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对这个概念没有太大的认识，也就遑论探讨“海外华人”的谬误了。当然，华裔马来西亚人从来没有要淡化本身的文化身份，而且在捍卫华文教育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松懈。虽然近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界出现了是否应该同中国文学断奶的争论，但整个大趋势是走向文学的交融，所以和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界还是不断地紧密合作、频密交流。所不同的是，随着国内一个较清晰、具体的共同身份认同的出现，导致了新一代华人有追求本身独特的“华人身份”的欲望，也从而挑战了传统所谓的“海外华人”的

定义。

五、结论

“华人”作为一个身份认同，对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但一个基本的认同是这个群体的人，无论其身在何处，其祖先必定源自中国。但“华人”是否以“汉族文化”为基础，至今似乎还没有很清楚的共识，而离开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否同样被归纳为“海外华人”，更是学术界甚少论及的课题，这方面的资料极为匮乏。

对于“海外”的概念，从媒体到学术界都没有严谨地探讨过，而且对“海外华人”的定义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就已经取得外国国籍、认同了所在国的华裔人士而言，“海外”如果继续指“中国以外”，“海外华人”就是一个极不确切的用法。

在马来西亚，过去廿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对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也起着很大的冲击。年长的一代固然对本身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仍然存有眷恋，但对新成长的一代而言，他们有着极为不同的身份认同。“马来西亚”对这一代的人，尽管因为现有体制的弊病和政策的偏差而让华裔感到一定的模糊和若即若离，却因为在本地成长的经验，仍然要比“中国”来得更为清晰、实在和具体。这当中，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随着越来越多各地的华人前往中国就业、经商、学习和发展，长年的中国经验会在未来丰富了华裔马来西亚身份认同的成分¹⁶。但值得探讨的，是“海外华人”这个概念会否随着世局的演变，和当年的“华侨”一样，逐渐在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字叙述中被淘汰。

本文尝试透过马来西亚的例子，说明了“海外华人”一词在当前的国内和国外环境下所造成的困扰和混淆，以及其“文化霸权性”，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华人研究界一些更严谨、更深入和更具体的讨论。当然，笔者很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这么一个快速转变的时代，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需要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探讨，因为身份认同从来就不是僵硬和一成不变的。

注释：

- 1 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84)，页117。
- 2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er, 1998).
- 3 在笔者而言，‘海外华人’是个误名。见注8。
- 4 在同笔者的意见交流中，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谢剑教授认为吾尔开希应该被看作是‘海外华人’，并强调‘吾尔开希已经很中国化了’。2003年11月8日，吉隆坡。但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孙歌教授亦在一次华人文化论坛中承认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例如有关汉族在文化上歧视维吾尔族的问题方面，依然处在皮毛阶段，2005年1月，台北。
- 5 王赓武，〈民族主义、族群性与亚太区域〉，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2002)，页178。
- 6 王赓武：《大中华与海外华人》，刘宏，黄坚立主编，页223。
- 7 例如 Anthony Reid 主编的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1996。东南亚方面，王庚武教授亦曾在以上这本书中写了一篇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 8 我不用‘华人社会’，是因为我不以语文给一个人的族群身份下定义。世界上不懂中文的华人很多，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具有华人的血统。在马来西亚，每当媒体使用‘华社’，其实指的是‘懂华文的华人社群’(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但至少有10%的马来西亚华人是不通晓华文的没有理由把他们排拒在外，所以我把他们称为‘英文社群’(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对此，本身是‘海峡华人’(Peranakan Chinese，即华人和马来人通婚的后裔)的国际文化理论学者 Ien Ang 曾经强烈抗议华文学术界刻意排斥像她这样不懂中文的‘假华人’，并视之为同中国和东亚兴起有关的一项政治举动。她强调“不同的离散华人社群应该不断重新协商和探讨‘华裔特性’(Chineseness)……各地区对作为华人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应该不断地重新被协商和探讨，而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华人的身份也随着当地的环境而被塑造。”见：Ien Ang, “The Differential Politics of Chinesenes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2 (1994), p.73。当然，马来西亚也有只会说马来语的华人，他们被称为‘土生华人’(英文当中同样被翻译为 Peranakan)，特别是在马来半岛中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州属，如吉兰丹和丁加奴。
- 9 若非因为很多人对于‘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的意思感到模糊，错误以为这才是正确和标准的用法，我会偏向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

- 10 王碧君，〈马哈迪世代与马来西亚的国族建造：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动力〉(The Mahathir Gener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Dynamics)，2003年8月，未出版。
- 11 例如有人置疑为何王所选择的院校都在首都吉隆坡附近，没有扩大到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一直被认为受到西马半岛忽视的东马两个州属；也有人批评她没有选择纯粹民办的华文院校，例如南方学院或新纪元学院，或者纯粹招收马来学生的院校，例如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或其他伊斯兰宗教学院，或由印度人政党所办的学院，作为调查的对象之一；而且针对问卷的提问方式，也有人表示过分‘亲政府’，例如‘哪些政府的政策最有效地提升你作为马来西亚人的认同感’，‘你认为马哈迪首相最有效或最大的成就为何’，等等。
- 12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Nations-of-intent in Malaysia’, in Stern Tonnesson and Hans Antlov, *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Curzon: Richmond, 1996), p.426–456.
- 13 Aihwa Ong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 1: ” 3 (Winter 1993) p.755
- 14 Tan Chee Beng, ‘Socio-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Identities’, in Lee Kam Hing & Tan Chee Beng (ed.),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8.
- 15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马来西亚亚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197。
- 16 在族群/种族问题敏感的马来西亚，执政集团谈到身份认同往往会期望华人同“中国”一刀切以示对本土的效忠，而忽视身份认同的内涵其实本来就是复杂和多元的形塑过程。例如当国际影星杨紫琼在2001年获颁勋衔之时，代表官方立场的马来报章 Utusan Malaysia 及 Berita Harian 都有社论和评论文章在肯定杨的贡献之余，亦强调她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对杨在美国好莱坞的成就，作者没有异议；但对杨同中港台的联系，却刻意给予淡化。2005年11月，马来西亚媒体揭发了中国公民/游客遭移民局官员刁难以及执法单位羞辱的事件，最终却因为种种因素，事情草草结束，媒体亦被告知不要继续“炒作”该项课题，错失了一次深入探讨华裔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之间互动和认同的机会。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大视野和 小格局：本土、区域与中国

莫顺宗

一、天地沙鸥：历史契机中的华人社团

本文拟从本土、区域和中国的角度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视野和格局，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因为新近流行的全球化思维激发而致的。无可否认，近年来全球化意识的兴起，以及华商跨国商业网络的提出，确实让人看到应当拓宽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视野与格局的必要。但本文亟欲强调的是，早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前的漫长岁月，华人社团已经拥有本身独特的本土、区域，乃至世界的视阈，以及与之相关的丰富运作经验。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肯定不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华人社团的视阈和经验自有其形成的历史因由。

华人社团在马来西亚历史悠久，可谓自有华人社会以来即有华人社团的存在。华人社团曾经协助华人的移民和谋生，也曾经协助华人帮派、省籍观念的消融和重塑，更曾经协助各地学校、庙宇的兴建和发展。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华人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见到华人社团的身影。华人社团从清末民初、英殖民、日皇军到建国独立，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是那么艰辛。百年之间，在瞬息万变的时局里，华人社团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自身的视角，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否则将失去发展的机运。

但那些年间的变化，莫说彼时的当局者，即使时过境迁的此时，我们也不见得可以从容爬梳整理。远的不说，仅从马来西亚建国开始说起，时至今日所有关于马来西亚的论述，当中能有多少可以妥善处理时间上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以及空间上的西马、东马和新加坡等的问题。后来者的我们尚且如此，参与历史的当局者必定更加剪不断理还乱了。更何况，华人社团当时面对的变化不仅于此。如果我们考虑到独立以后，华人由侨民变为公民，中国由祖国变为他邦，就可以想象华人社团在那样的情景下，想要调整视角是何等的困难了。试想想：今日一句看来简单的“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当时该当如何说起？

我们可以尝试列举一些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1950、60 年代华人社团问题的繁复庞杂。首先是本土和中国的问题。1957 年以前的华人社团，其眼中所视，中国应该才是其本土，但一夜之间中国却是它的国际视野。其次是西马和东马的问题。沙巴和砂劳越在 1963 年前，若用中国角度视之，则为南洋的一部分，但如今却是马来西亚组成的另一半。至于新加坡的问题就更不容易处理了。1965 年后，在政治上，新加坡由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变成东南亚区域的一个国家。但在历史上，尤其从华人社团角度来看，1955 年创办的南洋大学一直是这两个地区华人不能磨灭的历史记忆。1950、60 年代，马来西亚华人和华人社团面对的本土、区域和世界的重新界定，变化之大，用“沧海桑田”形容，显然不会夸大其词。

但在政治压力的催促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它必须对这种种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那些以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为主力，却称为“南洋客属总会”、“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¹ 的华人社团不是改名，就是改组。这些改名和改组的工作往往随着政局的改变，而一改再改，至 1965 年后才比较确定下来。以“南洋永春同乡总会”为例，1957 年马来亚建国，这个同乡总会被迫改组，并重新定名为马来亚永春联合会。时隔六年，1963 年沙巴、砂劳越、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组成马来西亚，它只好“将马来亚易为马来西亚，俾利容纳非马来亚之乡团”，但仅仅两年后的 1965 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它“格于社团注册法令，新加坡永春会馆不得成为本联会之属会”，又再改组其会员结

构，以迎合新的局势。²

这些都是当时华人社团无法回避的改变。当然，华人社团面对的这些改变，也许看在一般人眼里，只不过是华人社团需要在组织形式上做一点重组的工作，而这样的重组工作纯属技术范围，不具多大的实质意义。要不然，华人社团也顶多因为这些环境的变更，而需要稍微调整其心理上的适应而已，再无其他更多的考虑。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表面上看来的简单，华人社团的任务不能仅止于此。事实上，在这些变迁的背后，华人社团真正面对的，是攸关其往后存亡兴衰的考验和挑战。华人社团原有的山河已经天翻地覆，本土、区域和世界更是视角对调、界限重划，在新旧版图之间，华人社团应当清楚了解，新的该如何经营开拓，旧的应怎么继承转化。这是关乎山河再造、版图重划的大工程，绝无可能仅是形式上和心理上的小问题。

1950、60 年代，建国巨轮已然高速滚动，其势终无可挡，当政者所作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起牵一发动全身之效，所有的个人或团体绝无可能再独善其身。这个时候华人社团领袖不但要有新的思维和路向，更必须审时度势，积极思量建立华人社团新的“世界观”，展现崭新的本土、区域和世界视野，为华人和华人社团本身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否则，在日新月异的政治、社会境况下，华人社团必当如飘飘何所似的天地一沙鸥般，不知疆域之何在，更别说什么功能和定位了。

我们现在回到当日的历史现场，绝对可以感受华人社团当时任务的艰巨和抉择的困难，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唇齿相依、厚望深寄的华人社团，在新的起跑点上到底应该如何把握那历史的契机？华人社团可以选择怎样的路向？建立什么视野和格局？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些问题显然都不容易回答。

但五十年后的今天，答案当然已经揭晓，华人社团选择了什么，错过了什么，现在似乎再清楚不过，抚今追昔，我们谁都可以为华人社团五十年来的表现写下结论。只不过，若要瞻其前因、顾其后果，知其所以然，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清楚交待。问题和答案经常都显得似是而非，我们没有理由可以不细说从头。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华人社团至今仍然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挣扎前进，如果它曾经错过了什么，我们要问的

是，今天它还可以找回什么？这道问题显然也不容易回答。但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有谁可以拒绝回答呢？

二、大而无当：华人社团的大视野与小格局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华人社团很快就发现它在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大为衰退。这主要因为政党的成立，导致华人社团这方面的功能被取而代之。曾经担任雪华堂会长职位的李延年就指出这点，他说“在殖民地时代，大会堂扮演着华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的角色——直至政党成立为止。”³言下之意是华人社团因此而功能窄化，在政治上角色不再。雪华堂一直以来是华人社团中的佼佼者，⁴其会长尚且有此感触，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华团中人必定对此感到或多或少的失落。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独立之后退守民间的华人社团，其可以驰骋的疆域不见得会因而缩小。华人社团凭着它们的民间身份，有时候反而可以在更大的空间通行无阻地展开活动。以沙巴和砂劳越为例，东西马虽为一国，但立国以来西马政党一概不得涉足其间，这是因其历史因素使然，两地政党在政治上各有堡垒，互不干涉。即使部分东马政党结盟在国阵名下，但东西马政党向来各司其职，绝无越俎代庖的情况发生。这种僵局直至1990年代巫统东渡沙巴，情况才稍微扭转过来。即使如此，长期在西马坐大的巫统，却无法在沙巴发挥同样的影响力，更别说是马华公会等其它政党了。政治如此，其它领域也相差无几，东西马结为一国，已经超过四十年，但两地之间各方面的往来，禁区仍然不少。反倒是华人社团在东西马交往方面，最无往不利。

1963年以来，经常可见东西马两地华人社团各依据其乡缘、血缘、业缘等共同性质，结为联合会，这种情况普遍至极。至于华总、董总、教总、商联会等较高层次的华团组织，更是视东马的同道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华人社团领袖眼里，华人社团之间无论交流、合作，甚至结盟，必须达东西马合璧层次，才算两全其美。不但如此，东马华人社团领袖，如黄文彬者，还曾于1980、90年代问鼎中原，担任全国华商联合会会长。相较之下，这种情况在政党方面未曾得见，东马政治人物欲

成为全国性领袖，短期内应当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华人社团在东西马之间穿梭自如的经验，从东西马人民交往角度而言，肯定非常珍贵。马来西亚建国半世纪以来，应该没有多少组织，可以像华人社团般全面在东西马通行无阻。马来西亚“本土”由东西马共同构成，说立足本土，若由此观之，华人社团堪称成功，可为典范。

无论如何，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华人社团可以突破东西马的政治禁区，并不完全因为其民间身份，同时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也是一个主因，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所谓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主要是指华人特征而言。华人社团作为华人的社团，其组织成员和服务对象，自然是以华人为主。事实证明，从华人社团的社会关怀角度观之，华人社团的华人渊源之“华”从来都是在其民间团体的“团”之上的。⁵这样的社会关怀视野是否足够宽广，我们下来当有论述；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渊源，加上其民间组织的身份，使华人社团可以突破东西马政治和地理的隔阂和藩篱，在全马铺建华人社团的大网络。

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说明的是，这种华人社团民族渊源和民间身份的双重特性，不仅使其能够在本土华人社团之间展开由点到面的合纵连横，也使其在障碍重重的区域与国际关系间，掌握丰沛的人脉资源。当然，所谓的区域与国际关系，主要指华人地区言，这也符合华人社团的特性，而其切入点必然是以“文化中国”为手段，方可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另外，尚需补充一点，以华人历史和文化渊源为合作和结盟基础，对乡缘、血缘之类的乡、亲团体尤其有利，这方面反倒是中华大会堂等层次的华人社团显得比较逊色。我们可以从一些乡、亲团体的成功个案，窥视这类华人社团如何在本土，以及华人为主的世界中开拓更大的活动和安身立命范围。乡、亲团体一般历史最悠久，其迈向现代化的阻力相对较大，但部分乡、亲团体却因为懂得利用本身的优势，而颇有表现。

试以雪隆潮州会馆为例。潮州人在雪隆华人人口中仅占少数，但其视野显然高于其乡团规模。在雪隆地区，它分别是雪华堂和广东义山的重要成员，这使它在这个马来西亚首善之区的华人社会中占据显眼位置，其中尤以捍卫广东义山免于被铲除，成功保卫华人在吉隆坡“铁证如

山”功绩的角色最引人注目。但其角色并不局限在雪隆地区，这个会馆的历届领导，先是积极推动“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再透过举办“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最终催生“国际潮团联谊会”。可以说，雪隆潮州会馆从雪隆地区一个乡团的基础出发，然后与其它华人社团合纵连横，由雪隆而全马，然后扩大至全世界的潮人和华人圈子，建设更大网络供其角色的延伸，大大拓展它作为一个地区性乡团的地位和格局。⁶

从雪隆潮州会馆的例子来看，华团中人若能善用华人社团的特点，未尝不可以扩大社团的视野和格局。这样的视野和格局当然不算宽广，其重点显然侧重在华人，但既然名为华人社团，则当无可厚非。更何况，这样的视阈，至少可以让华人社团在本土、区域、中国，以及其它国度华人圈子之间穿梭自如、左右逢源，能做到这些，其实已经不容易。华人社团这方面的表现，可算令人满意。但华人社团的表现却不应该仅止于此。毕竟这只是形式上的合纵连横，即便天下一统，若没有后续的实际成果，只是空有名堂，终属徒然。可惜的是，华人社团半个世纪以来，几乎将精力集中在这种形式上的开拓工作，实际功能方面，却没有提升多少。

华人社团之间的相互结盟，诸如成立联合会，若能点到为止，当如前所述，可以扩大整体华人社团的格局。而且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整合。因此，数十年来华人社团高喊“从小团结到大团结”的口号，肯定是有其需要的。但整合是为了凝聚力量，加强华人社团的功能，因此整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一直为了整合而乐此不疲，却不知整合的目的何在，最终只有形式上的结合，没有功能上的合作，这样的整合不但没有意义，而且还可能对华人社团造成伤害。华总就是长久以来整合的最大成果，但结果如何？华总成立至今十五年，它作为华人社团总司令的表现肯定叫人失望。一些小乡团，如雪隆海南会馆和它的天后宫，或者上文提到的雪隆潮州会馆，论表现甚至比华总还要出色。

华人和华人社团对华总当然是失望的，但华团中人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反而以为华总的问题在于整合做得不够彻底。正如广西总的

会会长孔庆庶所言，“华总既标榜代表华社，就不应将会员籍限制在13州大会堂”。⁷ 听到这样的论调，我们应当可以明白为何七大乡团在2001年会突然站出来，并极力提倡乡团总会的成立。我们的问题是，乡团总会如果成立了，宗亲团总会、行团总会，是不是也应该成立？如果这些总会都成立了，加上商联会、董总、教总、校友联总，什么样的总会都有了，大家跟华总平起平坐，华人社团总司令就不复得见了，到时候是不是还需要成立一个这些总会的总会？这绝对不是多余的顾虑。华团中人的心思大体如此。我们可以听听广东会馆联合会会长谢玉麟的心声，他说：“组7大乡团联合会：好；组‘全国乡团总会联合会’：更好；组‘全国华团总会’：最好”。⁸ 所谓“全国华团总会”跟1978年雪华堂倡议并推动的“全国华团总机构”，所指绝对都是同一概念。两者相隔近三十年，华团的心思始终在此打转。二十多年前的倡议，催生了今天的华总，今天旧事重提，未来又会如何呢？

这种华人社团整合的心态，未来对华人社团必定是伤害大于建设的。整合原来是为了消除山头主义，但我们眼前看到的结果却是制造了更大的山头主义。即使是整合真正成功，但若没有发挥应有功能，只不过让人对华人社团产生“大而无当”的印象。华人社团合纵连横的视野虽然很大，但功能发挥的格局却很小。

整体观之，华人社团这五十年来的表现绝对无法让华人满意，就历史感情言，华人对华人社团肯定是觉得“弃之可惜”，但就实际功用言，却又觉得华人社团“食之无味”了。当然，比较庆幸的是，尚有一小部分的华人社团却深受华人的欢迎，尤其是在华文教育方面表现突出的董教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董教总显然异于一般华人社团，应当区分开来讨论。

三、铁树开花：董教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与教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分别于1954和1951年成立，当时恰好是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前夕。

董教总五十余年来为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奋战不懈，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两个团体。

马来西亚政府建国以后，即以国语是团结各族人民的工具为理由，坚持马来语文是所有学校最终使用的唯一语文，并且制定明确的教育政策，限制其他各族母语教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⁹ 马来精英一直以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单元政策，作为国族打造的唯一方案，以取代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构成的多元社会状态。但对大部分华人而言，国家意识的建立与加强，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忘记身为华人的事实。教总主席林连玉早在 1950 年代就强调两者之间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¹⁰

在董教总的领导下，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捍卫从不妥协。1950 和 60 年代董教总甚至尝试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却以失败告终。不过，董教总作为华文教育领航者的地位经此一役而确立。1970 年代董教总再接再厉，推动独中复兴运动、发起申办独大计划，以及举办独中统一考试。申办独大计划在官方高压下以失败收场，但独中复兴运动和独中统一考试的举办，最后成功拓宽了独中的发展道路，独中教育虽至今不受政府承认，但其学术水平却广受世界各地大学认可。

正因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坚持不懈，加上客观环境的改变，华文教育渐渐走向康庄大道。以华文小学为例，1970 年代，由于英文小学逐渐改用马来语教学，部分原来打算选择英文小学的华裔家长，在马来文和华文之间，倾向改送孩子进入华文小学，使华小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到了 1990 年代，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造成华文实用价值日增，莫说是华人社会，连马来社会也渐渐掀起学习华文热潮，无论大专的基础华文班，¹¹ 或是华小，甚至独中，都出现越来越多的马来子弟¹²；这给华文教育制造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也给董教总人提供了一个扩大视野的机会。董教总当然察觉到二十一世纪的大环境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更加有利，对与迅速崛起的中国的互动，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发展华文教育的任务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近十年间，董教总人频繁往返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地，董教总的角色与视野已不再局限在马来西亚。以东南亚区域为例，联系东南亚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虽由东南亚十国轮流主办，

但幕后策划、推动的工作，基本上由董教总执行，实际上整个业务的运作，也以董教总为核心，董教总隐隐然已成为此区域华文教育的领导机构。1998 年印尼排华事件发生后，许多印尼华人将子女送往马来西亚独中就读，多少说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扮演的角色。

至于与中国的互动，可以开拓的空间显然更大了。单以八年前董教总创办的新纪元学院为例，短短数年间已经与超过三十所中国高等学府建立姐妹校的联系。在大陆开放以前，董教总的外援主要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但大陆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肯定更重大。

董教总与大陆的频密互动，对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本土，以及东南亚区域的发展，绝对有利。但在目前而言，却未能动摇马来西亚政府的意志，董教总的华文教育大视野虽渐渐成形，不过对改变国内华文教育的生态，却未有良方。

马来西亚政府其实不反对国民学习华文，但那是作为第二语文的学习，不是董教总坚持的文化传承的母语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鼓励马来人学习华文，愿意在国民小学开设华文班，让各族学童以第二语言的方式学习华文，但对华小、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则无论如何都不鼓励。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其所坚持的单元语文单元文化政策。政府惯用的理由是：只有当所有的孩童都进入国民小学，才可确保各族的团结。2002 年 3 月，多次赞扬华文小学办学出色的前首相马哈迪受询马来子弟到华小念书是否跟各族学生到国民小学求学一样，也可以达到国民融合的目标时，虽然表示政府不阻止马来学生就读华小，但却“半开玩笑”地回答表明政府的立场：“我们不鼓励他们这么做，否则马来西亚将成为中国”。¹³ 政府的立场可谓不言而喻了。

正因为政府的立场如此，所以董教总对政府提议的任何乍看起来对华文教育有利的计划，都会保持审慎态度。就如十年前已经提出的在国小开设华文班的提议，董教总都会马上联想到政府的别有居心。董教总于计划公布后即表明立场，认为此计划会对华文小学产生不良影响。其一，国民小学并没有足够的华文教师，教育部可能会从已闹师资荒的华文小学抽调教员。其二，原来打算送孩子到华小的家长，可能改送孩子到同样没有华文科的国小，可是仅得一科华文的国小，根本不能算是真

正的华文教育。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批评董教总的立场，完全否定政府可能具有的善意，但华文教育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华小师质、宏愿小学、数理英化、白小事件，没有一项可以让董教总放下对政府的戒心。

总而言之，近十余年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新变化，也看到董教总与东南亚和中国互动中产生的新视野。但碍于马来西亚官方思维的一成不变，国内华文教育长期以来的种种困局暂时尚无法打开。官方的思维基本上是政治的，而非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教育的格局暂时未能有更突破性的变化。但华文教育所以有今天小康局面，全赖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文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的自强不息。华文教育工作者早已习惯在逆境中奋发前进。其实，乐观地说，在新的区域与国际气候下，华文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佳境。马来西亚政府的立场目前确实依然如故，但正因为如此，华文教育工作者，更应把握每一个有利华文教育发展的机会。

严格地说，董教总这十余年来未能将国际间的有利条件转化成为国内的突围动力，除了官方的高压，多少也跟国内华文教育工作者“被动捍卫”的性格有莫大关系。事实上，马来社会学习华文的热潮，无论是在华小的华人母语教育体系，或国小的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华文班，都是源自民间需要，未必是政府处心积虑的安排。当然，董教总应该注意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但若处理得当，则可能有利华文教育的发展，董教总应该顺势而为，将这股热潮转化成为自己的筹码。但在官方的高压下，华人社会早已丧失“主动促成”的特质。被动捍卫，而非主动促成的作风，导致董教总在与当权者交手时节节败退，1950、60年代林连玉还能与阿都拉曼、陈祯禄平起平坐，直接对话。今天董教总却只能与校长职工会一般见识，真正的对手却置身事外隔岸观火。

当然，累积五十余年经验的董教总倒也不是完全不懂得本身的优势，新近提出的欲进一步加强东南亚华文教育工作者的联系，以及推动国内，甚至区域内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可以看出董教总合纵连横的决心。中国正积极推动世界各地的华文教学，董教总无论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都占有地利之便，无论国情、人脉，皆能掌握，至于教学资源等，也有一定实力。在这样的基础上，董教总显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国际联系。另外，在马来西亚推动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计划，也可以让董教总在捍卫华人母语教育的原有任务之余，更有能力以清楚的思维与立场回应非华裔，尤其是马来人学习华文热潮，以及国民小学华文班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有助于董教总扩大其在国内的华文教育格局。

四、卷土重来：华人社团的危机和转机

华人社团在这五十年间最大的错误，显然是没有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认清自己的问题。大家说华人社团数量过多，华团中人也不否认，但华人社团依然每年增加，现在数目已经快近八千了。大家说华人社团应当整合，大刀阔斧，加强内部凝聚力，开拓更大格局，于是整合工作做了不少，但还是整而不合，新的山头林林“总总”的，视野似乎更大了，但格局却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社团逐渐失去华人的支持，华人要的是能够掌握议题，而不是形式的华人社团，董教总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这里。1980年代，董教总、雪华堂等十五华团破天荒以民权方式争取民族权益，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这次的“民权起义”，¹⁴ 不但为华人社会指出一条出路，还给一直不能成其气候的马来西亚民权运动，写下精彩的一章。¹⁵ 可惜的是，这样的视野和格局在1987年茅草行动后一去不复返。今天华人社团视政治为禁忌，经常搬出“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教条思维，作为不愿意多碰触政治的护身符。

当然，华人社团可以不碰政治，但它在其它领域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华人社团长期以来以中华文化守护者自居，但较有创意的文化活动，都由报社包办了。报社办的文学奖、讲座，星光熠熠，一呼百应，华人社团只能望尘莫及。华人社团最值得称道的大概是文化节，但像文化节这类劳民伤财的大型活动，华人社团又能够吸引多少人的参与？社会大众对这类活动没有多大回响，这类活动对社会大众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仅文化活动，报社现在连教育工作也可以独力扛在肩上，董教

总最近才谈东南亚华文第二语言教学的工作，但星洲日报的自愿教师到柬埔寨教导华文，已经进行好几年了。至于国际视野，新近倒有留台同学会和留华同学会不小心碰触两岸敏感关系一例可举。这些例子清楚说明华人社团所处的窘境。长此下去，人心怎么可能归向华人社团？

华人社团对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毫无自觉，但一般上只是高谈阔论。华人社团，何去何从这类的座谈会，时有所闻。当然，在不同的时候，华团中人会在题目加上不同的重点。这几年最常见的是二十一世纪这样的字眼。仿佛华人社团的历史契机还在眼前，一直没有过去，华人社团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什么选择似的。事实上，华人社团最大的危机，也许就是从来没有为本身的未来做出选择。五十年前是如此，现在看来也是如此。

五十年前华团中人肯定错过了重要的历史契机，才造成今天华人社团的落魄与飘零，但正如本文开篇提及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的崛起，这些都可能是华人社团改变命运的机会。其中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必定会对全世界华人起着重大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若能凭靠其历史渊源，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开拓其国际角色，当有可为。当然，这也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同一区域的东南亚国家华人的互动。董教总的目光已经转到这些地区，事实上，除了华人历史渊源，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总体经历，非常类似，华人社团若在这些地区有所贡献和作为，不仅可以打开国际视野，还可能有望突破国内的困局。

不过，华人社团必须紧记五十年来的教训，从本土到国际间的结盟和合作，一定要有实质意义，整合应该是指资源，不是形式。事实证明不一定是形式上整合得最高的团体，才可以有所表现。十五华团解散之后，各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华总，并没有与董教总结盟，但董教总依然一枝独秀。1999年诉求事件，足于说明一切。董教总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又岂止是一个维护华文教育的团体而已。再看看雪隆海南会馆和它的天后宫，终年络绎不绝的人潮，说明了什么？最主要还是人心归向，人心归向，则小兵变大将。

最后要说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极有可能是华人社团的转机。虽然到目前为止，环顾数量近八千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具备实力铺建

全球化格局者，没有几个。全球化的帽子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而言，肯定太大了。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全球化若能心向往之，绝对是好事。这样的思考也许可以名之曰“时势造英雄”模式，期望凭藉国内外新形势呼唤华人社团的英雄再现。我们盼望，华团中人对新事物能有所学习与吸收，掌握新的思潮，使用新的概念，以重新审视华人社团的价值，为华人社团寻找新的发展路向。

注释：

- 1 “南洋客属总会”成立于 1929 年，“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则成立于 1934 年，是新马华人最早的乡团联合会。见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收入林水樟、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 3 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362。
- 2 见郑萃梓主编：《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1984），页 98–99 和 120–122。
- 3 《南洋商报》，1983 年 3 月 8 日。
- 4 雪华堂曾被形容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圣地”，见《中国报》，2000 年 8 月 19 日。有关雪华堂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佼佼者的论述，可见郑良树：〈论中华大会堂五十二年来的贡献〉，《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页 121–133；莫顺宗：〈华团新典范的建立：李延年、邱祥炽、张景良领导下的雪华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八十周年堂庆纪念特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2004），页 195–201。
- 5 莫顺宗：〈铁屋里的呐喊：论 1970 与 80 年代的四个华团大会〉，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307。
- 6 有关雪隆潮州会馆的研究，可见莫顺宗：〈社会变迁中的雪隆潮州会馆：历史、奋斗与成就〉，《新纪元学院学报》（加影：新纪元学院），第 2 期，2005 年 4 月，页 99–115。
- 7 《南洋商报》，2002 年 7 月 9 日。
- 8 《南洋商报》，2002 年 1 月 6 日。
- 9 例如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 条 (2) 有这样的规定，“教育部长于适当时期可下令将国民型小学（即华文、淡米尔文小学等）改为国民小学”。

- 10 林连玉死后被称“族魂”他早在独立建国前的 1952 年，即已促使华校教师总会编纂适合本地华校使用的教科书，以取代中国入口的教科书，因为这可使新一代对这片土地产生更浓厚的感情，但于此同时，林连玉坚持华人必须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并以华人自豪。由此可见，所谓华文教育者，一直都在本土化和民族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何国忠：〈林连玉：为族群招魂〉，《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页 70。
- 11 以专为马来人与其他原住民，尤其是马来人而设的玛拉工艺大学（前身为玛拉工艺学院，1999 年升格大学）为例，早于 1968 年即为其学生开办华文课程。而当华文近年来地位提高后，这些课程越来越受欢迎。根据《星洲日报》分别于 1983 年与 1991 年对该校学生选读华文的两次报道，显示学生人数，于相差八年之间，已从九百名增加至逾三千名。十年后的今天，人数更是倍增，据该校中文部主任苏伟妮于 2001 年 9 月向笔者透露，选修华文的学生估计将近六千名。大专学府开设外语课程，本来是寻常事；但选修人数如此庞大，显然可以证明学习华文的热潮已经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圈子里形成。
- 12 关于马来西亚非华裔学习华文，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其实早已有之，并非始于近年。一直以来，在极度不利华文教育发展的环境中，有一小部分非华人却认为通晓华文具有与华人经商、文化交流等好处，因此积极学习华文，有者甚至将子女送往华文学校，特别是华文小学就读。以 1971 年为例，当年在西马华文小学就读的学生总数为四十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其中华裔学生人数为四十万九千九百八十人，马来学生二千五百三十人，印度学生五百二十二人，其他种族学生二百三十八人。以上数字显示，该年华文小学，非华裔学生总人数共为三千二百九十人，不过这个数目仅占该年西马华文小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而已。由此可见，到华校求学的非华裔毕竟只属极少数。而且这些非华裔学生有一些可能还是因为居住在某所华文小学附近，为了方便缘故，才作此选择。实际上，直至最近十余年，非华裔学习华文才渐见潮流。以华文小学为例，非华裔学生逐年增加，1989 年非华裔学生在全国华文小学学生的比率为百分之三点零四八，但此后人数与比率逐年上升，到了 1998 八年占华文小学学生的百分之八点六五七。至于 1999 至今的华文小学非华裔生确实人数，尚未见教育部或其他有关单位的公布，但依照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非华裔学生的人数与比率应该是继续上扬的。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于 1999 年 6 月提呈给首相的教育备忘录中，就提及华文小学非华裔学生于 1999 年已达六万五千人。2002 年初，教育部也证实华文小学非华裔生已经达到六万人，并且指出其中两万四千个学生是马来子弟。这些数字与 1998 年的五万二千零四十三人相比，又增加了将近一万人。若此二数字属实，那么从 1999 年起，华文小学非华裔学生的比率很可能已经超过百分之十。
- 13 《星洲日报》，2002 年 3 月 14 日。
- 14 潘永强、魏月萍主编：《华人政治思潮》(吉隆坡：大将，2003 年)，页 96-97。

- 15 柯嘉逊于其讨论马来西亚民权运动的著作中，大篇幅论述了这次民权奋斗，说明了华人社团在这方面的贡献，见 Kua Kia Soong: *The Malaysi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2005)。

中马关系及互动

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

张大勇、姚晓静

一 历史回顾

马来西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海外华人聚居的重要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有着长期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国古籍中记载或者提到马来亚的就有很多，其中著名的包括：

- 《吴时外国传》(康泰，三国时期)
- 《后汉书·西南夷传》(范晔，南朝宋)
- 《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唐)
- 《岭外代答》(周去非，宋)
- 《诸蕃志》(赵汝适，宋)
- 《岛夷志略》(汪大渊，元)
- 《星槎胜览》(费信，明)
- 《瀛涯胜览》(马欢，明)
- 《东西洋考》(张燮，1617)
- 《海岛逸志》(王大海，1806)

《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顾海，厦门大学历史系)提到约 50 种中国古籍，大部分都有提及马来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列强所打开，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

政策，开始面对世界。这时候，除了向列强学习以外，最先看到的，就是包括马来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图书，主要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书1894年编成，收集了不少到过东南亚的中国官员写的游记，也有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学者介绍东南亚情况的著作。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介绍已经非常详细。

《亚洲各国史》，1908年，北洋陆军编译局编译出版。

《亚洲各国史》，1909年，伍瑶光编译，广州粤东编译公司出版。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有重大进展的一段时期，而这段时期和暨南大学是分不开的。早在1918年3月，暨南大学就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国与南洋》的刊物；20年代之后，暨南大学开始有人专门做马来亚研究；1927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正式成立，开展东南亚研究，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有两大业绩，一是创办《南洋研究》和《南洋情报》这两个刊物，二是编纂《南洋丛书》(后称为《海外丛书》)，该丛书实际出版40余种，都是当年颇为引人瞩目的有关东南亚问题的专著，如刘士木等人的《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南洋各国史》(1935)以及《南洋史纲要》(1938)，陈宗白的《南洋华侨革命史略》、钱鹤的《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顾因明的《马来亚半岛土人的生活》，黄朝琴的《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等等。

20世纪4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历史研究之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突出。

在这段时期，东南亚历史成为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之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先后建立起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中山大学还率先开始招收东南亚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段时期出现两位权威人物，他们是姚楠先生，代表作《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和陈序经先生，代表作《东南亚史研究合集》。陈序经先生的合集(8册)中有很重要的专门针对马来亚古国的研究内容。

在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奠基性的成果，如华工出国史料、华侨华人投资国内企业情况等。

从50年代开始，有了专门从事马来亚研究的科研人员。比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何启拔先生，就专门从事马来亚华人移民研究，以及后来林伍(王光)先生，长期关注马来西亚情况，在马来西亚经济、政治方面拥有长期连续的资料数据。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马来西亚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机构增加了，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宽了，有关的学术刊物也多了起来。还建立了中国东南亚研究会。

在北京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和云南的社会科学院相继建立起研究东南亚的专门机构，有的单位不仅从事相关研究，而且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既出科研成果，也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培养后备人才。

这时候的研究领域已经不仅仅是东南亚历史和华侨华人史，变成为多学科的区域性问题研究。东盟的形成和发展，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包括美苏在东南亚的争夺和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等等，都是这段时间研究的热门课题。

这段时期出版的图书主要有：

- 英国人D.G.E.霍尔的《东南亚史》，由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翻译出版。
- 约翰·F·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战后东南亚史》翻译出版。
- 梁英明等编撰的《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余定邦的《东南亚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 梁志明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 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现状

(一) 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相关研究机构

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机构集中在北京、广州、厦门、南宁、昆明

等地。主要有：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

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其中从事“马来西亚研究”较多的机构主要有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和东南亚研究所，主要研究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语言、华侨华人和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和华侨华人研究所，主要从事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历史、华文教育和女性研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以中马关系、马来西亚经济、区域合作、华侨华人与族群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见长，如前所述，南洋研究院有学者专门长期关注马来西亚情况，收藏有丰富的信息资料。（有关这些研究机构的特色，详见庄国土教授提交的会议论文。）

2005年4月6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直属于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研究所。它是全方位研究马来西亚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以及培养马来西亚事务相关高级人才的学术机构。其主要研究方向是：马来西亚研究及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同时，马来西亚研究所也将承担让中国公众了解马来西亚、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关马来西亚信息的社会职能。研究所的科研和资料信息等资源将向全国“马来西亚研究”的专家学者开放。研究所近期目标是成为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研究”的中心，长远目标是成为国际上从事“马来西亚研究”的中心之一。

2005年4月5-8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在挂牌成立的同时，举办了“马来西亚与中马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日本、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涉及马来西亚经济、政治、安全、历史、华文教育和中马关系等多个领域，取得圆满成功。会议论文目录（部分）见附件一。

（二）、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成果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日渐活跃，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在继续关注原有的研究课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译著和论文，很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对“马来西亚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据统计，在中国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中国各学术期刊发表有关马来西亚研究论文统计

	合计	农业	医药卫生	文史哲	经济政治与法律	教育与社会科学	电子技术及信息
1990年以前	103	10	4	36	47	5	1
1991-2000	793	13	24	149	545	47	30
2001-2006.1	771	23	25	187	428	89	4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分类检索结果进行统计。

注：第一，合计数为实际发表论文数，个别论文涉及多个领域因而有重复统计现象；第二，经济政治与法律类中，基本上属于经济类，文史哲类中，基本上属于历史类；第三，并非在中国期刊网上发表的研究马来西亚的论文就是这么多，因为我在搜索过程中设定的条件比较苛刻，导致很多部分或者间接涉及马来西亚研究的论文没有被统计进来。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0年以前，几十年加起来总共才不过100多篇，上世纪90年代仅十年的时间里就有接近800篇论文，而本世纪初仅仅5年时间再有接近800篇论文发表。反映出中国学者对马来西亚研究

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再看研究领域分类。以 2001–2006.1 为例，总共 771 篇文章，经过我们认真筛选，剔除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简单介绍性文章后，只剩下 175 篇。对这 175 篇论文进行分析观察，发现如下特点：(1) 以经济和政治为主。其中经济类 78 篇占 44.6%，政治类 28 篇占 16%，华人与华文教育问题 31 篇占 17.7%。

同期中国各重要报纸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和报道频率也非常高，请看下表：

中国各重要报纸发表有关马来西亚文章统计

	文史哲	政治军事与法律	经济	教育与社会	科学技术	恋爱婚姻家庭健康	合计
2000–2006.1	90	205	941	85	53	5	1379
占总数%	6.5	14.9	68.2	6.2%	3.8%	0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分类检索结果进行统计

由于报纸的时效性更强，因而经济类文章所占比重达到了 68%，不过从总的学科比例来看，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学科比例比较相符。

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专著译著见附件二(21 册)。

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见附件三。

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在中国各主要期刊发表的论文见附件四(2001–2006.1，175 篇)(略)

(三) 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特点

与中国以往的“马来西亚研究”相比，近 20 年来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拓宽了研究领域。在继续注重研究马来西亚历史、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加强了对中马关系、地区安全、区域合作、马来西亚现代化、族群关系、政党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等前沿问题的研究。

- 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 杨仁飞：〈平等政治权益：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族的追求〉，《东南学术》，2003，(2)。
- 张云：〈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东南亚研究》，2001，(2)。
- 郭清水：〈反恐对马来西亚政局与对外关系的影响〉，《当代亚太》，2003，(1)。
- 许梅：〈制约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政治发展的种族政治因素〉，《世界民族》，2003，(1)。
- 赵海立：〈中马关系及其前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思考〉，《南洋问题研究》，2005，(3)。

2、增加了获取研究信息的渠道。建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学者主要通过数量有限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报纸来了解当地信息，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由于缺乏到马来西亚实地研究的条件，难以获得精确的计量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等都。因此，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成果较多的是宏观研究和定性研究，微观的定量分析成果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和合作的迅速扩大，研究经费和研究条件不断改善，信息渠道不断拓宽。比如订阅马来西亚报刊、杂志数量的增加，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等。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从网上获取资料以及进行学术交流也日益成为主要的研究渠道之一。

据我们所知参加本次会议的很多学者都不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有些学者甚至已经来过多次。

3、改进了研究方法，出现了多学科研究马来西亚问题的新格局，当然这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是有关的。既有传统的历史考证，也注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经济学中的计量分析。

4、关注和研究马来西亚的学者日益增多，马来西亚研究领域的青年研究队伍正在崛起。这批青年学者共同的特点是外语水平好，思维方式多元化，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一部分年轻学者正在学习马来语，以充分利用当地语言来认识和研究马来西亚。

(四) 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遗憾

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出现很多新的特点，但是我们也发现其中很多令人遗憾的不足之处。

1、前面说到，中国“马来西亚研究”的学科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宽。但从总体上看，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特别是族群关系、政党政治这样的前沿学科，我们搜遍所有刊物，找到的论文屈指可数。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一是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单一。这样的学科往往都是交叉学科，需要研究人员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和对学术前沿敏锐的观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很多学者仅仅做到单个领域内的专家已经不易。二是资料获取不易。虽然现在信息渠道变宽，政府资金支持力度也大大加强，但是仍然有很多学者，特别是该领域的后来者不能很好地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资料。三是学术界大量存在的浮躁情绪，导致很多研究人员把精力浪费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去学习和了解有关领域最新最全面的进展。

2、刚才我们列出了 22 种图书，简单统计一下，其中有 9 种属于马来西亚历史或者经济发展史方面，6 种属于介绍性甚至个别是介绍马来西亚旅游的，另外 7 种分别关于：文化、技术进步、音乐、语言、政治、族群关系、企业集团各 1 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一直以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为主，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出现 9 种历史方面图书可以理解，但是 6 种介绍性图书当中除个别情况外，具有多少学术价值，不言自明。

3、再来看上述 175 篇论文，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特点，即同质性十分严重，换言之就是过分追求论文数量，简单重复劳动的现象十分严重，水分很大。

4、结合被剔除的 596 篇论文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介绍性文章非常多，告诉读者怎么样到马来西亚做生意，马来西亚哪些地方比较好玩等等。二是非常多文章与其说是论文，更象是即时性的新闻评论。我们认为这两个特点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实用性，缺乏甚至根本没有理论框架。

5、主观臆造倾向。如果我们有兴趣多研读一些论文，就会发现，某些论文并非产生于对实际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而是作者脑子里偶然产

生了某个结论或者想法，然后就开始搜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而结果总是能令人满意。

三 结语

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族群关系、国际关系方面，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认真研究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在社会的需要面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完善，相信中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将会不断进步。但是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很可能会出现少数学术带头人有个别领域前高歌猛进，一部分人跟在后边有样学样，再一部分人改行做新闻报道这样的局面，很难实现全面整体的进步。

附件一

“马来西亚与中马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年 4 月 5—8 日，厦门）论文目录（部分）：

- Liao shaolian, *Sino-Malaysian Economic Relation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 Mohd Kamarulnizam Abdullah, *Piracy and Security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 Hal Hill, *Malay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 Blusse van Oud-Alblas, *Piracy and Changes of Regime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1780—1830*;
- Vivienne Wee & Tiong Chong Wong, *Positioning Strategies of Malaysians in Johor Baru vis-à-vis Singapore*;
- Tham Siew-Yean,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 Rujhan Mustafa,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 Malaysian Perspective*';
- Hung-ting Ku, *Chinese Secondary Education On the Ev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 Shee Poon Kim, *Malaysia's Policies Toward China: from Non-recognition to Rapproche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ZHAI Kun, *Soft Power: the New Cooperation Dimension in Sino-Malaysia Relation*;
- Han Feng, *The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nd Its Background*;
- Rommel Capudoy Banlaoim, *Security Aspects of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 Philippine Perspective*.

附件二

中国出版有关马来西亚研究学术著作(不完全统计):

- 孔远志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 韩方明著:《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吴小安(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 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
- 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高伟浓著:《更变千年如走马: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眼中的“黄金半岛”》,(马来西亚:学林书局,1995);
- 林远辉、张应龙编著:《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 廖小健著:《世纪之交的马来西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钱文宝、林伍光著:《马来西亚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李毅著:《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古鸿廷著:《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日)原不二夫编,刘晓民译:《马来西亚企业集团的形成与改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其他研究人员出版的相关著作还有:

- 李家禄、严琪玉著:《马来西亚》(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 刘必权著:《马来西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 陈晓律等著:《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罗艺峰、钟瑜著:《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华南与马来民族音乐考察及比较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 毛策著:《郑良树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陈晓锦著:《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英)内尔·威尔森著;王向宁,郭庆译:《马来西亚》(北京:中华书局,2002);
- 周伟民,唐玲玲著:《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 朱振明主编:《当代马来西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附件三

中国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完全统计):

- 北京大学:
- 庄礼伟: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1992年)。
- 王朋: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马来西亚解决种族问题的经验与启示》(1998年)。
- 章芹:国际关系学院,硕士论文《中马友好关系全面发展探源》(1999年)。
- 龚兵:历史系,硕士论文《论农业发展在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1996年)。
- 韩方明:历史系,博士论文《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2001年)。
- 王虹:东语系,硕士论文《试论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02年)。
- 宋艳蕊:东语系,硕士论文《移植、冲突、融合——宪政文化在殖民时代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02年)。

中山大学:

- 周益群: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战后西马华人经济研究(1957–1970)》(1988年)。

李 孜：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参政探讨》(1989年)。

苏健璇：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战后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关系研究》(1989年)。

孟人杰：东南亚研究所，硕士论文《“冷战”后马来西亚对交政策的变化：与五十、六十年代外交政策的比较》(1997年)。

岳志海：经济学院，硕士论文《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产品竞争力影响的比较研究》(1999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邓建新：硕士论文《试论西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性质》(1985年)。

李以峰：硕士论文《马华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1990年)。

陈 昕：硕士论文《马来西亚的贫困与反贫困》(1999年)。

潘少红：硕士论文《两种歧见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00年)。

邓建光：硕士论文《二战前新、马华商及其经贸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变化》(2001年)。

丁雪峰：硕士论文《新、马电信业的开放及其借鉴》(2002年)。

唐钰琳：硕士论文《马来西亚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及其借鉴》(2002年)。

刘才涌：硕士论文《马来西亚纳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研究》(2004年)。

李 毅：博士论文《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2003年)。

杨仁飞：博士论文《无邦交时期的中马关系》(2005年)。

曾金蒂：硕士论文《金融国际化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改革与重组》，厦门大学(2002年)。

赵 洪：博士论文《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厦门大学(2004年)

其他院校：

颜泉发：博士论文《分流与整合》，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

刘建彪：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及其对中马关系的影响》，暨南大学(2000年)。

黄慧诚：硕士论文《九十年代中马关系的发展与马来西亚华人》，暨南大学(2000年)。

费昭珣：硕士论文《马华公会：对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个案分析》，暨南大学(2000年)。

颜泉发：硕士论文《分流与整合》，暨南大学(2002年)。

张法春：硕士论文《An Asian Perspective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电子科技大学(2002年)。

袁慧芳：硕士论文《平等与民主》，暨南大学(2002年)。

郑志锋：硕士论文《砂拉越华人政治演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

王静怡：博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

石沧金：博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暨南大学(2003年)。

杨松芳：硕士论文《英语本土化现象与实质实证研究》，广西大学(2004年)。

肖方峰：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

汪 波：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暨南大学(2004年)。

戴小峰：硕士论文《伊斯兰复兴及其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暨南大学(2004年)。

孙雨嘉：硕士论文《马来西亚政治中的伊斯兰因素探析》(2004年)。

丁来强：硕士论文《论马来西亚工业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山东师范大学(2000年)。

“亲中反美”到“中美并重” ：“九一一”后马来西亚与中国 的双边关系剖析

林若雪、曲大威

一、前言

“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这是最近时常出现於传播媒体的广告台词；某国际货运公司亦打出送货至马来西亚仅需三天的宣传广告。从上述两则商业广告来看，马来西亚似已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其经济、观光，甚至文化层面皆显着蓬勃发展。在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常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但也有一些国家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本国发展的好机会，马来西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¹ 在政治方面，执政长达 22 年的政治强人马哈迪 (Mahathir Mohamad) 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引退，第五任首相巴达威 (Abdullah Badawi) 上台，马来西亚不但没有如其他国家更换领导人时经常出现动荡局面，² 反而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带来新气象。³ 巴达威的个性温和，执政风格迥异於强硬派作风的马哈迪，外界多认为曾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的巴达威上台后，未来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将会呈现不同之面貌。

中国—这个政经实力不断提升，军事能力不断扩张的区域强国，向来是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重点国家。近几年，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更是在中国崛起后有爆炸性的进展。最显着的例子是，2003 年巴达威访问中国时宣称，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已经超越新加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夥伴国。⁴ 另外，为因应世界反恐之潮流，双方亦展开新的安全合作，如双方於 2005 年签署的“马中防御合作备忘录”。“九一

一”事件后，2003年马来西亚领导人更迭，中国政经势力崛起，马来西亚与中国间的关系已不同于以往，值得深入探讨与关注。

本文以“九一一”事件为切割点，探讨“九一一”事件后，马中双边关系之发展。本文首先概述马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历史；其次，讨论“九一一”事件后的双边政治、经贸与社会关系；再者，分析影响双边关系的美国因素；最后，则是从内外环境探讨双边关系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论点是，虽然马哈迪时期，马来西亚外交立场明显倾向中国，然在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反恐第二战场后，马来西亚已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之一，巴达威的反美情绪不似马哈迪强烈，且马来西亚境内亦有恐怖主义问题待解决，预料马来西亚外交政策将由“亲中反美”转为“中美并重”。

加诸，2005年“东亚高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召开后，形势发展显示中国仍是东亚的经贸中心，⁵为保障能于东亚整合中取得利益与优势，马来西亚会持续加强与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

二、马中双边关系的回顾

一、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与作为

东协组织於冷战期间，曾被中国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马来西亚前首相拉萨(Tun Abdul Razak)与马哈迪，采取有利於国家利益的弹性外交政策；两人都有过人器识，行政风格迥异於其他东协成员国，是相当具有远见与前瞻性作为的国家领导人。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首相拉萨前往中国会晤国家主席毛泽东，双方针对区域与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更重要的是，双方宣布正式建交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建交公报主旨为，虽然中国与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然双方应相互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与平等互利等。另外，马来西亚亦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中国政府，且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⁶

尽管当时双方已正式建交，马来西亚基於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之考量，并未积极发展与中国之关系。另外，中国不愿放弃支持东南亚共产党进行军事行动以夺取政权的行为，亦是马中关系无法全面发展的主因。⁷严格来说，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仍视中国是具有威胁性的国家。

直到邓小平上台后，采取门户开放政策，积极三与国际组织，提倡国际制度的建立，并於1988年至1994年一口气与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马来西亚才不再将中国视为威胁，马中关系亦在此时步上正常轨道。与此同时，马哈迪主张积极与中国接触，并呼吁亚洲在国际事务中应扮演更重要角色，都使马来西亚体会到加强与扩展马中关系的重要性。⁸

二、马哈迪的“反美亲中”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是首位敢公开与西方世界领导人较劲的东协领导人，EAEC当时虽有中国的支持，但日本与韩国不敢公开表示同意；然则，EAEC事实上已依另一种方式呈现其目标，1997年开启的“东协加三”，即是某种方式的“东亚主义”。

马哈迪敢於向西方与美国说不(Say “No” to the West and US)，但马来西亚实际是采行灵活弹性的外交手腕。马来西亚於1980、1990年代对西方将“人权民主”凌驾於国家发展的观念，表示不能同意；相同地，马哈迪对于国内的基本教义派回教组织，也是不假辞色，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的连接影响，采取“务实外交”方针的马哈迪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应予以革除，而且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数目应加强。⁹简而言之，在全球化过程中，马来西亚的外交是与时日转，并非一成不变。1996年马哈迪於访问北京便曾公开驳斥“中国威胁论”¹⁰，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亚洲军事或政治上的威胁，且中国的繁荣将有助于东南亚的经济成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爆发后，马哈迪肯定中共不让人民币贬值之贡献，并大力提倡成立“东协自由贸易区”与“湄公河流域经济开发合作计划”。

马来西亚身处东协区域组织内，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她不能避免取代印尼成为东协组织老大的趋势。马来西亚也是东协国家中，第一个主

张降低“中国威胁论”，马哈迪将中国视为是“机会而非威胁”¹¹，马来西亚并且於 2002 年到 2003 年间，取代新加坡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贸易夥伴。¹²

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马哈迪就曾公开驳斥“中国威胁论”。1993 年 6 月马哈迪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其会面时表示：“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是防御性的，世界将会看到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那些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要填补真空’论调的人，实际上是在挑拨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现在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正在发展军备是为了对付其邻国，我们认为他们散布这种论调是出於私利。因此，马来西亚并不赞成‘中国威胁论’。”¹³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马来西亚的亲中立场更加明显。马哈迪认为金融危机发生是因为美国不满东协於 1997 年不顾美国的反对接纳缅甸，美国并利用国际金融家索罗斯 (George Soros) 惩罚东南亚。¹⁴ 此外，1998 年马哈迪以贪污腐败、不正当性行为等十项罪名逮捕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Anwar Ibrahim) 后，美国遂将双边正式访问降为非正式访问，且宣布美国於该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后，不与马哈迪举行双边会谈，当时美国副总统高爾 (Al Gore) 甚至於马来西亚三加会议的场合公开支持安华，并批评马来西亚执政当局的不是。前述美国的种种作为，都令马哈迪相当反感。不同於美国的态度，中国当局不但没有公开批评“安华事件”，反而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绝对遵守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中国的举动等於是间接支持马哈迪。¹⁵ 简言之，美国在马来西亚遇到困境时落井下石，中国却於此时拉马来西亚一把，马哈迪外交政策的倾向当然是“亲中反美”。

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马哈迪对中国的好感倍增，马来西亚更关注於中国，包括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建议中国成为东协对话夥伴国的国家；马来西亚亦是推动“东协—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推手；直至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更是持续与中国热烈往来，不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的东协国家之一。加诸近年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经济发展成效显著，¹⁶ 马哈迪重视中国的程度自然不在话下。一言以蔽之，马中双边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冷淡至后冷战时期已相当热络且友好。

三、“九一一”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九一一”事件后，马中双边贸易额达到 143 亿美元，与 2001 年的 94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 51.3%。马来西亚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夥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达 50 亿美元，与 2001 年 32 亿美元相比，成长了 54.5%，马来西亚成为中国的第十大出口国。民间方面，2002 年约有 56 万中国旅客前往马来西亚观光，50 万马来西亚人前往中国旅游。目前，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人最多，约一万人，亦有约 800 名马来西亚学生前往中国大学进修。¹⁷ 2003 年 SARS 四虐期间，东南亚部份国家认为中国隐瞒疫情，出现批评中国官方的言论，马来西亚政府却表示，不会就疫情问题对中国提出抗议。¹⁸

2003 年 9 月担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巴达威率团访问中国，马中两国政府签署有关农业、航空、遥控探测、引进劳工及旅游等方面的五份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马中两国企业亦签署十多项联营投资意向书。巴达威就向媒体表示，接任首相后，会延续与中国友好与密切的关系，加强与中国在贸易、投资、农业、旅游、科学、国防等领域之合作，并期望双边贸易额能从 2002 年的 140 亿美元提高到 2004 年的 200 亿美元。¹⁹ 巴达威接任首相职务后，中国顺理成章成为巴达威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非东协国家，此次访问中，双方又签署多达 38 项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访问成果是前所未见的。²⁰

在两国经济力量的强弱更迭，马中两国间有竞争亦有合作；近十年来，马来西亚在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已渐渐被中国的低薪策略所削弱。但马来西亚同时亦成功推动了很多工业部门朝高增值、高科技密集型制造业转型。近年来，吉隆坡加大对科技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同时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以培养更多的技师和工程师。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巴达威 (Abdullah Badawi) 2006 年於一次讲话中指出：“如果不改变第三世界的思维，即使拥有第一世界的基建硬体也不会达到期望的结果。”²¹

马来西亚经济的相对成功，为“富创意国家经济干预政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例证。一直以来，外界常批评吉隆坡政府与工业界有太多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亦是阿都拉誓言要打破的。不过，

马来西亚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总体经济的繁荣，确与政府过去一直强调维持国有企业全球竞争力，有密切关系。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马来西亚的服务业供应商，开始进军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建筑、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行业更被工商贸易部长拉菲达 (Datuk Seri Rafidah Aziz) 锁定为重点进军中国市场的领域。在中国，在一些废水处理、自来水供应系统以及城市天然气输送专案的投标活动中，都能看到马来西亚公司的身影。²² 此外，马来西亚还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合作，为中国学生提供留学深造、攻读学位的机会。

许多马来西亚公司也凭着在电子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开拓业务。该国首屈一指的半导体晶片制造厂，马来西亚矽佳公司 (Silterra Malaysia) 开拓与中国新兴晶片商的合作。该厂不仅在高压、复合信号及射频信号的半导体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公司管理也尤其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²³

马来西亚最为成功及最广为人知的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最近，现任国油顾问的前首相马哈迪公布了该公司的运营情况：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的盈利创下了 220 亿美元的新高。由於油气价格居高不下，国油得以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并获得了向中国供应能源的合同。在第 9 个五年计划当中，吉隆玻提出要对多种科技型产业进行再升级，相信国油的部分收益将被用於这方面。

马来西亚持续的经济成功，很依赖於政治稳定。马来西亚的安全政策以及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一直备受分析家和投资者关注。尽管印尼和泰国都先后遭到回教激进组织的袭击，但吉隆坡大体上仍未受到影响，没有外资撤退的问题。

200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吉隆坡与巴达威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两国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并订定一个五年计划，加强以下领域之合作：第一，保持高阶层交往，进一步增进了解与信任；第二，制定“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对各领域合作提出具体计划；第三，继续扩大双边贸易，推动能源合作，并讨论南海资源之开发；第四，密切在东亚合作过程中配合，持续推动东亚合作。²⁴ 此次会

晤最重要的是双方再一次确认 1974 年“建交公报”之原则，即中国希望巴达威政府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马来西亚希望中国不干预马来西亚内政并尊重其主权。

2006 年 3 月 29 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前往马来西亚与首相巴达威进行会谈，双方表示愿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巴达威再一次重申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此次会谈较令人瞩目的是贾庆林对未来中马关系的发展提出几项建议：在政治方面，加强双方高层交往，才能加深政治互信与增进了解；在经贸方面，希望两国贸易额在 2010 年之前突破 500 亿美元；在能源方面，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之原则，使南海成为中马能源合作的纽带。²⁵

在军事合作方面，2005 年 9 月马来西亚副首相纳吉 (Najib Tun Razak) 与中国国防部长兼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签署“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提供双边防御合作的活动架构，包括军事训练、军事人员交流及互访、交换情报及加强军事对话，了解双方对区域及安全课题的观点。纳吉认为“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马来西亚国防政策之利益且为两国建交 31 年掀开新的一页，未来双方将可以此备忘录为基础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合作。²⁶

在社会方面，近期频频出现马来西亚员警拘禁与虐待中国籍女子的传闻，引起双边关系紧张，此时，马来西亚副国安部长竟说出“如果外国人认为马来西亚员警残暴，那请他滚回去，不要留在这里”的尖锐字眼，此言一出，更引起舆论猛烈抨击。首相巴达威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公开斥责此偏激言论并表示日后政府官员就此类议题发表评论时应该更加谨慎用词。另外，首相巴达威亦命令内政部长阿兹米前往北京访问时，须就马来西亚警方污辱华妇事件进行解释，为的是重建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信心。²⁷

回顾“九一一”事件后马来西亚的外交处境，因不满美国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马哈迪强烈抨击美国，致使双边关系降到冰点；²⁸ 马哈迪亦不满澳洲於“峇里岛爆炸案”后采取“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s) 的反恐政策，马哈迪扬言要终止与澳洲的反恐合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供水问题、白礁岛主权争议与填海问题亦於此时再度浮上台面。唯独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且友好，为什么马中之间仍能保

持良好关系呢？以下本文将探讨并解释马中关系稳定的原因。

四、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

一、美国因素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重挫美国世界盟主的地位，尽管美国企图以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挽回颓势，然其霸道的作为仍让部分国家不认同美国，致使美国国际声望大幅滑落。此时，中国却以相当快的速度成长，似有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霸权的可能，虽然如此断言仍有待商榷，不可否认的一点，中国确实已成为亚洲的中心国，甚至称之为区域强国并不为过。加诸中国拥有广大市场且近期又不断对东南亚国家释出善意，当前中国俨然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来源。因此，在巴达威准备接任首相时，就率团访问中国，并达成多项商业与经济协议，接任首相后不仅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往来，且更不只一次对外宣称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巴达威的作为无非是向中国表明，马来西亚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坚定的盟友，不会因为马来西亚政权交接而更改。

“九一一”事件后，回教徒睁大眼睛观察马来西亚如何与美国周旋，马来西亚如何处理其国内可能的“基地”问题。正如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虽遭致西方国家的大力挞伐，但也毫不留情地批评George Soros，马哈迪并指责其为一种“新殖民主义”形式的剥削，彰显Soros“偷窃”东方财富与西方白种人的优越性。然则，日后的IMF与世界银行报告均指出，马哈迪当时将零吉与美金汇兑固定的做法是“洞烛先机”之卓见。²⁹“九一一”后美国对於马来西亚不再动辄扣上“违反人权”的大帽子，美国并且於2002年5月邀请马哈迪首相赴华盛顿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布希与马哈迪仍有些小误会，但马哈迪得以於卸任前与华盛顿再续前缘，重修旧好，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九一一”之后过去四年间，马来西亚由马哈迪到继任的巴达威，对於中美间的双边关系，掌握仍然相当良好，曾任外交部长的巴达威，不卑不亢以马来西亚利益为重。主因“九一一”之后，美马对於反恐合

作，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美国也表示可以了解马来西亚对於有回教（伊斯兰）潜在恐怖份子的活动大力防止有其必要。美国不再对马来西亚批评其民主、人权，马来西亚也对美国维持礼仪和协，在在彰显务实的马来西亚外交政策，以及马来西亚欲取代印尼成为东协重要发言人与影响能力的决心。

同时，美马关系好转的重要原因，尚有小布希总统（George W. Bush）的“结盟与友好”（Allied and Friends）策略。两千年美国总统大选在争议下落幕，最后由共和党的布希总统胜选，并结束民主党的八年执政。2001年1月布希政府成立之后，华府与吉隆坡的关系仍然处于金融风暴后的低点，布希政府对於马来西亚持续以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逮捕马来西亚激进组织（Kumpulan Militant Malaysia, KMM）成员颇有意见，2001年2月国务院所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安华事件具有政治意图，也质疑马来西亚的司法独立与公正。

显而易见地，布希总统於九一一之后，改变了过去对东南亚较为冷漠的态度，不仅是小心翼翼地对待此区域的“穆斯林回教国”，同时想要东南亚国家协助美国反恐，美国特别注意与审视双边鸿沟与差异（Mind the Gaps）。³⁰实际上，这是有利美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的外交策略，有下列三大理由：第一，美国於九一一后，重新检视过去太忽略（特别是越战之后）东南亚的政策，合乎美国外交与安全利益；第二，若东南亚国家接受美国的想法，可以协助於东南亚盖达组织“基地”的安全防范；第三，藉由双方的安全管道，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双边的了解，可以弥补过去疏於来往而形成的鸿沟。³¹

首先，美国强调与友好的东南亚国家形成“结盟关系”；长期以来，美国与“老东协”成员国如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有关良好的关系，与马来西亚、印尼关系也不差。2003年5月，美国正式与新加坡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美国表明这是为了加强与东协的“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³²其中多少有“奖励”新加坡的意涵，希望其他东协成员国了解美国苦心，美国方考虑与之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其次，美国对於东南亚部分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九一一前并不表示关切。例如布希政府第一年，菲律宾内部爆发前任伊斯特拉达（Estrada）与现任艾洛育夫人（Gloria Macapagal-Arroyo）之争议，菲国内不

时绑架案迭起，曾有 20 人被 Abu Sayyaf 恐怖团体绑架，其中亦有美国人。在九一一之后，美国在印尼、越南、菲律宾都有新的作为。³³

当然，不是所有东南亚国家在任一议题都一定买美国的帐，因为基本上，东协各国仍存在基本差异，而东协对美国采取友好政策，也有下面看法：第一，美国一直将注意焦点集中於东北亚，对东南亚议题不完全了解；第二，东协各国對於中、美於本区域的权力平衡关系，也有不同看法；第三，东协期盼区域内新成员的差异，由美国透过与四国(越、缅、寮、柬)关系正常化来达成。

二、其他相关重要变数

另一方面，2005 年年底“东亚高峰会”顺利召开，大幅增加实现未来“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Community, EAC) 的机会，³⁴ 以中国目前的政经实力而言，绝对是未来东亚整合的重要大国之一；加诸 1990 年代，马哈迪就曾为了东亚整合力倡“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虽然提议未受重视，但受世界各地不断传出政经整合成功的消息所影响，對於整合，东亚各国也跃跃欲试。因此，“东亚经济集团”虽未成形，然其整合精神却延续至“东协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 以及“东亚高峰会”。未来马来西亚若欲继续於东亚整合中扮演推手，势必须获得中国方面的协助，因此，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必要的。2005 年温家宝与巴达威的会面、2006 年贾庆林与巴达威的会面，双方皆对未来东亚整合达成共识，很明显地，巴达威已经在进行这项政策。

为何华府在九一一事件后对马来西亚刮目相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在区域内的角色吃重。在东协内部，马来西亚向来都扮演领袖的角色，除了主导东协湄公河开发计划(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与东协的新加坡—昆明铁路计划(Singapore—Kunming Rail Link)外，马来西亚对越南、寮国、缅甸与柬埔寨等国提供教育与科技支援，同时马来西亚也是拥有五十七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 OIC) 的主席，2002 年 4 月，马哈迪特别於吉隆玻召开为期三天的 OIC 特别会议，会议中马哈迪强烈谴责恐怖主义，指出所有攻击无辜平民的行为都是恐怖行动，因此马哈迪也称以

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好战份子为恐怖分子。

此外，马来西亚也是亚太经合会议的三个伊斯兰国家之一。自从 1991 年马哈迪倡议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 后，EAEC 的概念已被“虚拟”成为 APEC 中的次级团体。马哈迪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 中角色吃重，也是代表第三世界对抗西方国家的指标性人物，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向来不低，是全世界二十个最全球化的国家之一。³⁵ 马来西亚對於参与国际事务不遗余力，马哈迪的策士 Razali Ismail 曾经与缅甸当局讨论释放翁山苏姬，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安任务。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马来西亚国内情势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尊重前辈向来是马来文化的特色，要巴达威违背马哈迪执行已久的亲中政策不容易，况且马哈迪虽然退位，但马哈迪在政坛打滚了三十年，担任马来西亚首相二十二年，巫统仍有许多马哈迪的亲信人马，巴达威若在短时间内改变马哈迪的亲中政策，势必会引起反弹，执行马哈迪的亲中政策，对刚上任的巴达威绝对是“政治正确”的选择。

然而，最近美国不断试图以政经合作拉拢马来西亚以对抗恐怖主义，加诸美国向来视崛起的中国是威胁，这不禁让人怀疑，马中关系仍能持续友好吗？另外，退休近三年的马哈迪近一(2006)年来不断批评巴达威政策，虽然巴达威尚未大力反击马哈迪，但这并无法证明巴达威是默默承受马哈迪批评的领导者，未来巴达威是否不再遵守马哈迪的亲中政策以反制马哈迪，值得外界深入观察？以下本文将从内外环境分析未来马中双边关系可能面临的挑战。

五、从内外环境看双边关系的未来挑战

诚如本文前段分析，崛起的中国为马来西亚带来可观利益，是马来西亚极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国际情势研判，近年美国对马来西亚实行的一连串政策，证明美国正积极拉拢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国内亦有恐怖主义问题待美国协助解决，新上任的巴达威，恐不会再继续公开反美。

受“九一一”事件影响，美国於全球推行反恐政策，东南亚地区拥有广大穆斯林信徒，且无人岛屿众多，恐怖份子多以此作为掩护，因此，除中东地区外，东南亚可说是美国反恐的另一重要战场，马来西亚又是东南亚中的伊斯兰大国，美国特别重视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似乎一点也不意外。美国副国务卿佐力克就在 2005 年“东协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会议上宣称“东南亚仍然是美国的重要夥伴，我们要把东协当成一个好夥伴，我们要让双方关系更上一层楼”³⁶。

另外，不只美国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信奉伊斯兰宗教的马来西亚亦曾多次被威胁将遭受恐怖攻击，境内恐怖份子的活动也相当活跃。如马来西亚六军前任上尉苏法特 (Yazid Sufaat) 为“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 成员，并曾协助宾拉登；峇里岛爆炸案后，马哈迪也宣布马来西亚可能会遭袭击，望国人多加留意；³⁷ 澳洲政府也曾向澳洲人民发出旅游警告，劝请国人不要前往马来西亚沙巴，以免遭受恐怖攻击。³⁸ 由此可知，马来西亚国内亦正面临恐怖主义某种程度的威胁。因此，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积极拉拢马来西亚反恐，正符合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基於此，马来西亚情报人员就积极提供美国恐怖份子的相关讯息，美国联邦调查局亦与马来西亚警方有密切合作，其甚至联手破获准备在马来西亚进行恐怖攻击的歹徒。³⁹ 2003 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亦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与援助。

一、马来西亚采取“大国平衡”的策略：与中、美来往频繁

虽然马来西亚仍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在安全战略上，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合作却多过与中国的互动，持平而论，美国已经成功地拉拢马来西亚。然而，因中国经济力量仍能提供马来西亚一定的利益，在东亚整合进程中，马来西亚亦须中国配合，预料马来西亚不会全然反美，也不会与中国疏远，日后的外交政策将是“中美并重”。

双边关系的另一项考验是台湾问题。巴达威上任后一直严守着“一个中国”原则，但也未放弃与台湾互动的机会。就在 SARS 发生后，台湾从旅游警示区除名，马来西亚为鼓励台湾民众前往马来西亚观光，推出一系列旅游活动，为台马两方的民间搭起互动桥梁。更重要的是，马

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马吉德 2003 年在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演讲时，当众宣称“马来西亚支持中国關於加强和提升中国与东协合作的建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们并不排除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⁴⁰ 由此可知，马来西亚亦相当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必须注意的是，未来若是马来西亚对台湾表现的过度友善，肯定会引发中国不满，届时双边关系必定受其影响，这项挑战不得忽略。

就内环境而言，马中关系的挑战是，巴达威是否会继续执行马哈迪“亲中反美”的外交政策。巴达威给人的印象无非是温文儒雅、饱读诗书，却也因巴达威个性慈善，不少媒体认为巴达威过于软弱及缺乏信心。马来西亚战略分析机构首席分析员黄永安就认为“马哈迪选择巴达威，便是因为他不是个改革型的领导人”。⁴¹

在了解巴达威上任的作为后，外界恐要重新评估巴达威。在准备接任首相时，巴达威抨击马来人思想中遗留着特权依赖的迂腐思想，这类三流思维，阻扰马来西亚挤进世界强国的努力，其甚至形容这些思想迂腐、作风官僚的人群是“丑陋的马来西亚人”，⁴² 很明显地，这与以往马哈迪尽力维护马来人利益的作为有很大的出入。其次，巴达威上任后的国会演说，即表明矢言维护民主，他说“我们相信民主是最佳的管理制度。我们必须坦然接受批评和接纳不同意见，以确保民主文化的兴盛”⁴³，这又与马哈迪一再反对西方民主价值的意识型态不同。再者，巴达威对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其中以释放安华的影响最大，一位国际法官就认为巴达威的举动已重新挽回马来西亚沉沦的司法。⁴⁴

从上述三例来看，巴达威与马哈迪最大的不同就是，巴达威比马哈迪更能接受西方民主价值，这对未来马中关系将是一项严励挑战。原因就在于，过去促使马中关系紧密除了经济因素外，有很大原因是两国国内人权记录皆不佳，为防止西方国家藉此干预内政，两国多一致批评西方国家不懂“亚洲价值”，更明确地说，马哈迪时期马来西亚与中国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国。然而，巴达威上任后，虽持续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却逐步发展出个人的执政风格，渐渐摆脱马哈迪的阴影，甚至中断先前马哈迪执行的各项政策，如取消“新柔大桥”的兴

建、交易国营“普腾”(Proton)汽车公司与释放安华等，未来巴达威是否会继续执行马哈迪“亲中”的外交政策，值得继续观察。从巴达威不排斥西方民主价值的行为来看，未来巴达威执政下的马中关系可能不如马哈迪时期亲密。

二、中国极力拉拢马来西亚及东协成员：与美国於东亚的权力竞赛

中国於2003年和东协签订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二者成为战略伙伴的关系，此条约是一个政治法律的基础，宗旨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双方关系一旦正式化、法律化，中国认为东协再无须担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学者还提到中国的发展带给他们的机会要大於威胁，近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领导人已在多次谈话中谈及所谓的“中国机会论”，而非“威胁论”，⁴⁵ 不过要彻底消除东亚地区“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还有待长期的实践和考验。

2004年巴达威访问中国，并订2004年为“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年”，双方除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關於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多个合作文件外，并发表联合公报。马方在公报中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双方都表示要充分利用两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巩固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⁴⁶，由此可知马中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持续往来尚佳的阶段。

不管是冷战或冷战后，中国始终认为现在与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是依赖几个大国间的权力平衡后才能达到，这至少是三角关系—美国、日本与中国(冷战时为美国、日本与苏联)，当前可视为五边关系—加上印度、俄罗斯，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宰此地区的安全。⁴⁷ 中国过去认为美国一再主导此地区的安全议题，甚至藉着与一些亚洲国家维持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来围堵中国，尤其是北边的日本与南边的澳洲对它威胁最大。像日本不断对台湾示好，美日安保联盟已将台湾纳入日本“周边有事”的范围内，澳洲也和印尼签订安全合作条约。日、澳两国又积极想加入东协组织，加上几个东协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等和美国军事合作或同盟，⁴⁸ 因此中国若在东南亚多边安全机制缺席的话，恐怕就会被排除在此东亚地区之外。

中国也认为美国与日本长期以来企图趁机插手南海的争端，例如几次在东协区域论坛及亚欧会议上，东协国家联合将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如再不采取对策，此问题一旦国际化，问题会更复杂棘手。⁴⁹ 所以中国不但要更加强调与东协合作，还要释出善意，例如2002年已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宣布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就是要弱化东协对中国的疑虑及加深双方的依存度，避免问题再扩大，使美国的围堵战略失效。

综上所述，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的竞赛将不会轻易停止，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角逐亚洲第一，未来中国与美国也将角逐全球与本地区“霸权”的角色。

六、结论

“九一一”事件后，马来西亚依其国家利益灵活行事。正如华项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所称，影响国家对外行为最深的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冷战结束后，中国挟着高度发展的经济与广大的市场，让世界各国与企业趋之若鹜，马来西亚亦是如此，因此，过去“亲中反美”的马哈迪在许多公开场合声明“中国是契机，不是危机”。然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国际俨然已成为美国为主的单极体系，纵使许多国家不满美国领导，迫於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之情形下，仍须与美国合作。马来西亚马哈迪首相即在此情形下，向美国靠拢。加诸国内政权於此时产生变化，当前马来西亚外交政策实属“中美并重”。

综上所述，吾人可推断未来影响马中关系的首要因素，依序应是美国对马来西亚实行的外交政策、东亚区域整合情势与马来西亚首相巴达威的外交政策。然而，近几年中美竞争渐趋白热化，马来西亚作为东协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势必是中美竞相拉拢的对象。马来西亚政府得以集中精力与中国发展“既合作亦竞争”的关系，同时维持其在日、美、

欧的旧市场。如果巴达威政府能够继续贯彻这种策略，那么马来西亚有机会成为亚太地区最受惠於中国崛起的国家之一。对马来西亚最实际的即是两手策略 (hedging)，从中、美两国分别获取符合本身的国家利益，因而马来西亚未来很可能成为美、中、马三边关系中最大的赢家。

注释：

- 1 Federico Bordonaro, 化竞争为机遇：马来西亚搭中国经济崛起便车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049>；亚洲时报线上
- 2 廖小健：〈2003年马来西亚的政经外交〉，《东南亚纵横》，2004年3月，页27。
- 3 巴达威接任首项职务时，马来西亚人多希望巴达威能改革马来西亚严重的贪污问题提高官僚工作效率。巴达威确实有些许成绩，包括大力反贪、反黑与反犯罪，呼吁公共部门与民间协助政府共同建立“零贪污”的政治文化；设置首座“反贪污学院”，成立国家公民道德学院，以及重开学校的公民班，签署联合国的反贪污公约。
- 4 N. Ganesan, "Malaysia in 2003: Leadership Transition with a Tall Shadow", *Asian Survey*, VOL. XLIV,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4, p.74
- 5 从东南亚国家协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协区域论坛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兴起的10+1和10+3等合作机制，再到2005年底首届东亚峰会的召开，东亚地区已经步入一个区域合作的新时代。
- 6 建交公报详系内容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default.htm>
- 7 达图·阿卜杜勒·马吉德：〈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亚太论坛》，第9期，2003年，页4。
- 8 达图·阿卜杜勒·马吉德：〈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2003年，页4。
- 9 *ibid*, p. 19
- 10 《亚洲周刊》，1996，“马哈迪反驳中国威胁论”，(10) 35: 6。
- 11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曾多次於公开演讲表明：“中国不是威胁，中国是机会”的看法。
- 12 Juo-yu Lin, 2005, "The East Asian Alternatives: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lated to AC FTA", *Tamkang Journal*, Vol. VII, No IV, April 2005, pp 26-48

- 13 实际上，马哈迪认为中国的军备更新可能会引发日本采行军备平衡政策，这才是引发紧张的根源。参见陈欣之：〈东协诸国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与回应〉，《问题与研究》，第35卷，第11期，1996年11月，页23、29。
- 14 金荣勇：〈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起因、影响与展望〉，《问题与研究》，第37卷，第1期，1998年1月，页5。
- 15 廖小健：〈安华事件之后的马来西亚外交〉，《东南亚研究》，No2, 1999, 页6。
- 16 1997年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东南亚国家时，中国保有8.8%与7.8%的经济增长率，且中国的出口率在过去20年间平均成长了17%。1988年至2001年间，中国外资投资率平均为23%，目前世界前五百大公司有80%已在中国设厂。参见 John Wong, "The Rise of China: Bane or Boon to Southeast Asia", *Harvard Asia Quarterly*, Spring 2003, Vol. VII, No. 2, p.23
- 17 达图·阿卜杜勒·马吉德：〈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2003年，页5。
- 18 廖小健：〈2003年马来西亚的政经外交〉，《东南亚纵横》，2004年3月，页28。
- 19 廖小健：〈2003年马来西亚的政经外交〉，页28。
- 20 廖小健：〈2004年的马来西亚：新政府新发展〉，《东南亚纵横》，2005年3月，页32。
- 21 Federico Bordonaro, “化竞争为机遇：马来西亚搭中国经济崛起便车”；“亚洲时报线上 Jul 04, 2006”;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049>
- 22 Federico Bordonaro, *ibid*
- 23 Federico Bordonaro, *ibid*
- 24 会谈详系内容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default.htm>
- 25 会谈详系内容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default.htm>
- 26 新加坡：《联合早报》，〈纳吉访问中国－马中签署防御合作备忘录〉，2005年9月3日，版十八。
- 27 大纪元网站：〈马来西亚部长访华，解释华妇受辱事件〉，<http://www.dajiyuan.com/b5/5/12/6/n1145149.htm>
- 28 Pamela Sodhy, "U.S.-Malays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Aspec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5, No. 3 (2003), p.366-367
- 29 *New Strait Times*, 16 April, 2003

- 30 Satu P. Limaye, 2004, "Minding the Gaps: The Bush Ministration and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6, no. 1 (2004): 73-79
- 31 *ibid*, pp.73
- 32 此情势下，布希政府除了加强与菲、泰、新的合作外，也与印尼恢复某些“有限制”的军事活动，*ibid*, pp.74
- 33 美国与泰国有“金色眼镜蛇”军事联合演习，与菲律宾长期合作，柬埔寨总理韩森曾指控美国怀疑 Bali Bombing 与该国内部恐怖集团有关。另外，美越关系的解冻，在九一一事件后，有较快速的迹象，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禁运，并协助越南加入联合国。
- 34 首届东亚高峰会 (East Asia Summit, EAS)，是由“东协加三”(东协十国加中日韩共 13 国)衍生而来，也是中国想积极主导的“东亚新区域主义”建制，未来首重东亚经贸合作，再及於安全、反恐等其他相关议题。参见林若雩：《评析中国於东亚高峰会之角色》2006。
- 35 马来西亚对于参与国际事务不遗余力，马哈迪的策士 Razali Ismail 曾经与缅甸当局讨论释放翁山苏姬，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安任务。
- 36 新加坡：《联合早报》，〈东南亚仍是美国重要夥伴〉，2005 年 7 月 29 日，版十三。
- 37 大纪元网站：〈马哈迪：马来西亚亦可能遭到恐怖攻击〉，<http://www.dajiyuan.com/b5/2/10/18/n236930.htm>
- 38 新加坡：《联合早报》，〈恐怖份子计划绑架外国人：澳警告国民不要前往沙巴〉，2005 年 6 月 24 日，版二十一。
- 39 Pamela Sodhy, "U.S.-Malays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Aspects", p.376-378
- 40 达图·阿卜杜勒·马吉德，2003 年，〈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页 6。
- 41 大纪元网站：〈人物介绍：大马新任总理巴达威〉，<http://www.dajiyuan.com/b5/3/10/31/n403393.htm>
- 42 大纪元网站：〈阿布杜拉要纠正“丑陋马来西亚人”思想心态〉，<http://www.dajiyuan.com/b5/3/3/7/n283793.htm>
- 43 大纪元网站：〈马来西亚新总理国会首次演说一矢言维护民主〉，<http://www.dajiyuan.com/b5/3/11/3/n404854.htm>
- 44 廖小健：〈2004 年的马来西亚：新政府新发展〉，页 30。
- 45 陈峰君：〈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战略意义〉，《国际政治研究》(北京)，第 1 期 (总 91 期)，2004 年 2 月，页 24 至 25。

- 46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1.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56/1257/t127798.htm>
- 47 Jing-domg Yuan, *Asia-Pacific Security: China's Conditional Multilateralism and Great Power Entente*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SI)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4-5.
- 48 Avery Goldstein, 2005,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p.840-841
- 49 陈峰君：〈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战略意义〉，页 26。

全球化话语下的 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

何国忠

一、前言

2006年1月26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许多领袖参加了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纪念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11周年。与会的华社领袖包括马来西亚支持一中协会、马中友好协会、中华大会堂总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七大乡团、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马留华同学会等华社组织负责人和代表。中国驻马大使王春贵在致词时表示，在新形势下，中国仍将依据江泽民的八项主张和胡锦涛的四点意见，积极开展对台工作。他表示，中国有决心，不断加强与台湾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化解“台独”分裂势力人为制造的隔阂和疏远，排除“台独”分裂势力制造的困难和障碍，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他说“我们有诚意，积极推动两岸的发展，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中国政府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与会的华团领袖高度评价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中国和平统一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对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和措施表示赞赏，认为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¹

类似这种大使馆代表及华社领袖齐集的场合这十年间在马来西亚极为普遍。除了与马中有密切关系的活动以外，许多纯是本地华人的乡团活动，中国驻马大使也是座上宾。从政党到商会，从报馆到乡团，林林

总的庆典及聚会，我们都看到大使或其代表的踪影。

华团领袖在 2004 及 2005 年更是费尽心思。华团领袖先在 2004 年，掌握了马中建交 30 周年机会，大肆庆祝。2005 年则趁“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之际，出钱出力，策划了许多的活动，把马中官方互动关系，追溯到明代永乐皇帝与马六甲王朝交往，在幕后与中国各个相关利益单位，建立联系管道。

本文主要是分析在全球化话语下，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的反应，先是讲述华人在政治上从中国认同转向马来西亚认同的过程；而后讨论文化中国的问题；继而专注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和现今中国的关系。

二、从中国到马来亚

19 世纪末叶及 20 世纪初期，华人大量移居马来亚。这些冒险南来的华族先辈，绝大部分是赤手空拳而至。凭着克勤克俭的精神艰苦奋斗，他们在充满挑战的陌生环境中挣扎求存。

推动华人南移的原因极多。清朝末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定，时有战乱，农村经济崩溃，粮食不足，人民应付不了苛捐杂税。物资丰富、土地肥沃，需要大量诸如采矿业及种植橡胶的劳工的南洋无疑吸引不少华人。华南闽粤两省频临南中国海，地近南洋，配合航运的发达，加上南洋殖民地政府在同一个时候又备有宽待华工的措施。两省的人民一经斟酌，便有远走家乡的意图。

华人移民以后，并没有放弃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据说早在 18 世纪中叶，槟城就有私塾教育，等到左秉隆（1850—1924）及黄遵宪（1848—1905）上任的时候，再到康有为和孙中山来马来亚的时候，华文教育更为普遍。这些领袖在南洋不断强调中国的困境和危机，灌输救国意识，使到马来亚华人一直都凝视中国向前的步伐。马来亚华人因此和中国起着水乳交融、难分难舍的情谊。中国的问题就是马来亚华人的问题。辛亥革命前，胡汉明的回忆为这个史实做了一个极有力的注脚：“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分子……至于工人更来得热心，工人随随便

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海外华人对中国牺牲的例子，俯拾即得。丘菽园为了宣扬保皇党，不惜自掏腰包，于 1898 年创办《天南新报》，最后因为亏损过大而关闭。1900 年他又慨捐大约 200,000 元，支持唐才常领导汉口之战。这个过于热心中中国政务的华人，终于在 1907 年因为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情况下破产，惹上官司，由百万富翁一蹶而为穷苦文人。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新马人民“为国牺牲”的情况，我们不妨在这里多举一个例子。黄花岗之役，不只是在槟城筹备，新马人士，更是积极参与。在七十二烈士中，来自新马的华侨占了 17 位。新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财力资助，更是不落人后。武昌起义后，新马华侨支援革命派的汇款总数为超过叻币 870,000 元，占同时期海外华侨捐款的三分之一。²

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耻辱，在不断遭受列强和日本瓜分的情况下，海外人民一直都有中国将灭亡的忧患。当救亡意识成了华人的核心思想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符号当然就更加刻骨铭心。在文化和政治上，新马的华人没有、也不曾想过可以离开中国的束缚。以五四运动为例，当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时候，新马亦步亦趋。³ 而各地的华小在五四运动后，也都纷纷在同一时刻将华文课本由文言改成白话，教学媒介语也由方言改成华语。在一片向西方学习声中，华文中学不只在马来亚各大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增授英语等实用课程。这样的革新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华人纷纷将孩子送到华校，英小的学生人数在那几年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⁴

“早期的中国移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们的身份问题。”这是颜清湟的观察。诚如他所言，大多数的移民宁愿把自己看成是旅居者，而不是定居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国世界。这些移民对中国认同随着中国文人的多次来访而加强。由于这些文人反复强调海外华人社会是一处文化沙漠，向他们灌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而使华人领袖为当地欠缺中国文化的氛围而痛心疾首，并使海外领袖积极认同中国文化。⁵

但是时间一久，我们发现马来亚意识和中国意识之间开始在华人内

心中起了紧张关系。特别是二战以后，认同马来亚的声音越来越大。王赓武在他那篇极为著名的《马来亚华人的政治》里，将早期的华人分为：一、以大陆为认同目标；二、讲求实际，关心贸易，基本上以低姿态面对政治问题的华人，他们满足于在既定的政治集团的管理下工作；三、对马来亚有某种忠诚，其成员以峇峇及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为主。⁶ 王赓武点出的了大部分华人都注意到“马来亚意识”存在的事实，只是当时华人还是有所选择。第一和第二群体基本上都对马来亚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既希望保留中国国民的国籍，但是又不想离开马来亚。第三群体对马来亚的政治较为投入，对前景到看法积极乐观。整体而言，在战后初期，虽然有机会成为马来亚公民，但是华人反应冷漠。截至 1950 年止，只有 35 万华人自动成为公民，另有约 15 万人通过申请归化成公民。⁷ 英国政府因此对华人起了疑心，早在 1930 年代，他们已担心马来亚会变成中国的一省。⁸ 1949 年共产中国成立后，他们对华社更加不信任。

但是大部分的华人领袖却看清一个事实，马来亚将是这一代与以后的子子孙孙所必须依赖的土地。本土关怀是一个不能避开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心态可以从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态度来说明，林连玉在 1952 年主张除了必须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外，马来亚的课本内容也应本地化，他领导教总参与重编华文教科书，改变之前教科书由中国编纂，中国出版的格局。⁹ 与其将教总在 1950 年代本地化工作形容成果敢的动作，不如说他们在在这方面已觉察马来亚的华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所将出现的国籍转换的过程。

战后，舆论界对国民党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不能容忍，亲国民党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转弦易辙，要求国民党领袖检讨。眼看国民党在中国的气数已尽，加上英国政府不鼓励这些外来组织在马来亚发展，其在马来亚的党员士气低落，不免重新思考自己的前途，于是在 1949 年 9 月 11 日，公开宣布正式关闭马来亚各直属支部。说其党员在国民党解散后就摆开中国情结当然不符常理。但是没有基地以后，国民党党员在政治上的一切主张显然已是师出无名，他们只能个别行动或者透过俱乐部的形式从事活动。英国政府于 1950 年 1 月在外交上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宣布明令封禁国民党组织。对国民党更是无情的打击。¹⁰

至于共产党则有另一个不同处境。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在 1948 年宣布紧急法令后，马共便号召“各民族全体人民广泛团结起来，结成反民族统一阵线。”企图建立一个“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虽然马共也关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但是马共在马来亚的斗争看来更为迫切。殖民地政府在 1948 年 7 月 15 日实施紧急法令条款，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马共和殖民地政府便形同水火。¹¹

紧急法令实施以后，住在偏僻地区的 573,000 人被迁居到 480 集中营，即所谓的“新村”。华人在这次大迁徙中占了 86%，被逼远离家园以及牺牲原有的生计，到一个设施简陋及管制严密的“新家园”过着艰苦的生活。¹² 在剿共声中，许多学校、报刊、社团的行动和操作都受到影响和牵累。陈修信在大约二十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是一个“排华政策”，许多华人都无辜受害，在证据不足下锒铛入狱。¹³ 1952 年 6 月的调查显示当时在拘留所的华人就接近 7,000 人，从 1948 年 6 月至 1953 年 3 月止，被政府驱逐或遣送回中国的华人高达 24,036 人。¹⁴

这也是马华公会成立的一个历史背景。马来亚华人迫切需要一个合法组织和英国殖民地政府交涉。1948 年 12 月 15 日，以李孝式为首的立法议员联名致函各地中华总商会，促请协助筹设，各方反应热烈，同意派出代表出席 1949 年 2 月 17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成立大会。当天，马华公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这是一个道地的本土政党，马华公会的成立标示着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不必假手于人，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在地的政治问题。

即使如此，中国政府却始终将海外华人当着其国民。直到 1955 年中国政府才正视东南亚华人的公民权困境。1955 年中国政府为了和印尼建立关系，设定海外华人的政策，一方面承认当地华人公民和中国没有政治上的牵扯，另一方面则要非公民的华人尊重当地的法律与文化。马来西亚华人在接受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问题当中没有像印尼那样复杂，但是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无疑告诉许多华人双重国籍的不可能。1957 年马来亚独立，大部分本地华人很快融入马新建立的国家中。

三、马来西亚领导人与中国

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的政党后，走进森林，企图用武装斗争去推翻英殖民地政府，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他们背后的的支持者。中国在1949年成为共产国家后，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终胜利，中国功不可没。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都不满中共对马共的援助。越南共产党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印半岛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苏加诺政权的左倾及印尼共产党力量的膨胀，都加深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的戒心。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那么顺利。

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承续了英国政府反左的意识形态，实行剿共政策。虽然中国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原产品重要的消费国，但东姑从来没有将两国正式建交纳入其执政时期的议程。¹⁵东姑族群内部的压力显然是关键因素。许多马来人认为东姑为华人做了太多的事情，马来西亚若和中国建交，马来人或会解读成他对华人社会的另一次让步。另外，对东姑来说，避开中国也可以让更多的华人避开左派的影响，两国邦交可能发出错误讯息，进而影响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本土的效忠。东姑身边的一些华人朋友也对当时马来亚的外交政策起了作用，这些人当中包括前身为国民党员的马华党要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商人。1965年在台湾设立的马来西亚领事馆显然就说明了马来西亚对国共的态度。

共产党武装叛变困扰马来西亚多年，马来西亚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它是全世界冷战的一环。¹⁶独立以后，超过10年间，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没有正常的来往。1970年10月，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阐明东南亚中立概念，并扬言大马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一次的言论明显向中国表示两国建交的可能性。此后两国不断接触，直到1974年5月，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访华，建交才落实。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当然有很多特别的政治考量，马来西亚政府清楚知道东南亚国家所持的中立性立场，必须得到列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肯定和支持。马来西亚于1971年10月25日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取代台湾担任安全理事会

常务理事，秉持的也是相同的立场。但是两国始终不能完全信任对方，敦胡申翁时期，虽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曾在1978年访问马来西亚，但两国关系并无多大的突破，胡申翁对中国也一样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当1978年中国侵略越南时，马来西亚领导人更加密切注意中国的动向。马哈迪执政初期，两国人民仍然不能互访，仍然保持之前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只维持贸易、人民探亲及寻医的联系。¹⁵

一直到马哈迪时代的后半期，两国的外交才出现突破。198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当中马来西亚最大的新闻是马共在1989年12月2日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解决了马来西亚和中国交往的垒块。为了长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马哈迪政府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态度，1989年宣布允许马来西亚人民可以自由进入中国。

冷战结束当然是两国关系改变的契机，但是两国在建交以后的内部变化更让人关注。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走向全球化。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显而易见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恰好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使到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参与进去，已经同国际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

但要理解两国的关系，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观点来说更加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气候及马来西亚领导人本身思维的变化，这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当然是马哈迪的族群政策。马哈迪治理马来西亚的历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马哈迪在位的前面十年，在文化政策的观点上，承袭的是之前几位首相的方针，始终认为非马来人最后必须认可马来语、马来文化，以单元取代多元。

马哈迪时代前十年的族群政策可以通过几件大事说明。1982年9月内政部发函通知由是年10月1日起，除了农历新年外，停止发出准证予所有申请表演舞狮的个人或团体；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以拉惹亚都拉取代叶亚来的地位，1984年政府证实要铲除对华人具有象

征意义的三保山，1984年吉隆坡教育部命令华小在集会及其他活动上必须用马来文；1987年马大中文系选修科风波。马哈迪伤透了华人的心。各种各样的族群政策最后以1987年的“茅草行动”告一个段落，那一年，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引起了华社极大的反响，华社领袖一致反对这样的作法。在同年10月11日，三个华基政党联同十五华团一起在天后宫商讨对策，华文报大幅报导，并对华人空前的团结给予正面的评价。天后宫聚会引起了巫统青年团的反击，在10月17日召开马来人大会还以颜色。族群之间的对峙情况是自1969年513流血事件以后最紧张的一次。马哈迪采取名为“茅草行动”的大动作，在1987年10月27日运用内部安全法令，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逮捕了高达106名来自不同单位代表、不同族群的所谓“煽动族群情绪者”，《祖国报》、《星报》和《星洲日报》同时被禁。¹⁶

华人固然因为马哈迪的族群政策忧心忡忡，马哈迪一国之首的路也一样崎岖。从1985年开始，经济萧条、和副首相慕沙关系决裂，加上贪污事件频频发生，都令马哈迪的政权面对极大的考验，特别是土著银行亏空事件，更让提倡“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的政府”的马哈迪难堪。1986年大选以后，巫统内部政治斗争终于被搬到台前。1987年，不满马哈迪领导的前副首相慕沙，连同前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组成所谓的B队，挑战马哈迪与取代慕沙担任副首相的嘉华。在该年4月24日的党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是，东姑拉沙利以43票之差栽在马哈迪之手，慕沙希淡则以40票之微数票败给嘉华。马哈迪虽然胜了，但两派人马实力接近，巫统的领导层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缝。

茅草行动以后，马哈迪渐渐地掌控了巫统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局，以后也没有听到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董总主席林晃升与教总主席沈慕羽为了华文教育而坐了将近八个月的牢，可说是继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以后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惩罚。三家不同语文报章被禁以后，其他报章立刻偃旗息鼓，没有再针对敏感的族群问题各自表述。

1990年，没有加入新巫统的B队领导人以四六精神党倡组了反对党联盟，给国阵政府自建国以来最为有力的挑战。像1986年一样，华人也助反对党一臂之力，直接受到伤害的是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在1986年的

大选赢得17个国会议席，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但比起1982年的24个议席逊色，特别是以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都被行动党取代。民主行动党在独立以后，一直都是华社不满国阵政府的传声筒。民主行动党在1982年、1986年及1990年所赢得的议席分别是9、24及20。

但是，由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民党、印度人进步阵线、马来西亚团结党等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在1990年大选毕竟动摇不了马哈迪政权。国阵虽然丢失了吉兰丹州政权于回教党，总得票率下降为53.4%，国会议席也减少了21席。但是还是在180席中赢得127席，继续保有三分之二的优势，损失未如估计的高。而马哈迪的新巫统通过这次大选证明了其地位无可取代，在参与竞选的85个马来半岛的议席中获得70席。四六精神党本来预期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但结果令人失望，只获得8个席位。

这次大选是马哈迪治理国家22年中的分界线。马哈迪从此以后专心国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新蓝图固然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但骨干却是全民参与，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一个先进国，到时不再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分，只有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人”。马哈迪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提高马来人的竞争能力，才是确保族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最有效方法，这一点是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前提下陈述的，也就是说，华人和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不应此消彼长，而是“双赢”，彼此合作，制造更大的“经济蛋糕”。

2020年宏愿将国家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从1990年到1997年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开放局面，513事件以后华人被压抑的经商机会突然大增，发展主义的政治基调让我们看到马哈迪大幅度调整其民族主义的主张。他掌握到在全球化时代，族群间彼此的差异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之下可说微不足道。抢分经济蛋糕的假想敌人不应是国内的异族同胞，而是更具竞争能力的外国公司。这时他实行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化政策，让非土著享有更大的参与空间，最终让马来西亚政府有效地结合各族群的优势，朝向国际竞争的方向。显而易见的，马哈迪十年治理国家的经验使他后半期决定以更宽广的角度看待族群间相处的问题，他似乎更加自觉到他是马来西亚各族的领袖而不只是马来人的领袖，华巫关系进入史无前例的黄金期。

四、马来西亚华人与文化中国

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最后发展成认同中国文化但却拥有各种非中国国籍的现象。今天，海外华人组合成各个不同的“族群”；在华人群体中，早已出现“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区别，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都有差异，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自称“华人”。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已不再重合。二位一体的中国已不复存在。即是说，当下的历史格局，已并列呈现不完全重合的“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文化中国则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以中华文化为生活基础的华人世界。

在 1949 年当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坚持反共的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鸿沟。在政治认同上，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已经和中国划清界限，但在文化上，却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连。马来西亚华人从来不曾放弃自己身为华人的事实，代表董教总（董氏教育推广委员会）的华人在这方面极为努力确保完整的中文教育可以进行，独中、南洋大学都见证了华社的努力。国家和文化认同上使到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之间起了微妙关系。自 1948 年实施紧急法令以后，英殖民地统治者和马来族的领袖，便把马共的威胁和华文教育挂钩起来，即认为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比较可能成为马共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因此，凡是坚决维护华人学华语华文的基本权利的华族发言人，或任何争取此项权利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有可能被看成是受到马共指使的，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的前三十年，族群之间的差异不断被摆到政治的台面上，政策的贯彻一直被族群问题所主导。文化、教育、经济、政治问题就在族群问题不能消弭下带给华人长期的负担和挑战。当中，“中国”经常被当作政治议题，华人经常要为不效忠的指责辩驳。马来西亚华人在步步为营之余，却始终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执著，这一点可从华人对母语教育的发展看出一个大概。

从教育的渊源来看，早期的华人可分为三类，一是纯受华文教育

者，一是纯受英文教育者，另外一类是小学接受母语教育，中学到英校就读者。自从政府推行国语政策以来，马来西亚再也没有如以往的接受英文教育者。目前华人还是有三种选择：一是纯粹受马来文教育，二是纯粹受华文教育，三是小学受华文教育，中学往国民学校就读。

自从英校被改制为马来学校后，许多家长改变过去将孩子送到英小的态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华小。目前有大约 90% 的华人是将孩子送入华小。华人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掌握最基本的母语教育。小学修完以后，家长可以将自己的孩子送入以国语为媒介语的政府中学或是由华人自己经营的独中就读。就读独立中学的学生在这 20 年来一直维持在 5 万多人，而政府中学的华族学生大约有 23 万人。

华人的心理是极容易让人了解的。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会忘本，另一方面则希望在这块多元种族的土地上，他们的孩子能够投入于发展的主流中。马来文是国语，是官方语文；英文是国际语文，在马来西亚的工商业领域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不能放弃。通晓三种语文是一般家长对子女的期望。

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发展上，和其他世界华人地区比较，相对的一直有一个适合成长的土壤。人口的比例当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1960 年代固然是华文教育低潮的日子，但是 1970 年代，华人文化的悲情意识使到华人文化发展呈现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成绩。在国家文化政策中马来人支配主义反弹下，华小的学生不减反增。整体而言，有许多老一辈的人，特别是以董教总为代表的华教斗士，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苦心积虑。在这些人看来，文化是族群的根本，没有文化，就没有华人，这些人的坚毅精神成了华人文化传承的典范。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眷恋虽然相对淡薄，但是他们也不见得就对中华文化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从独立到现在，许多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是在华人氛围下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这些人不理会文凭不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的困境，在小学、中学以后，继续到台湾深造。1955 年成立，1981 年停办的南洋大学也替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造就不少人才。当中国开放以后，也有不少人到中国求学。而国内大学的与中文相关的科系，这几年一直很受学生欢迎，单是在 2004 年一年级的中文科系学生总人数就接近 400 人。¹⁷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主要是其发展并不是封闭式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一直深受中国、台湾、香港的影响。文化的传承需要思想和学术作为底蕴。马来西亚华人要其文化的发展踏实有力，当然要接触先秦诸子、四书五经、中国古典诗词戏剧小说。马来西亚的学术风气不高，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了解，基本上要借助港台大陆学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当代中华文化出路的文章，显然也避不开要参考港台大陆学人的思想结晶。高层次的文化如此，大众文化也一样。马来西亚所放映的大部分中文电视和电影都是产自中国、台湾、香港。从吉隆坡各大书局所摆卖的书籍就可看出端倪，里头充斥的都是这些地区的作品。当卫星电视出现的时候，文化上的影响更是显著。许多当代中国社会能够接触的事物，马来西亚华人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同步观看。

由于文化的传播持续，“文化中国”的情意结一直强烈地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在政治敏感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将这个情意结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国度来谈，担心文化和政治搅和以后会引发无谓的“不效忠”议题，但是言论空间更具弹性的时候，这个概念便会跨越到它原有的场域。来自马来西亚砂拉越，拥有马来西亚星洲报业集团和香港明报集团的张晓卿提起他的办报理想时说到“中华魂”：

如果说我要垄断报业，我最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¹⁸

而《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已经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5届年会的地区报告中说过：

我个人喜欢‘文化中国’这个概念。在这文化范畴内，没有政治斗争，没有意识型态的分裂。就像《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奖》，它得到了全世界华文作家、文化人的鼎力支持，大家已将它视为有助於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和属于全球华人的文学奖。¹⁹

只有在“文化中国”的大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马来西亚华人为何和“中国”如此接近。也可以理解当马来西亚政府允许其人民自由进入中国时，马来西亚华商即跃跃一试。作为马来西亚商人的先锋到中国投资，不尽人意的固然有，但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无疑的，中国之门被

开启以后，中国热就成了一个不可抵挡的浪潮。

诚如萧依钊所言，在“文化范畴内，没有政治斗争、没有意识型态的分裂”，但我们也会思索这句话的另一个面向：文化中国这个观念要运用自如，还得要没有政治的干预。也就是说，华人的文化情意结要不被压抑，也非有开明的领导人的配合才行。

这种开明的配合见证于马来领袖不断突出中国的重要性，单是这五年间，曾经访马的中国重要领导人就包括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李岚清，而官访中国的马来西亚领导人更多，包括最高元首、马哈迪、巴达威、纳吉、黄家定、林敬益等。马哈迪仅在1990年代就访问了中国4次，是马来西亚首相中访华最频密的一位。两国在许多事情上互相支援。在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屡次受到美国的批评和非议，马哈迪则不断在国际场合批评美国不应该用其标准来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这当然很合中国领导人的口味。1998年9月以来，马来西亚因发生“安华事件”和采取“资金管制措施”，而受国外舆论抨击时，中国政府没有插言。马哈迪事后说：“中国并没有教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政府和国家”²⁰。1999年8月马哈迪访问中国时，就发言表示他非常珍惜两国之间彼此谅解对方、尊重各自的思维方式与主权完整的务实立场。他认为就是这种态度，使马中关系得以持续，并为两国的关系带来持久的利益与和睦。²¹ 就在这次的访问期间，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领导机构华总，也分别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和中国侨联签署提升民间文化活动的友好合作意愿书，希望促进两国民间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同年11月两国签署的《文化协定》也特别提到两国的青年、宗教、工会、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众组织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内容。

无疑的，马来政治领袖要到1990年代才开始贯彻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分野。马来西亚华人一向对“中国”都小心翼翼，开始到中国经商和投资时，也低调处理，但在领导人也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趋势以后，马来西亚政策已出现了变化。事实上，当中还有一个既成的事实，马来西亚到中国投资的所谓大财团，马来人的股份也不少。马来西亚交易所现在有一千家上市公司，每家公司都必须遵守至少30%土著持股的条例。马来西亚政府因此对华人到中国经商和投资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利用华人同种文化的优势，促进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在2003年7月28

日第7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时，马哈迪在演说中虽然也提醒华人企业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必须与当地其他族群共享机会，但他演讲中的重点却是称赞华人经济圈对当地国所带来的正面意义。他希望在全球化的经济转型中，华商充分利用自身的经贸网络，为全球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继续作出贡献。

中国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出口市场，是马来西亚第4大贸易伙伴。这几年间双边贸易节节上升，双边贸易额在过去5年增长了超过3倍，2003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达201.3亿美元；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262.61亿美元，2005年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分得一清二楚的开放观点，马来西亚华人的思维不再像从前一样受到桎梏，华人不只对中国投资不再是敏感的课题，商业或政治以外的往来，也越来越密切。华人团体与中国相关机构互访的新闻，目不暇及。华人对中国问题的言论，预设的尺度越来越宽松，担心被质疑对马来西亚不“效忠”的问题，已经烟消云灭。其中华团领袖处理两岸问题，更让我们看到这方面突破。

在海峡两岸的问题上，主流华文报章的评论基本上一面倒，例如《星洲日报》就有阮次山、汤本等人的专栏，南洋则有何亮亮、曹景行等人的专栏。这些人都是强烈支持一中观点。《星洲日报》创办于1921年，读者超过百万，发行量超过40万份，有5个分印点。星洲日报是上市公司，集团有员工1800多人。其纲页上就自称“《星洲日报》不但是马来西亚，也是中港澳台以外发行量最高的华文报。”²²而《南洋商报》也是一家挂牌公司，它选择与香港倾中的《文汇报》合作，每天都刊登几大版图文并茂的《文汇报》新闻。

自汉朝把儒家定为至尊以后，“大一统”思想慢慢就渗入中国人的骨髓。其间国土虽有重新划分，但分的结果是谁都想以后一统天下。百年的耻辱史，也是百年的民族主义成长壮大的时期，中国不能让台湾独立，大一统的心态是极为明显的。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在政治上清楚地表明和台海问题上没有瓜葛，但是血浓于水的心理因素，倾向中国的统一当然不足为奇。

主流报纸所刊登的言论虽然倾向统一，但办报的人并没有直接扬言其立场。比较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以马华公会前总会长李三春为首的一

批华人领袖在2004年1月成立的“一中促进会”，第一次涉及了政治中国的发展。在成立促进一中协会时，自政坛退隐以后就尽量避开媒体的李三春明确指出：“台独违反大多数华裔的意愿。作为大马公民，我们不想见到两岸兵戎相见。”²³“一中促进会”发布的四大立场已清楚阐明要奉行中国的外交原则，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促进会”虽然表明他们是代表个人参加，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名单，就知道其中的代表性了。其中拿督斯里林玉唐是华总会长，丹斯里钟廷森是商联会会长，其他成员如陈凯希、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李深静、丹斯里陈来金、丹斯里林源德、丹斯里李金友、丹斯里颜清文、拿督童玉锦、拿督陈良民、拿督吴德芳、拿督李剑桥及蔡马友都是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些人虽然都是商人出身，但是熟悉马来西亚华团的人都知道，除了董教总领导人没有名列其中外，他们所代表的团体都是所谓华社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至于董教总为何完全没有代表，其中理由或者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教育事务，不想因为台海问题的立场影响他们。

我们固然可以说一中促进会的领导层主要是在中国有经商，但“文化中国”发酵下的情意结可能也值得注意。事实上，李三春除了对两岸问题发表其议论以外，到今日还是一样低调。²⁴倒是“一中促进会”秘书陈凯希有更多的言论值得参考。陈凯希这么说：

我现在已经归化为一个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是我的国家，我首先要忠于它热爱它。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祖宗是来自中国，是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熏陶了我。……我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作马中友好的纽带和桥梁。

陈凯希是经销中国产品闻名的海鸥集团董事经理，对中国极为拥护，经常受媒体访问畅谈中国问题。陈凯希于1937年5月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居銮市，陈凯希为老二，上有一位姐姐。陈凯希的父母都来自中国，父亲是福建安溪人，母亲是福建永春人，在中国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和许多当时的年轻人一样，热衷于政治活动。正当他们办婚礼的前夕，因一同事突然遭到逮捕，迫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马来西亚。在马来亚，陈凯希的父亲参加抗日活动，后来又和英军对抗。1948年，陈凯希的父亲被英国政府逮捕，在被关押两年之后，于1950年被驱

逐出境，遣返回中国。彼时陈凯希的母亲一共有 10 个孩子，其中 7 个孩子跟随父母回国，只剩下陈凯希、其姐姐及一位弟弟留在马来西亚。那年，陈凯希才刚刚 12 岁。陈凯希以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18 岁即辍学，陈凯希后来参加劳工党，担任过劳工党的副总秘书，1965 年 2 月 13 日被政治部拘留长达 8 年 3 个月。1973 年出狱后他在亲朋好友办协助下，创办海鸥公司，专卖中国货。²⁵

陈凯希一直都是马中关系的重要推手，1992 年他推动了马中友好协会的成立，至今仍然担任该会总秘书，此外，他也是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的名誉会长，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在 2002 年主导下成立的马来西亚中国商业理事会的理事。陈凯希在 2003 年将吉隆坡蕉赖一座叫

“Ue3”的商业大厦承接下来，建立“马中商城”。到过“马中商城”的人都会知道，与其将“马中商城”看成是一个商业投资，倒不如说陈凯希是为了圆他自己的文化中国梦。

“一中促进会”成员参与此会的目标大体也可做如是观。“一中促进会”其他成员不一定像陈凯希的背景那样复杂，但是这批年龄相若的华人社会领袖都成长在一个政治与历史颠沛起伏的背景下，他们有强烈的中国情意结不足为奇。台湾是否独立不会直接影响马来西亚华人，但是肯定将破坏他们心目中为文化中国所营造的美丽图景。文化中国讲究的是一个和谐概念，文化中国发挥到极致，可能成了理想主义。每一个理解中国文化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领会“中国”带给他们的意义，并把他们对中国的概念，带到自己语言的领域去。“政治中国”的发展必然影响“文化中国”这个净土，因此对“政治中国”的关心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是否能畅所欲言，却还得看在地国的政治氛围。

五、结论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华人对中国时事开始疏远，现今超过 90% 的华人是在马来西亚土生的。新生代和政治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不一定会以中国的崛起为荣，但是，从目前民间和社会的一些活动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可以预见，新生代未必就能够远离惯见的文化中国论述，

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无限商机和各种资源，以及语言互通的亲和力，对新一代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几年间，每年有无数的青年团体组团访问中国青年团体。其中马来西亚八大华裔青年组织在 2004 年 10 月 26 日组团到中国访问，与中国新生代建立关系。他们拜会的组织包括国务院侨办、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北京侨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津市青联、天津市侨联等。²⁶ 另外，马华公会属下青年团（马青）在 2004 年更是大肆庆祝马中建交 30 周年，除了组成四轮驱动远征车队访问中国云南省昆明以外，当时的总团长翁诗杰也率领 20 人的代表团在 2004 年 21 日至 26 日访问中国，其中一个重点是与中国执政党青年团（共青团）建立互动关系。²⁷

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开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弱后，马来西亚领袖已不担心中共会输出革命。几个中国或以中国新闻为主的频道获准在马来西亚的卫星电视播映，官方色彩极浓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5 年获准在马来西亚印刷出版和发行，²⁸ 都是 20 年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马来西亚华人具有双重认同性，即在文化认同方面坚持保留华人特性，但在政治认同方面坚持效忠马来西亚；这两者在马哈迪以及他的继承人巴达威看来是并行不悖和没有冲突的。民间来往的开放政策令华人感到高兴，无可否认，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马来西亚华人只希望目前的和谐气氛可以长久不变。

注释：

- 1 〈马来西亚华人纪念江泽民关于促进祖国统一八项主张发表 11 周年〉，《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hoto/2006-01/27/content_4107682.htm
- 2 颜清湟（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 264、页 315 及页 353–354。
- 3 方修：〈总序：马华新文学简说〉，《马华新文学大系》，第 1 集（理论批评）（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 3–20。
- 4 林水樟：〈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樟、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 2 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221。

- 5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265。
- 6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81), pp.8-9; 中译见姚楠编译：《东南亚与华人》(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页 159-160。
- 7 1948 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规定，除了马来土著为当然公民外，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并在马来亚联合邦（槟城马六甲除外）出生者，须住上 8 年才能提出申请公民权。至于那些在马来亚以外出生者，则需住上 15 年才有资格申请，申请人除了需具备良好品德与宣誓效忠当地外，还得通过英语或巫语考试。但住满 20 年且超过 45 岁的申请人，则可豁免语文考试，见 John Michael Gullick, *Malaya* (London: Ernest Benn, 1964), pp.238-239；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 页 328-329。
- 8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页 56。
- 9 林连玉：〈改编华校教科书〉，《风雨十八年》上集 (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90)，页 32-33。
- 10 有关国民党在马来亚的事迹，参阅 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有关共产党在马来亚的事迹，参阅 Justus M. Van der Kroef, *Commun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Contemporary Surve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7)。
- 12 Ray Nyce,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73), pp.XXXIX-XLI.
- 13 Tan Siew Sin, *Blueprint for Unity: Selected Speech of Tun Tan Siew Sin*, edited by J. Victor Morais (Kuala Lumpur: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Headquaters, 1972), p.225.
- 14 Victor Purcell,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46.
- 15 参阅 Lee Poh Ping and Lee Kam Hing, "Malaysian-China Relations: A Review", *Malaysian, Southeast Asia and Emerging Chin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ou Kok Chung and Yeoh Kok-kheng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5), pp.1-27.
- 16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5; Aliran, *ISA dan Keselamatan Negara* (Pulau Pinang: Aliran Kesedaran Malaysia, 1988).
- 17 马来亚大学除了在文学院设有中文系外，也在语文学院设立中文语言学士课程，其他设有相关科系的大学或学院包括博特拉大学、拉曼大学、华社民间所办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

- 18 《亚洲周刊》，第 15 卷，第 24 期 (2001 年 6 月 11 日)。
- 19 《星洲日报》，2002 年 11 月 19 日。
- 20 Joseph Chin Yong Liow,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 *Asian Survey*, vol. 11, no. 4 (July/August 2000), p.678.
- 21 《南洋商报》，1999 年 9 月 19 日。
- 22 <http://www.sinchew-i.com/intro/>
- 23 《南洋商报》，2004 年 1 月 14 日。
- 24 李三春对台海问题的观点，见《亚洲周刊》，第 18 卷，第 6 期 (2004 年 2 月 8 日)。
- 25 作者在 2005 年 11 月 3 日与陈凯希先生会面交谈，上述资料由他提供。
- 26 “与中国新生代交流马来西亚八大华青社团领袖访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4-10/28/content_2148299.htm
- 27 见《马青总团：活动讯息》，<http://www.mca.org.my/chinese/youth/youthlisting.asp>
- 28 《南洋商报》，2005 年 1 月 14 日。

优势互补谈马中高等教育合作

陈友信、吴明珠

一、前言

近十几年来科技的突破和资讯工艺的高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变小，国与国、城市与城市在时间和空间的接触上缩短，国际间的联系变得比较简单容易，全球化的概念乃应运产生。国界的淡化促进了各国之间能密切的合作与互惠。新科技新知识涌现，对此新科技新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导致教育扮演了更重的角色。随着此新趋势的需求，高等教育体系、方法、题材、内涵和相互的联系与合作等等的改革和创新也全球性的展开了。本文将探讨两个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两国相互的经验、需求和优势互补中所产生的创新教育合作模式。

二、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体制与发展，一路来都是单线由政府创办和管理的；直到近年来才批准民办高等教育的创立。政府设立的公立大学，从1957年独立到1970年代中叶，只有五所。1980年代多设了两所，1990年代再增设三所。¹至于私立的大学，一直到1997年，才在政府的邀请

下，由三间大企业公司成立了三所私立大学。到 2000 年以后，政府又再设立了几所新的比较小型的大学。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和教学媒介语文有密切的关系；1956 年“拉萨报告书”提出时就强调：统一课本内容比推行单一语文为教学媒介更为重要。² 政府允许中小学校除了马来语文（国语）以外，可以使用其他语文为教学媒介，像华文、淡米尔文、英文和其他外国语文。因此中小学校由于教学媒介语文的不同，可分类成：经费全部由政府拨款的马来语文国民中小学校、经费部分由政府津贴的国民型马来语文中小学校，以及经费完全自立由民间设立的其他教学媒介语文的中小学校。学生从小学教育开始，可以选择进入某一种学校，例如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等等。进入不同语文媒介语文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在接下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不同了。在马来西亚进入大学是凭政府高等教育文凭考试的成绩申请的，而这项鉴定考试是以马来文出题和答题的，对来自非马来语文媒介语文学校的学生来说，显得非常困难。政府大学的数目不多，而且在 1970 年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大学录取名额乃依种族人口比例，施行固打制。对来自非马来语文媒介语文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尤其是华族学生，很多都不得其门而入政府大学。许许多多的中学毕业生必须寻求其它升学管道；到海外留学是一条途径。一路来家庭经济环境允许学生，可以选择到英国、澳洲、新西兰、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地区留学，其也可以选择去台湾或新加坡留学。不过只有少数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到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其他大部分的学生都得自费出国留学。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国小民寡的马来西亚，竟有高比率的学生赴海外留学。

三、马来西亚经济波动带来的教育新趋势

马来西亚在近代有两次大的经济波动，一次在 1985 年前后，国际锡价的大跌，造成经济大萧条；另一次在 1997 年出现的货币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家庭无法负担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政府和民间社会必须作出适时的回应方案。

1980 年代美国抛售储锡，造成国际锡价大跌，引起当时以锡矿为主要经济作业的马来西亚，起了经济大危机，市面上一片萧条。根据报导，打击最大的产锡地——近打河流域，许多乡镇，家中只剩妇老和孺弱，年轻和年壮的男女都到外地谋生，不少人跳伞到外国做非法劳工。年轻学子无法到海外留学，现实的情况，加强了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广大需求；于是许多私立大专学院就纷纷创立。马来西亚英迪学院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86 年英迪学院初创立时，第一批学生只有三十七人，在二十年后的现在，学生人数已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学院从当时租来的半层楼到目前海内外一共有十一个院校的英迪教育集团。英迪学院的发展，一方面它是基于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大需求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它就是在全球化国际合作的概念下发展出来的。学院是以教授美国大学课程开始，接着发展到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等的大学课程。大学课程前段在英迪学院上，后段在前往的外国大学完成，然后获取该外国大学的学位。通过此双联课程，使学生节省了不少费用和时间。

1997 年发生货币风暴，马来西亚的经济再次受到严重打击，政府乃批准让完整的外国学位课程在本地完成，以让学生受惠。因此机缘，马来西亚有不少私立学院在与外国大学联办“1+2”和“2+1”学位课程后，能够加上最后一年课程，变成“3+0”，³ 让学生在本地念完其学院之伙伴大学的学位课程，而获取该伙伴大学的学位。有几所这种学院在国内办学拥有一定的成果，并累积了十几年与外国大学合作办学的经验后，相继到海外发展。此类到海外合作办学，大多数是私立学院，因为公立大学是以马来语文（国语）为教学媒介，不符合海外的需求。

四、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外合作新走向

1992 年中国在政策上再次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及开放，于是工商企业各行各业大量的扩展运作；不但在国内，同时也朝向国外广泛地接触。在争取处处的商机及确保能在企业舞台大展身手，接受良好教育越形重要。在国家社会经济繁荣后，家长有余力给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甚至不

惜大笔花费，送子女上名校、安排出国留学。于是在政府拨多款项为教育经费的同时，民办私立学校也蓬勃起来。

中国在目前的经济高比率成长以及人口财富高速度增加下，造成对高等教育的大量需求；而国内现有的大学大专院校，并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除此，财力的限制以及签证的严格要求，让许多意欲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长以及学生，难圆出国留学的意愿，这也就提供给中国教育工作者一个推动中外教育合作的时代契机。

外国学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进入外资企业的“通行证”，和高薪俸禄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工作的晋升前景，直接与其英文能力的水平有关，这也令人了解到外国学位的重要性及务实性。鉴于中国人民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强，对掌握国际语言——英语能力的渴求，再加上人民财富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国内外合作办学模式仍有机会在中国成功推展。

配合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及入世效应，中国目前急需大批精通双语的跨国人才。中国教育部经过一系列的立法及行动，以具体务实方式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办学，其发展模式可归纳成下列两大方式。

(1) 本土教育国际化：

要达致“优质教育”及“与国际接轨”的两大目标，中国大专院校正在积极进行以下的各项中外合作措施，以期在确保教育主权下将本土教育推向国际化更广阔的舞台。

(i) 英文/英语的强化：以海外有效开放式的第二语文教学法，强化中国学生的外语读听讲能力，在中国传统四级及六级英文考试的要求上，加强学生的口语能力。

(ii) 教育管理的提升：要与具国际标准的大专院校争一长短，中国的大专院校正积极输入及提升教育管理制度，例如国外教育信息化系统的引用。

(iii) 师资培训：引进优秀海外师资，或将中国师资送往海外培训。

(iv) 学分/课程互认：通过学术鉴定以认可彼此的学分，这将有助于推动学分互认中的学生交流，甚至达至双文凭的教育合作。

(2) 国际教育本土化：

将外国大专院校的专业课程引进中国，同时将之本土化，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或采用双语教学，这将是一个理想的中外教育合作配套之一，特别是对中国学生而言。下面是两种方式：

(i) 双联课程：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教育部已经开始尝试将外国著名大学的课程引入，允许以“3+1”，“2+2”方式进行教育合作；后来又从教育项目合作，发展至教育机构合作，让外国本科学位甚至硕士学位课程能在国内完成。这包括一些公立大学的二级学院也进行了中外合作办学，例如福州大学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合作办学。

(ii) 设立外国大学分校：最近在中国教育领域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些外国著名大学已经到中国设立分校，例如：设在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分校。这是在中国国际教育本土化的新起步。但据说为了保持中国教育主权，有关这种外国大学在中国设立分校的合作，尚有争议。或许较易被接受的是外国大学在中国合办一所新的大学的合作方式，例如在中国苏州设立的中国利物浦大学(尚在筹备申请过程)。

五、马来西亚与中国高等教育合作模式

目前马中两国双方高等教育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四种：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互招学生及学生交流、联办课程以及合资办学。

(1) 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中国教育需求的激增，为当地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提供更多的教育合作机会，并藉此推荐各种国外先进现代教学模式及学习方法，甚至系统性地引进与国际接轨的课程内容。当然外国教育合作方除重视中国的庞大教育市场外，应也重视中国的人才资源及研究实验实力。马中两国本着这些需求及合作办学原则，肯定能在学术交流研究上达致互补长短、互惠互利的实效。

近来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动自然药物、农基科技及生物科技研究，马中两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合作计划，并且共同成立有关实验基地。中国高科技的专业知识、专业人才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马来西亚的自然资源及国际经验，这将是个优势互补的实例。

(2) 互招学生及学生交流

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到中国招生需要了解当地的法令和规章，如委任中国政府批准的合法招生代理，确保传递正确的信息，避免误导学生。相同的，对于目前中国的国立大学到马来西亚招生，中方也必须先对马国有充分的了解，并透过正式管道进行，如各独立中学、董教总及个别华团。不少中国的国立大学仅通过个别友好进行小规模招生，往往事倍功半。若服务不佳或传达错误讯息时，更是后患无穷。至于中国教育部近来鼓励中国私立大专院校到海外招生，更显示出两国互招学生事业的强大潜能。

在两国教育机构通过彼此交流协助下，设定正确的市场策略是相当重要的。招生工作包括训练代理熟悉本身的教育课程、服务项目、以及入学标准，以及硬性规定代理仅能收取合理的招生服务费。

马来西亚私立学院也应共同努力避免无谓的恶性竞争。马来西亚私立大学与学院协会应为众多私立学院进行协调，拟定让所有马来西亚私立大专院校认可的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操作方针。

至于两国大专学府之间的短期学生交流计划，也是值得两地教育工作者大力推动的。此举不仅有助于两地学生选修对方的特长科目，又能增进对当地的认识，肯定有助于两国的长期邦交关系。

(3) 联办课程

联合办学是两国教育合作最直接的方式。此合作方式，目前方兴未艾，具备极大发展潜力。

中国大学于最近数年陆续进军马来西亚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虽然效果不显著，但始终是好的开始，如南京大学与槟城韩江学院联办中文系硕士班、北京清华大学与英迪国际教育集团合作清华英迪培训课程、北

京外国语大学与玛拉大学互派中文及马来文老师至对方校园、厦门大学及马来亚大学相互协助对方开办对方国情的研究所，这些都是马中两国进行合作办学的先行者。至于在中国联合办学的马来西亚私立教育机构，数目更多，如英迪学院、系统学院、双威学院、思特雅学院等，成效虽不一，但坚持在中国联办课程的志向却是一致的。

马来西亚许多私立学院都开办双联课程，此办学模式最早可追溯到80年代初期。他们已在国外设立不少合作办学教育机构，其办学课程的品质和学术水平获得国际肯定，让合作方能以迅速、有效的方式开办多项专业的大学基础课程和大学本科学位课程，并且能与著名的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外国大学取得联系认证。

中国学生在中国就读与马来西亚教育机构联办的大学基础课程，作为他们进入“3+0”、“2+1”或“1+2”大学学位课程的入学管道。在这类合作办学中，马方提供学术支援以及品管程序，其中包括学术鉴定、试卷审核、以及课程评估，并以此合作方式取得欧美大学的学术认可。基于马方在国际教育合作上起步较早，合作模式较成熟，马中的合作办学确能在师资、学术鉴定、课程成本等达致更高效率及互惠互利的效益。

(4) 合资办学

目前马中两国合资办学模式实例不多，主要是马来西亚私立教育企业在中国只进行小规模尝试。

合资办学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一项是不易觅得适当理想的中方合作伙伴。营业准证的取得是必要的，然而这通常耗时颇久，并且需经过繁杂的申请手续和符合众多申请条件，师资缺乏也是合资办学的主要挑战。所以至今失败的合资办学企业不计其数。

最近中国新颁的“中外合资办学条例”，对中外民营教育合资办学给予明文规定的保障，鼓励外国教育机构与当地教育机构合资办学，并批准以中外合作独立法人机构的方式经营，也有个别中国大学以中外合作非独立法人机构方式与外方合办二级学院。

有兴趣到中国投资教育者应觉察中国教育环境在政策、法令、以及

文化背景上与国外有别，因此必须深入解中国教育事业的详情和市场，并谨慎的规划。

六、开拓中国中外教育契机

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来马来西亚留学，除了经济效益的考量外，文化共识与历史因素亦为主要引力，这也就直接间接促成马中两国教育的急速接轨。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选择进入马来西亚的私立院校就读，其比率占在大马中国留学生的 97%，即 8,827 人。⁴

除了直接往中国招收学生，不少马来西亚私立院校也在中国与当地大专院校开展教育合作，包括双联课程，以让中国学生最后转至马来西亚继续修读本科学位课程。

至于最近马来西亚学生赴中国留学，学生人数日愈增加，这也是中国经济势力崛起的显著效应，并与马中经济合作趋势互为因果。

许多年来，马来西亚公私立教育机构掏尽心思，希望将每年约一千万左右徘徊于中国各大学门槛的部分高考毕业生，吸引进入马来西亚留学。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的马来西亚办学者，尝试着“走出去”，到中国去合作办学，开辟新的教育合作契机。一般上有两种办学策略：配合中国政府所拟定的政策规定进行——“计划内”办学，和在中国教育部政策所直接管制分配外办学——“计划外”办学。

(1) “计划内”办学的优劣

由于得到官方的配合，来自国外的教育机构将享有充沛的生源网络，但也同时面对中国政府当局在学费与收生人数两方面的约束。这是因为当局必须确保交费的合理化、足够教学资源及教学的绩效。

(2) “计划外”办学的优劣

无论在招生策略、收费及班级收生人数等方面都享有较大程度的自由，当然，这一切还是在中国教育部当局的宏观监督之下进行。

在中国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必须作出明智的选择：

(1) 硬体设备的投资

可以在“租贷校园”与“投资硬体”两者之间取其一。不过，大部分的私立教育机构会选择采用前者，以防万一有所差错或中国教育政策上的修改而落得血本无归。

(2) 中方合作伙伴

根据中国政策规定，所有外国商业或教育机构所引起的教育合作项目，必须有中方的教育机构或团体为合作伙伴。因此，选择适合可靠的合作伙伴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3) 培养国内教育管理人才

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其教育发展为配合国内经济发展，而变革迅速；在中国推展中外教育合作必须吸引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双语教育管理人才，以因应客观挑战。

七、结论

近年来愈来愈多马中两国的学生选择到对方国家去留学，原因诸多，但此趋势确是明显不过的。目前在马来西亚有 9000 多名中国学生，而在中国的马来西亚学生有 700 多名，这是两国教育交流的成果之一，双方都必须再加努力。当前两国政府必需尽速处理互相承认学历文凭之事，更应尽早更新两国的教育备忘录，具体化其内容及执行方案，使马中教育合作踏实地跨前一步。

在马中教育合作事业上，马来西亚要注重以优质教育为基础，促进马来西亚为本区域教育中心，同时将马来西亚私立学院双联办学的经验引进中国，如此，才能为马中两国长期的教育合作，做出实质双赢的贡献。

注释

- 1 马来西亚主要的大学，有成立于 1962 年的马来亚大学，1969 年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当时称为槟城大学）、1970 年的马来西亚国民大学、1973 年的马来西亚博拉大学（原称为马来西亚农业大学，亦为升格）、1975 年的马来西亚工业大学（升格）、1983 年的国际伊斯兰大学、1984 年的马来西亚北方大学、1993 年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1995 年的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及 1997 年的苏丹依斯迈教育大学。
- 2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1984），296 页。
- 3 英联邦国家的教育体系，大学大部分科系是 3 年的学制，若加上大学先修班，就是 4 年。“1+2”是指第一年在本地读，后两年在外国读；“2+1”是指两年在本地读，最后一年在外国读；“3+0”是指三年课程全部在本地读完。
- 4 马来西亚国际学生资料

在马外国留学生（十个最多学生国家）		
国家	在私立学院就读人数	总学生人数
中国	8827	9107
印度尼西亚	4471	7757
孟加拉国	1445	1681
韩国	528	1552
巴基斯坦	1262	1498
印度	751	1489
新加坡	332	1345
也门	683	1024
马尔代夫	560	644
日本	108	622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移民厅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外国学生人数为 38,695

参考书目

-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6),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Chap. 2, p.12.
- Garret, Richard (2004),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Activ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34 (Winter 2004), p.21–23.
- Lee, Molly N.N. (1998), "Corpora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Malaysi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10 (Winter 1998), p.7–8.
- Lee, Molly N.N. (2003), "International Linkages in Malaysia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30 (Winter 2003), p.17–19.
- Wu, Ming Chu (1991), 'Labour Flow from Malaysia to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Labour Flows to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6–8 June 1991).
-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棣、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页 283–326。
- 房剑森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七方民办教育丛书，2003）。
- 郝克明主编：《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 黄藤和阎光才合著：《民办教育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七方民办教育丛书，2003）。

摆脱技能训练的枷锁 ：全球化背景下 马中文学教育的比较论述

谢川成

一、前言

“全球化”这个概念在 70 年代被提出，至今只有区区几十年而已。在开始阶段，“全球化”是个专门术语，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跨学科跨国界的口头禅，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经济学人》杂志 (*The Economist*) 称之为“21 世纪被滥用词语之最”¹。这个词语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对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它在不同的行业当中也会掀起不同程度的涟漪。有人把它当作是太平盛世，相反地也有人当它是一个无序与混乱的新世界。比较专业的定义是：“全球化是指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各国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资源重新配置，人类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²也有人从全球化的性质方面给予解释，“全球化是一个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现在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全球化带来统一性、一致性、而忽略了全球化造成的多样性、多元性。实际上，全球化在推动了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特点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³无论如何，全球化最基本的意义是，它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人知道，国家不

能独存于世界，个人不能独存于国家。因此，国家的任何改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教育改革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重要议程。教育关乎国家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欠缺全球化的观点，创造力不足，势必影响其竞争力，国家也因此而失势于国际舞台。台湾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在20世纪末演讲时指出：“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它们要靠年轻人的智慧来解决。要培养有创造力的年轻科学家，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现在学校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前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未来的学校应该是教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科学是从发现错误的过程中进步的，当今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引导学生对新事物好奇并发现新事物。”⁴ 这里所谈虽然是科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但是它也有普遍的意义，亦即教育制度的改革与挑战，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等。

教育改革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改革。语文教育有走向实用性和交际性的趋向，偏重于智力因素，因此，技能训练便成为语文教学的中心，语文教学掉入技能训练的枷锁中。学生在过程中接受的是听说读写机械化的技能训练，文学教育因而被严重边缘化。这导致高中毕业生文学知识的基础贫乏，联想、想象能力不活跃，创造力更不用说。到了大专院校，学养之欠缺就更为明显。论者认为，语文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文学教育。然而，文学教育在语文教学中重要吗？如果没有文学教育的语文教育是完整的吗？比较发达的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强调中学课程中的文学教育。18世纪以后，英国、法国、德国等都在中学开设文学课程，重视文学教育。俄罗斯的文学教育体系最完善。它的内容包含了专门的课程与教材，主要目的是让学生系统化地学习自己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而且还鼓励学生大量阅读。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成为五十年代中国教育界学习的对象。日本也很重视中学的文学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日本受到严重的挫败，全国上下急于恢复经济，以期再战江湖。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当时中学课本实用文比重增加，引起了教育界的批评。从事教育者都认为中学应该开始着重文学教育，高

中的文学教育要更加突出。这些国家对文学教育的重视值得我们注意和省思。

从中国及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程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之间的矛盾。有些人认为文学教育不重要，因为文学不实用；也有人认为文学是语文的核心，学习语文而不学习文学是严重的错误。这两个观点各有支持者。认同前者的教师，在教学中着重在语文技能的训练，文学教学点到为止；后者的支持者非常重视文学教学，又介绍课外读本，鼓励学生创作，结果忽略了许多技能训练。两种做法都失之于极端，如何在这当中取得平衡，颇为不易。

本文重点在比较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从中了解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文学教育的地位如何，其在语文教学重在技能训练的情况下，获得怎样的对待。全球化不是向外看而已，也要回头看看自己，扎根本土，放眼全球，面向国际才是应有的态度。

二、中国中学文学教育概览

在50年代的中国，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家，教学大纲分为汉语教学大纲与文学教学大纲，教材也分别是汉语课本与文学课本。在那个时候，文学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在初中，汉语课与文学课兼而有之，到了高中，汉语课消失，只剩下文学课。当时的文学教学大纲对教材和教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和说明。例如，1956年制定的《文学教学大纲》(草案)这样表述高中文学教育的两大任务。其一是教养任务，那就是“增进文学、语言素养的任务，规定通过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欣赏阅读文言著作的初步能力，提高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巩固学生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另外一项是教育任务，即思想品德教育。大纲规定“在初级中学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

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和发展他们的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善恶、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⁵ 简言之，50年代中国中学的语文教育文学化倾向非常浓厚。这种教育改革主要是参照了苏联的做法，将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两个科目。

到了60年代，文学教育忽然销声匿迹。“工具论”的产生对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影响很大。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中学语文教育文学化倾向受到批判，而一个新的语文教学大纲就应运而生。“工具论”的影响可以从大纲所重视的几个情况看出来。首先是“主张文道统一”，接下来是“建立有机组成的多套语文系统”，最后是“探索教学规律”。⁶ 在这个时期，有人就提醒教师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因此，文学教育从被高度重视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禁区，可谓“大起大落”。

文学教育离不开教材。受到大纲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文学教材中的文学色彩大大减低，强调不可把语文课变成文学课，要把语文课当作学习语言文字的凭借依据⁷。总的来说，60年代的语文教育改革主要是牺牲文学教育而突出语文教育。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经过了“文革”，语文教育有待改革。这时期的语文教育改革延续了六十年代提出的语文工具论，强调语言文字的运用，文章作法，并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另外一个重点是，初中的大纲不提文学教育，到了高中，文学教育才被提出，并列“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为其中一项目的。总之，这时期的教育有两大倾向，第一重视语文工具论，回复60年代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传统，第二，重新重视文学教育，回复50年代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传统。用刘真福的话，八十年代的文学教育只是“有限创新，未建立鉴赏教学新体系”⁸。这时期的文学鉴赏只出现在大纲的“教学要求”部分，没有出现在“教学目的”。大纲是这样叙述教学目的：“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独缺“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可见，文学教育虽然再度受到重视，程度却远远比不上50年

代。

九十年代的文学教育严格来说没有很大的进展，那是因为无论是1990年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大纲》还是1992年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文学教育的内容基本上停留在1986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高中部分的相关内容，没有增补、改进。情况要到了1996年版的《高中语文大纲》(供试验用)才有改观。在这个大纲里，文学教育被列入为其中一项教学目的，并把文学鉴赏能力成为当代高中生应当具备其中一种语文能力。大纲如此说明教学目的：“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文训练，指导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现代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⁹。“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被列为其中一项目的，无疑是一项突破，文学教育重新被定位。

中国中学语文学科中的文学教育可以用庄文中的话作个小结：

年代	文学教育概况
50年代	被肯定，实行汉语和文学分可教学。
60~70年代	被否定，立下“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的戒律；
80~90年代	被肯定，教学大纲规定要培养文学鉴赏能力 ¹⁰
2000—	被肯定，大纲中的字眼“语文素养、审美情趣、审美能力、文化品位、积累、感悟、熏陶”等说明文学教育、文学鉴赏得到重视。

最新的大纲是在修订了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供试验用)》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后制定，并于2000年3月正式颁布施行。

新大纲改动最大的部分是“教学内容和要求”，把试验大纲的36条能力训练改为18条，其中9条是阅读部分的，9条中又有3条是文学教育的部分。也就是说，文学教育在新的大纲得到重视。

三、马来西亚的中学文学教育概览

马来西亚的两份革新中学华文课程纲要都是语文教学纲要。第一份在 1988 年实施，乃 1982 年小学综合课程纲要的延续。第二份则在 2001 年颁布。两份纲要的共同点是在总目标和教学目标中都列明文学教育的目标。由此观之，大马中学语文教学实际上也包含了文学教育，只是在实践时，文学教育是否被重视就值得研究。

马来西亚的中学生除了上华文科以外，到了高中，还可以选修文学科。早年，许多国民型中学都开设文学课，也鼓励学生报考文学科。八十年代末迄今，鲜少听闻学生选考文学科，开办文学课的学校也寥若晨星。不可否认的是，马来西亚并没有详细的文学科课程纲要，有的不外是考试局规定的阅读教材，当然也就是考试应读的课本及篇章。在没有文学课的学校，学生依然可以报考文学科，但必须自己在校外寻找补习老师。从这个角度审视，大马的华文语文科与文学科是分开的。但是，语文科课本收录不少文学作品，因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它是在语文技能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实施的。具体而言，教师在教授文学篇章或具有文学属性的课文时，可以同时传授文学基础知识如文学史常识或文类常识，最后才安排鉴赏活动，引导学生深入课文。

大学先修班的华文课程纲要则分为语文部分及文学部分。语文部分的范围包括语文知识及语文能力。前者包括语音、文字、语法、修辞及标点符号；后者则有文学及理解两项内容。文学部分的范围只有两项，第一项是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及现代文学史；第二项是中国文学赏析，包括古典文学赏析及现代文学赏析。文学部分的范围很广，学生不容易掌握。

总的来说，中学的文学教育是依附在语文教育里的。学生通过文学篇章及名句精华间接学习文学，所得的教育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丰富。很多中学生中五毕业后，文学知识还很贫乏，基础也不稳。如果在先修班继续修读华文，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文学知识。因此，中学到大学先修班的文学教育在衔接方面有欠理想。对那些在高中时期自修文学科的学生，先修班的华文也许不会太难；对那些不曾报考文学科的

学生，先修班的华文肯定是困难的科目。前述两个阶段，文学教育的要求相差甚远。倘若不改善，学生肯定会面对不少问题。

四、中学文学教育都是语文教育的其中一环。

从中国 2000 年颁布的《初高中语文新大纲》和马来西亚 2001 颁布的《中学华文综合课程纲要》，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教育乃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只有在 50 年代，文学教育独立成为一科，与语文课相提并论。60 年代突然消失，直到 2000 年，命运尚未扭转过来，相信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至于马来西亚的情况，文学教育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尚有“中国文学”作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但是它有点像选修科，有兴趣的学生才报考，不是针对所有修读华文的学生。因此，隶属教育部里的课程发展中心也没有拟定中学的文学课程纲要。有关的考试读本是由考试局拟定和颁布的。

五、文学教育目标的比较

中国当局在 2000 年颁布了的一份新的初高中语文大纲。在这份体现新时代特色的语文教学大纲里，“工具性”和“人文性”获得同等重视。这是语文教育理念的转变，通过淡化工具性，加强人文性来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

重视文学鉴赏，将“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与“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听说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并列提出是这份语文教学大纲的特点。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鉴赏和阅读文学作品是不同的。所谓文学鉴赏，“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把握艺术形象的过程中，通过认知、感悟、理解、品味和教育作用”¹¹。不过，新大纲直接说明文学鉴赏的文字很少。文学教育的目标还是失之于笼统广泛，新意不足。以下是初中和高中的相关目标：

初中文学教育目标	高中文学教育目标
(1) 学习欣赏文学作品；	(1) 感受文学形象
(2) 感受文学作品中的形象；	(2) 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
(3) 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	(3) 初步鉴赏文学作品 ¹²

初中目标的关键性词语是“学习欣赏”和“感受”，对象是文学作品和语言；高中目标的关键性词语是“感受”、“品味”和“初步鉴赏”。可以看到的是，从初中到高中，文学教育的目标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项“初步鉴赏”，这也大概是这份大纲最具前瞻性的词语。

这份大纲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出了文学鉴赏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并列为初高中新大纲的核心概念。当然这个概念也适合于语文教育的其他内容。文学鉴赏不可能一步而蹴，必须按部就班，将有关知识逐步传授，做到系统化的教学。积累的步骤可以是：“1. 字词句的咀嚼、品赏；2. 篇章结构的把握；3. 情致、意趣和哲理的感受、品析；4. 必要的基础知识理解、记忆；5. 运用和发挥，如创造性、迁移性的认识理解，评价性、借鉴性的写作练习。”¹³ 论者认为新大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教师在大纲的指导下，能够按照所列出的积累步骤和内容训练学生逐步掌握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这是针对“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说明，也可以说是达标步骤。对于其他目的，大纲没有进一步说明。

马来西亚 2001 年颁布的中学综合课程纲要的文学教育目标共有两项，即 (1) 赏析古典与现代的文学作品和 (2) 进行各类文艺创作与改编。关键性词语是“赏析”、“创作”和“改编”。第一项包括了知识的灌输抑或理论的掌握，因为学生并非一上中学就自然懂得欣赏文学作品。教师必须教导，提供鉴赏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然后引导他们逐步欣赏文学作品。第二及第三项则是理论的实践，落实在各种文类的创作和改编的练习上。鉴赏他人的作品是客观的分析，纵使有很深入的分析，毕竟是别人的。但是，倘若把所学到的知识落实在文学创作中，那种知识就变成了技能。例如，学了欣赏诗歌，懂得诗歌常用的修辞手段，以及各种语言技巧。接下来，学生就用这些知识创作一首诗歌，这就是实践。改编基本上也是如此。将一种文类改编成另一种文类需要对两种文类的基本知识，改编起来才得心应手。

《中学华文综合课程纲要》的特点是，文学目标是通过语文应用中的“美学领域的预期学习成果”来达到的。纲要说明：“语文教学应通过文艺作品的欣赏培养学生感受和鉴赏美的能力，并让学生通过创作的实践把美表现出来。”¹⁴ 这和中国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大陆语文大纲鉴赏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马来西亚课程纲要的鉴赏对象是“美”。同样提到“文学作品”，前者是鉴赏的对象，后者则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一个达到鉴赏“美”的根据。这是课程设计的不同，也可以说是纲要的特色，因为，“美是文学作品趋向的目标，也是文学之所以成立的条件。”¹⁵

可以看出，课程纲要是把文学教育纳入美学教育中。要如何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来培养学生感受美和美的能力呢，纲要没有详细地说明。文学作品的美包括形象美、音乐美、语言美、意境美等等。如果这几项美是该鉴赏的内容，那么，所谓的“美”还是文学作品的“美”，就不是美学的美。纲要对这一点没有明确提示，好处是教师可以自由发挥，缺点是教师无所适从。

总纲目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做法，不过为了逐步落实纲要目标，课程发展中心还为每一年级准备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教学课程纲要。以下是中一到中五文学教育方面的目标：

年级	目标
中一	欣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主要注意古典诗词的欣赏。要求分析古诗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
中二	1 注意古典诗词的欣赏。要求分析古诗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和意境； 2 注意白话诗的欣赏。要求分析作品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
中三	1 注意古典诗词的欣赏。要求分析古诗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和意境； 2 注意白话诗的欣赏。要求分析作品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
中四	欣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主要注意小说的欣赏。要求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与安排和故事的背景。
中五	1 欣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主要注意小说的欣赏。要求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与安排和故事的背景。 2 欣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主要注意戏剧的欣赏。要求分析剧本的情节结构，语言和思想感情。

可以看出，各年级的教学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还有衔接及逐步提升。例如，中一的目标是古典诗词的欣赏，到了中二，中一的目标还保留，作为复习，也增添了白话诗的欣赏。中四及中五的情况也是一样。中四的重点是欣赏小说，到了中五，小说部分保留，增添了戏剧欣赏的新项目。这样的安排是可取的。文学教育也应该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要区别对象，分清楚层次，明确要求，逐步达到目标。在这一点上，纲要发挥了指导的功能。

当然纲要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古典诗词的结构，纲要就没有多加说明，也没有按照年级逐步介绍不同结构的诗歌。中二添加的诗词意境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逐步介绍不同结构和不同意境的诗歌，纲要就更加完美，学生在修完中学华文课程之后，对古典诗的结构、意境就有比较明确的了解。¹⁶

总的说来，就文学目标而言，马来西亚的《纲要》比中国的《大纲》详细、具体。

六、重视诵读

在达标步骤方面，中国的语文大纲在文学鉴赏方面提出了新意。它除了着重积累、感悟和熏陶，作为初中高中新大纲的核心概念，还重视文学作品的诵读，并列出不同阶段的诵读目标。请看下表：

初中文学作品诵读目标	高中文学作品诵读目标
诵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能借助工具书理解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两个阶段的诵读目标大同小异，对象都是古典诗词和文言文，而且要有一定数量的名篇。比较特别的是，大纲首次以教学大纲的形式规定了“古诗文背诵篇目”。这些篇目都是千古流传素有定评的诗词名篇，脍炙人口，时间则从先秦的《诗经》到近代的龚自珍。规定“古诗文背诵篇目”，是注重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尤其是古诗文的诵读，有助于

改善语文教学中教师讲得过多，学生读得过少的情况。各阶段要求背诵的古诗词数目如下：

阶段	篇章数目
小学	80首
初中	50首
高中	50首
共	180首 ¹⁷

马来西亚的中学综合课程纲要也提到诵读文学作品的问题。例如中二的课程教学目标的第六项就是“朗读、朗诵与赏析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朗读和朗诵那一些篇章。照一般阅读教学法的步骤看来，课文教学完成之后，教师一般会指导学生朗读或朗诵课文。如果课文是文学作品，那么，这个目标自然就能达到。例如中一的课本中，第十一课是《唐诗二首》，第十四课是《慈乌夜啼》，两篇课文都是韵文教材，都有一个附加活动：朗读课文。第二十一课是《背影》（节选），是散文教材，也安排了增广活动：朗读，对象是课文的第五段，要求是“以准确的语气和语调”朗读。由此可见，朗读这个语文技能是被重视的。纲要没有要求学生背诵任何文学篇章，所以没有附录应该背诵的篇目。纲要着重的是赏析，比较理性的技能培养，是客观的，朗诵或诵读则比较感性地投入。纲要的做法是通过朗读加强对作品的印象，或者通过朗读提高学生某些语文技能。这和大纲要求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古典诗词的要求和目标不能等同视之。

论者以为，强调诵读是正确和重要的。诵读本来就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等句道出了语文甚至文学学习的真谛。哑了的文学课是静态的，死的，不健全的。石真平的评论颇得吾心。他说：“语文教学长期陷入误区的突出表现就是——不读书！‘书声琅琅’应该是学校的特征，尤其是语文课堂教学的特征。可是现在充塞于语文课堂的是老师无休止的讲解和大量的所谓知识点的练习，这些讲解和练习，占据了学生熟读精思的宝贵时光。”¹⁸ 诚然，技能训练如果过分强调，语文学习与教学就会僵化，欠缺弹性与灵活的教学活动。技能训练着重重复练习，多做多得，多练必巧，题海大功就应运而生。

练成这样的大功对学生并没有太大好处，因为语文学习不是局限在技能训练而已。之前的诵读也很重要。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我们要了解未来社会需要那些人才，而这些人才又需要什么能力？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就曾经指出：“20 世纪末、21 世纪初，那时候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肯定会出世了，而第五代计算机的特点之一就是用自然语言而非程序语言来指挥；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电子计算机肯定会成为工农业生产部门、管理部门的日用工具了，甚至会进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了。生活、工作，一切活动的节奏都很快，一切都要求高速度、高效率。今天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时候已接近 30 岁，将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呢？他们普遍需要的将是如历史上超常的才子们那种出口成章的能力，因为他们要用自然的口头语言处理工作，指挥机器干活；那种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阅读能力，因为他们读的东西太多了；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写作能力，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珍贵，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他们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写的东西。那时候社会还需要有低吟长啸的诗人，斟词酌句，反复推敲的作家，或婉约或豪放或典雅或诙谐的语言大师。人们还需要文学。不过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将成为每个人的需要。”¹⁹ 中国学者意识到诵读的重要性，大纲也明确规定这一点。纲要在导言中也强调“教育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语文教育要配合时代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加强语文实践，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²⁰ 纲要具前瞻性，只是关于诵读或背诵古典诗文这一点没特别强调而已。近几年来，一些学校积极推广儿童读经活动，或许可以作为辅助，弥补纲要的不足。文学教育的侧重应该是在理解大意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语言、文学形象的感受、培养热爱文学的感情，最后还得重视朗读、记诵和积累。这样，文学教育才比较完善。

七、 结论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把文学教育视为语文教育的

其中一种手段或工具无疑是对文学教育最大的误解。虽然文学教育对语文学习有帮助，但是文学教育的功能又何尝止于斯？更重要的是文学教育亦是“培养学生创意的上佳方法”。创意的掌握和培养可以“通过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掌握到事物呈现和诉说的方法，其实可以有千姿百态的分别”²¹，也可以通过创作，让学生了解个人抒发和表达情感思想也要讲究多角度之切入。这是创造型人才的基本训练。有关这一点，大纲就说得很清楚：“注重语文学科对于培养学生创造精神能力和提高人文素养所承担的任务。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注重道德修养、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和文化品味的培养。”²² 纲要在〈导言〉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热爱语文和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训练学生的思维技巧和创造力，培养审美情趣，以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²³ 简言之，两份语文大纲或纲要都强调了培养创造力的重要性，证明大纲的设计是具有前瞻性的。这样的课程设计符合全球化的观点，因为新世纪的教育基本上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应付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国家需要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文学教育在这方面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文重点比较了马中的中学文学教育。第一个发现是两国的文学教育都是语文教育的其中一环而已。在这一点上，《大纲》明显地要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以弥补语文教育历年来的不足。《纲要》基本上重视文学教育，但是由于强调不足，被误会把文学教育当作是语文教育的其中一个手段。在目标方面，两个纲要各有侧重。在背诵和诵读古典诗文方面，《大纲》明显地凸现了它的重要性，且要“改变过分强调语言学习与训练的倾向，淡化过多的分析和操作性技术性训练，增加了对文学作品诵读的要求，注重语文学习中的积累、感悟和熏陶”，而且还要学生背诵一定数目的篇章。《纲要》这方面的意识就没有这么明显。

马中两国中学的文学教育还可以进一步比较，如比较所使用的课本，从教材上审思《大纲》或《纲要》目的是等否达到，各种文学知识的灌输与实践，整体评估文学教育的内容是否完善。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加强文学教育的内容，突破把它当作语文学习的工具之思想。《大纲》和《纲要》都是语文教学大纲，牺牲真正的文学教育而达到语文教育的目标是极有可能的。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如何摆脱技能训练的枷锁，教师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前线的教师不了解文学教育的重要性，不清楚文学教育对学生多方面的影响，依然以听说读写为教学中心，那么，中学的文学教育，无论是在单语的社会还是多元的语境下，前途肯定是暗淡的。

注释：

1 转引自钱达安：〈什么是全球化〉，见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5855>。

2 姚亚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收录于陆丙甫、李胜梅等著：《语言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 123。

3 《江南都市报》（中国：2001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转引自姚亚平，如注 2，页 127。

4 北京青年报，1999-04-18.转引自李国秀：〈新世纪的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第 37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 49。

5 详见刘国正：〈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页 1，见网页 <http://www.pep.com.cn/200212/ca10983.htm>

6 就文道统一而言，大纲：“就一篇文章来说，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读一篇文章，理解内容和理解语言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一篇文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大纲反对两个极端，认为“以道为主”和“以文为主”是两个错误的倾向，因此主张“文道统一”。就多套语文系统方面，大纲建议需有三套系统，即知识系统、文选系统和训练系统，其中又以训练系统为重。大纲强调语文的基本训练“要通过多读多写来完成。”针对教学规律问题，大纲提出“讲读中心论”，要注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并较为具体地说明了初中高中阶段各自的教学目的。详见刘真福：〈建国以来中学文学教育述评〉，<http://www.pep.com.cn/200212/ca10983.htm>

7 大纲规定：“教材的范围应该广泛，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包括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包括书信、通讯、报告等应用文。”除此之外，大纲也规定教材“散文可占课文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不过，这里的散文乃广义的散文，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等。详见注 2。

8 文学鉴赏是在教材中提出的。1982 年初中语文课本的前言提到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1985 年出版的《文学读本》的说明指出：“指导学生认真精读一部分典范的文学作品，并结合

各种练习，教会学生文学鉴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初步培养他们文学鉴赏的兴趣和能力，进一步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详见注 2，页 4。

9 大纲中的“教学内容和要求”有四个地方直接提到文学教育的目标：“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和技巧”；“文学鉴赏常识”；“文学发展常识”和“传统戏曲和影视文学常识”。见注 2，页 6。

10 庄文中：〈论中学语文学科中的文学教育〉，详见网页：<http://www.edu.cn/20011229/3015763.shtml>

11 姜国忠：〈加强中学文学鉴赏教育的原则和策略〉，详见网页。

12 如注 2，页 6。

13 如上，页 7。

14 课程发展中心华文组：《中学华文综合课程纲要》（吉隆坡：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中心，2000），页 10-11。

15 龚鹏程：《文学与美学》（台北：业强出版社，1984），页 14。

16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过意见，详见谢川成：〈论中学综合课程纲要里的文学教育〉，收录于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265-285。

17 有关的篇目，见本文后面的附录（一），转引自人民结语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诗词与中小学语文素质教育〉，见 http://resource.eastedu.com/luwenziyuan/yuwen/2003/20030324_01.htm，页 3-6。

18 何冠南：〈素质教育呼唤语文教学务本归真——课堂教学中语感培养得探究（上）〉，网页论文：<http://www.guangztr.edu.cn/gztr/xkjjx/zxyw/szjyhh.htm>

19 张志公：〈关于改革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转引自蔡寿福〈语文教学任务与学生语文能力培养〉，收录于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页 141。

20 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中心：《中学综合课程纲要导言》（吉隆坡：2001），页 2。

21 潘步钊：《如此星辰如此良页》（香港：中华书局，2005），页 68。

22 王富辉整理：〈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述要〉，见网页 <http://www.foredu.com.cn/resource/trworld/chn/jiaoxue/dagang/dagangshuyao.htm>

23 如注 17。

作者简介

陈友信，英国利兹大学土木工程荣誉学士，伦敦城市大学企业管理硕士。英国考文垂大学商业行政名誉博士，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法律名誉博士，1986年创立英迪学院，担任院长职迄今。著有《断崖有路》和《扎根与寻梦》，编有《趋势与策略》。

何国忠，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博士，曾任马大中文系讲师、马大东亚系主任，现为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编著有《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2001)、《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及族群纠纷》(2002)、《百年回眸：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教育》(2005)、《百年回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政治》(2005) *Malay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merging Chin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2005), *Ensuring Interests: The Dynamics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 (2006) 等书。

黄文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及博士。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研究范围包括中国思想史与新马华人社会，著有学术论文多篇。

林德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现为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彭亨分校讲师。研究兴趣包括非华人学习中文状况、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现象及当代中国政经问题。

林若雩，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现为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所副教授。从事东南亚相关政经研究超过 20 年。1995 年担任台湾第一个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所(淡江大学东南亚所)筹备处主任，次年起持续担任所长六年(1996-2002)。著有《马哈迪主政下的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关系》(2001)、《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及学术论文多篇。

莫顺宗，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著有学术论文多篇，曾任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现为新纪元学院注册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思想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曲大威，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研究领域域包括东协、国际关系理论，目前已发表数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就读硕士期间曾担任林若雩的研究助理两年，与林若雩共同研究东协组织与东南亚安全的课题。

唐南发，英国北伦敦大学文化研究学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国际政治硕士，曾任马来西亚日本大使馆翻译与研究员。目前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并在新纪元学院授课，经常受邀在马来西亚报章、杂志、电视及电台发表时事评论。

谢川成，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主修中文及英文)毕业，马大中文系硕士，曾担任马来西亚师范学院中文组讲师，现为马大语文暨语言学学院，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中文专业讲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语言与文学、儒家思想。著有《现代诗诠释》、《夜观星象》(诗集)、《现代诗心情》、《谢川成的文学风景》、《儒家君子》。

文平强，马来亚大学地理系毕业，英国 HULL 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1967-1999 年在马来亚大学服务，曾担任地理系讲座教授兼主任、东亚系主任。著作多种，现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人文地理与区域地理的研究，近期则专注华人研究。

吴明珠，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马来亚大学博士。目前任职于马来西亚英迪学院，为英迪基金执行长。研究兴趣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文化和经济、妇女课题和教育课题。热衷辅导工作，协助多项义务辅导工作多年。

姚晓静，厦门大学自动化系毕业，现就职于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任助理工程师。

张大勇，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现就职于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图书馆。

张应龙，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海外华人研究，广东侨乡研究，东南亚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兼任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华侨与华人》杂志副主编。

庄华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学士课程主任、大马翻译与创作协会秘书。著有 *Putik* (2003)、《伊的故事：马来新文学研究》(2005)、*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Suatu Perbandingan* (2006)、*Salam Malaysia: Antologi Terjemahan Puisi Mahua* (2006)、编有《端倪》(1998)、《绵延》(2006)，编译有《寂寞求音：林天英诗选(1972-1998)》(2000)，编著译有《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2006)。

索引

- 2020 年宏愿 88, 98, 177
97 年金融风暴 20, 25, 149, 151, 157, 165
911 事件 150, 153, 155, 156, 158, 160, 163
10+3 东亚一体化 21
1969 年 5·13 流血事件 176, 177
1961 教育法令 75, 76
- A**
阿都拉萨 (Abdul Razak) 150, 174, 190
阿都拉·巴达威 (Abdullah Badawi) 85, 153, 162, 163
阿都拉曼 (Abdul Rahman) 126, 174
艾洛育夫人 (Gloria Macagapal-Arroyo) 157
安华 (Anwar Ibrahim) 152, 157, 161, 181
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 24, 37
- B**
白桦 36
白鲁恂 (Lucian W. Pye) 29, 30, 32
白小事件 125
巴昆 22
包产到户 33, 37
包干到户 37
包遵信 38
北京侨联 185
北京条约 105
北京西单街 31
柏林围墙 3
不结盟运动 159
布希 (G.W.Bush) 156, 157
- C**
曹刚川 155
曹景行 182
蔡马友 183
朝鲜内战 3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3, 174
- 陈凯希 183, 184
陈来金 183
陈良民 183
陈修信 173
陈序经 136
陈仪乔 89
陈云 30, 36
陈祯禄 126
陈宗白 136
初高中语文新大纲 207
- D**
大前研一 (Ohmae Kenichi) 13
大跃进 15, 35
“打着红旗反红旗” 29
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H. Perkins) 32
邓小平 3, 4, 5, 18, 29, 30, 31, 32, 34, 36, 37, 38, 39, 88, 151, 175
奠边府战役 3, 174
东盟 16, 21, 22, 87, 88, 89, 90, 91, 106, 137, 174
东盟自由贸易区 21, 87, 88, 90, 91
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 160
东亚高峰会 (East Asia Summit, EAS) 150, 158
东亚共同体 (East Asia Community, EAC) 158
东亚经济核心会议 (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 159
东亚经济集团 (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 158
东协加三 (ASEAN Plus Three, APT) 151, 158
东协湄公河开发计划 (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51, 158
东协区域论坛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160, 162
董总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20, 122, 123, 176

F

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 150, 155

G

改革开放 5, 14, 15, 18, 20, 22, 23, 88, 90, 92, 94, 137, 141, 185

高爾 (Al Gore) 152

高中语文大纲 205

广东会馆联合会 123

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154

国民党 172, 173, 174

国家文化 54, 71, 80, 179

国际潮团联谊会 121

国务院侨办 185

H

海外华人 6, 50, 105, 106, 107, 108, 109, 112, 113, 173, 178

海外华文文学 6, 50, 105, 106, 107, 108, 109, 111, 112, 113, 171, 173, 178

韩愈 77

何亮亮 182

宏愿小学 125

华国锋 29, 30, 31, 32, 33, 36, 39

黄家定 181

黄遵宪 74, 170

华侨 7, 105, 106, 108, 109, 111, 113, 136, 137, 138, 171

华人社团 7, 91, 93,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7, 128, 129, 131, 169, 181

华盛顿 156

华项兹 (Kenneth Waltz) 163

华总 120, 122, 123, 128, 181, 183

《花踪文学奖》 180

胡汉明 170

胡锦涛 38, 169, 181

胡耀邦 30, 32, 38

I

罗瑞兴 31

J

嘉华 (Gafah Baba) 176

江泽民 38, 39, 152, 169

贾庆林 155, 158

教总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20, 122, 123, 124, 172, 176

阶级斗争 5, 29, 32, 39

基地 (al-Qaida) 156, 157, 172, 194

基督教文化 72

计划经济 14, 15, 16, 24

经济特区 15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大纲 205

K

抗美援朝 3, 174

康有为 74, 170

孔庆庶 122

孔子 73, 76, 77, 78, 81

L

拉菲达 (Rafidah Aziz) 91, 154

拉惹亚都拉 (Raja Abdullah) 175

拉沙里 (Tengku Razaleigh) 176

李剑桥 183

李金友 183

李岚清 181

林彪 33

林福山 94

林晃升 52, 176

林敬益 181

林连玉 124, 126, 172, 176

林文庆 74

林祥才 90

林源德 183

林玉唐 183

李三春 183

李深静 183

刘少奇 35

刘真福 204

李先念 31, 38

李孝式 173

M

马哈迪 (Mahathir bin Mohammed) 4, 7, 88, 89, 110, 125, 149, 150, 151, 152, 154, 155, 156,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75, 176, 177, 181, 182, 185

马华公会 77, 78, 81, 85, 120, 173, 176, 183

马华公会青年团 (马青) 185

马华文学 5, 6, 45, 46, 47, 48, 49, 50, 51

马华左翼/革命文学 49

马吉德 (Dato Abdul Majid Ahmad) 95

马来民族主义 6, 51

马来人议程 82

马来亚共产党 3, 4, 173, 174, 175, 178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121

马来西亚华人 4, 5, 6, 7, 8, 45, 72, 77, 91, 93, 94, 96, 98, 99, 100, 105,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7, 118, 122, 128, 169, 170, 173, 174, 175,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马来西亚人 6, 97, 98, 107, 109, 110, 111, 112, 113, 153, 154, 161, 175, 177, 178, 183

马来西亚人民党 177

马来西亚团结党 177

马来西亚研究所 4, 138, 139

马来西亚支持一中协会 169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169, 184

马来西亚中国商业理事会 184

马留华同学会 169

马中商城 184

马中双边商业理事会 4

马中友好协会 169, 184

茅草行动 127, 176

毛泽东 5, 29, 30, 31, 32, 34, 38, 150

美国联邦调查局 160

民主行动党 177

慕沙 (Musa Hitam) 176

N

纳吉 (Najib Tun Razak) 155, 165, 181

南巡 5, 18, 30, 39, 88

内部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157, 176

O

欧洲工业革命 14

P

彭真 38

Q

七大乡团 122, 169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36

丘菽园 171

R

阮次山 182

儒教复兴运动 74

儒家文化 77

S

赛诺鲁查曼 (H.E. Dato' Syed Norulzaman Syed Kamarulzaman) 89

三保山 176

沈慕羽 176

市场经济 13, 14, 15, 16, 90, 92, 162

世界工厂 21

世界华文文学 50, 180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 157

苏法特 (Yazid Sufaat) 160

四个现代化 33, 34

四六精神党 176, 177

四人帮 29, 32, 33

四项坚持 35, 36

苏加诺 3, 174

孙中山 74, 107, 170

索罗斯 (George Soros) 152

3103154

- T**
- 台湾文学 51
汤本 182
唐才常 171
天南新报 171
童玉锦 183
- W**
- 魏京生 35
翁山苏姬 (Aung San Suu Kyi) 159
翁诗杰 185
文化霸权主义 6, 51
文化大革命 15
文化中国 8, 121, 170, 178, 180, 181, 183, 184, 185
温家宝 154, 158, 181
文学教学大纲 203
吴邦国 181
吴德芳 183
五四运动 49, 171
巫统/巫人统一机构 (UMNO) 120, 159, 176, 177
巫青/巫统青年团 82, 176
- X**
- 香港明报集团 180
萧依钊 180, 181
新村 173
兴都教文化 72
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82, 177, 190
新巫统 176
雪华堂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120, 121, 123, 127
雪隆潮州会馆 121, 122
雪隆海南会馆 122, 128
- Y**
- 杨忠礼 183
颜清湟 171
颜清文 183
- 鸦片战争 14, 105, 135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152
亚洲四小龙 13, 15, 18
亚洲金融危机 88, 152, 156
叶亚来 175
印度人进步阵线 177
印尼共产党 3, 174
伊斯特拉达 (Estrada) 157
英殖民地政府 3, 174, 178
《益群报》 49
伊斯兰会议组织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 OIC) 158
伊斯兰教党 (Parti Islam SeMalaysia) 110
“伊斯兰团” (Jemaah Islamiah) 160
伊斯兰文化 72, 95
依斯迈 (Tun Ismail) 174
越南共产党 3, 174
- Z**
- 赵海立 141
赵紫阳 30, 36, 38
资本主义 16, 34, 38
殖民地主义 14
中共一级党代会第 11 届 3 中全会 5, 29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21
中国共产党 3, 5,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107, 151, 173, 174, 178, 185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共青团) 185
中国文学 45, 47, 50, 51, 112, 206, 207
中国研究所 4
中华大会堂总会 169
钟廷森 183
中学华文综合课程纲要 207, 209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205
周恩来 35, 108
自由贸易区 21, 163
祖国报 176
左秉隆 74, 170
佐力克 (Robert Zoellick) 160

國科會補助人社研究圖書計畫
主題：大陸及海外華文文學II：港澳及
東南亞地區近現代華文文學研究
NSC97-2420-H-002-205-2E2

RB006	t
單位：台文所 AW	
來源：廠聯貿易	
日期：9-11-2009	
價格：NT\$317.-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103154

全球化 的中国及马来西亚

话语下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年来大步起飞，在全球化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之际，两国都意识到国家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策略以及适合的机制框架，两国秉承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第4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则是中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2005年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两国领导人互访频密。马哈迪仅在1990年代就访问了中国4次，而接替马哈迪担任首相的巴达威也一样将中国当作马来西亚重要的合作伙伴，巴达威在最近3年间已访问中国3次，其中值得学术界提起的一件事是当他在2003年9月以马来西亚副首相的身份访问厦门大学时，建议在中国创办马来西亚研究所以及在马来西亚创办中国研究所。

本书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合作计划下的成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第二部分为“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第三部分为“中马关系及互动”。

ISBN 978-983-3748-83-9

ISBN 978-983-3748-83-9



9 789833 748839